

623329

137-8

56382; 3

T. 12 4. 10

4
1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 稿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

第十分册

(美) 包华德 主编

沈自敏译

赵杰校



清华大学图书馆
基本馆藏

-8
-
82; 3
2 4-10

中华书局



623329

137-8

137-8

56382; 3

56382; 3

1981.4.10

12470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 稿

第
十
分
册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第十分册

第十分册

(美)包华德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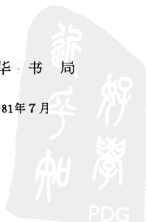
沈自敏译

赵杰校

(征求意见稿)

中华书局

1981年7月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 稿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

第十分册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

中华书局排印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北京体育报社印刷厂印刷

1981年7月印刷 定价0.63元

新
子
知
學

PDG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编印凡例

一、编印《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的目的在于组织协作，征求意见，反映工作进展情况。

二、《丛稿》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负责编辑。

三、《丛稿》专登有关中华民国史资料一类的稿件，供历史教学、研究工作参考。每辑字数不定。

四、所有中华民国史初稿及其所附资料，一般都先在《丛稿》登载，广泛征求意见，然后改为定稿。但《丛稿》登载过的稿件，将来《中华民国史》一书及其所附资料不一定全都编进去。

五、欢迎投稿，但只限于中华民国史及有关资料。

六、欢迎对《丛稿》提出批评意见。

七、译稿如引用，请核对原文。

新
平
知
學

PDG

目 录

孙逸仙	(1)
宋哲元	(23)
宋教仁	(25)
宋汉章	(29)
宋希濂	(31)
戴爱莲	(32)
戴季陶	(34)
戴笠	(40)
太虚	(43)
覃振	(44)
谭鑫培	(50)
谭延闿	(52)
唐继尧	(55)
汤恩伯	(58)
汤化龙	(63)
唐绍仪	(66)
唐生智	(70)
汤用彤	(73)

新
平
和
學

孙逸仙 原名孙文

字：帝象 号：日新；逸仙 中山 化名： 中山樵

孙逸仙（1866.11.12—1925.3.12），民国革命和国民党领袖，出生于广东香山县翠亨村，该地靠海，在葡属殖民地澳门以北约三十哩。他的祖辈世代务农，父亲在澳门做了几年裁缝后，在孙逸仙出生前回家乡继承祖业。孙逸仙六岁时在村塾读儒家启蒙书籍。1879年被送往夏威夷其长兄孙眉（1854—1914，字：德彰，号：寿屏）处，他已在该地务农经商多年，相当富裕。孙逸仙在檀香山进了英国教会创办的一个少年寄宿学校意奥兰尼学校读书，学习英语、科学知识和基督教教义。1882年毕业后回翠亨村。此时，他所受的西方世界的知识和基督教教育，使他把乡人的传统的宗教信仰看成只是迷信。他回来不久，就折断村庙中佛象的手指，表示对迷信习俗的怀疑。这个青年人的鲁莽举动引起村民的愤怒，把他驱赶出村。

1883年秋，孙逸仙去香港，第二年春天进了英国教会的拔萃书室，后又转到港英政府开办的皇仁书院，在那里接受美国教士喜嘉理的洗礼入了教，不久回家与一个本地姑娘结婚。1886年去檀香山探望长兄回国，决定行医，到广州进了博济医院附设的博济医校，该院是西方在华开办最早的医院，院长为美国医学传教士克尔。1887年他离广州去香港雅丽氏医院附设西医书院，从医校主任康德黎学医五年。1892年毕业时获得内外科成绩优良的证书。他去澳门，但因没有行医执照被澳门当局勒令离境，1893年春他开始在港开业。

孙逸仙在广州、香港学医时，已热心注意国内政治，立志推翻满清政府。据说他童年在翠亨村听太平天国故事时就有这种想法，而他本人总是把他的革命思想的来源归之于早年所受的基督教教育，归之于他对香港英国政府的效能和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所作的对比，归之于他目睹清朝统治者无力捍卫国土，抵御外国侵略，尤其是在1884—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他早期的这些不满，随着他在广州、香港同思想激进的青年的接触而加强。1886年他在广州学医时，结识了同学郑士良（1901年去世，号弼臣），他原是华南最大的反满秘密组织

三合会的成员。他在香港学医时，又结识了同他一样具有反满意识的陈少白。1893年他从澳门回香港后，同这些同学以及儿时的家乡友伴陆皓东来往。他们举行秘密会议，讨论复兴中国的计划，谈论推翻清朝统治者的可能性。

他们的这些讨论虽然带有反叛的调子，但孙逸仙当时显然还不准备公开投身革命事业，相反，他决定致力于改良现行政治。1894年2月，他放弃无人问津的医业去天津，向直隶总督和中国主张革新的人物之一李鸿章上书提出改良建议，这封政治上无害的书信，一般地陈述了谋求中国自强的道路，特别着重说明运用西方科学技术改进农业生产的重要。是年夏，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忙于战事而无暇顾及这些事。孙逸仙在失望之余去夏威夷，准备向私人募款以实现他的农业计划。1894年11月，他得到长兄和其他华侨团体的支持，在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其目的在于“恢复中华”，为此目的所需经费，由会员购买该会的份例筹募。

1894年秋冬之际，在朝鲜的日本军队击败了中国的军队，并迅速向南满挺进，使北京亦受到威胁。孙逸仙在国内的朋友认为华北的清军覆亡在即，这正是举行革命起义、推翻清政府的大好机会。孙逸仙接获国内急电，于1895年1月离檀香山经日本回香港，与郑士良、陈少白、陆皓东等同人决定联合由英国轮船公司职员杨衢云（1861—1901，字：肇春）在1892年创立的秘密革命团体辅仁文社的势力，组织一个新的革命团体，成为兴中会的一个主要支部。这个革命团体公开的活动是办报纸、设学校、兴工业、强中华，而其主要的目的则在组织一次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的革命起义。他们准备在10月间袭击广州。1895年春夏之际，杨衢云在香港筹款购买军械，孙逸仙、郑士良、陆皓东去广州结果因马关条约的规定而解散的部队士兵，并约同秘密社成员组织了一个名义上研究农业的革命团体“农学会”。但是在预定起义的前一天，起义计划为广州当局发现，起义者多人被捕，陆皓东遇害，孙及少数几人逃往香港，但港英当局应清政府之请命令他们离境。1895年10月底，孙逸仙和他的几个同志避居日本。

在海外的革命活动

1895年广州起义后，孙逸仙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活。他被清政府悬赏通

辑，在此后的十六个年头里，他为了逃脱清政府的追捕，被迫在国外从事革命活动。他在11月抵横滨，建立了兴中会支部，由当地的一个居民和同情者冯镜如主持。此时，孙逸仙为把自己乔装成现代日本人，剪去辫子，留了胡须，改穿西服，然后去檀香山与其兄同住。1896年，他的家人前来同他会合。他在夏威夷，从当地秘密会社中吸收兴中会会员，并和洪门会支部建立联系。1896年6月他去旧金山，争取致公党、洪门会人士的支持。当时，洪门会成员虽因反满而建立组织，但却认为中国现行政府能够很好代表他们这些在美国的侨民的利益，因此，他们对孙逸仙的革命计划很少兴趣。

孙逸仙离开美国到英国去探望退休回国的老师康德黎博士。他在英国的活动，始终被清政府派人监视。1896年10月11日，他路经泡特兰路中国使馆，被使馆人员劫持，中国公使及使馆人员准备租船把孙押送回国以叛乱罪处死。孙设法把消息通知康德黎，康说服了英国政府使孙获释。这件事引起了广泛注意，一个不知名的政治流亡者，一夜之间成了国际上大名鼎鼎的革命家。经此事件，他在伦敦平静地住了几个月，其间，他常去大英博物馆阅读西方社会科学书籍，其中包括马克思的著作和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著作，乔治的赋税和地租学说对孙逸仙今后社会经济思想的形成有相当影响。

1897年7月，在英国居留十个月后，孙逸仙经加拿大去日本横滨、东京，争取那里华侨社团的支援。为了隐瞒自己的身份，他改用日本常用的名字中山樵，此后，中山之名就为他的中国同事们所熟悉。虽然他在保守的旅日华侨中进展很少，但是却得到日本自由派如冒险家和亲华份子宫崎寅藏等人的更多支持。他到横滨不久宫崎即同他接近，并成为他最热烈的日本追随者。宫崎介绍他结识了几个著名的日本自由派人士，包括宫崎的恩主犬养毅(1855—1932)、大隈重信(1832—1922)。他们出于联合亚洲人共同抵抗西方势力的考虑，很愿意和中国进步分子合作使中国强大起来。犬养毅是如此的信从孙逸仙，为他在东京提供住所和活动经费。当时另一个引起日本自由派注意的中国团体，是康有为及其杰出的信徒梁启超等人的改良派。自从1898年9月保守派变法失败后，康、梁等人避居日本。孙逸仙和他的日本友人要求改良派同革命派联合共谋恢复中华。但是，顽固的保皇派康、梁不准其徒众同孙及兴中会合作，并于1899

年成立了保皇会，成为日本、东南亚、美国华侨革命势力的顽敌。

孙逸仙、陈少白、郑士良和日本兴中会会员，准备在华中、华南联合秘密会社，再次举行一系列起义。1899年到1900年间，他们集中力量准备在广州以东的惠州起义。陈少白在香港出版《中国日报》从事革命宣传，郑士良联络了三合会及其他秘密会党，孙逸仙同日本的合作者们筹集军械。1900年10月，孙逸仙去台湾等待日本运来军械。郑士良惠州起义一度得手，但因由日本运来的军械没有到达，又接到孙逸仙的信息，遂将部队解散逃往香港。

惠州起义失败后，孙逸仙返回日本，在横滨不事声张地住了三年。当时，东京成了中国政治犯和来日接受近代教育的留日学生的中心，新来的人之中，受梁启超的作品吸引而主张君主立宪的人很多。但是义和团运动后，中国一再遭受屈辱，促使留日学生组织的团体和报纸的政治观点不断趋于激烈。孙逸仙在这些青年人中看到了支持他的革命事业的新的天才，在横滨经常和这些激进青年来往，和他们商量在学生中组织革命团体。

由于留日学生中革命思想的发展，孙逸仙能再次在华侨中吸收兴中会会员。1903年他去东南亚，在河内建立支部，又去西贡、暹罗吸收会员。7月回横滨，9月去美国筹款和争取支持。1904年4月到12月，孙逸仙在檀香山、美国等地的活动，屡遭到康梁保皇派的强烈反对，保皇派在华侨中很有势力，但是孙逸仙还是得到了很多支持。1904年12月他去英国，1905年上半年到布鲁塞尔、柏林、巴黎等处设立兴中会支部。

同盟会的创立

1905年6月，孙逸仙离开欧洲经新加坡、西贡去日本。9月中他抵达横滨，发现留日学生因日本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取得令人惊讶的胜利而掀起了一股新的爱国激情。当时，华兴会创始人黄兴、宋教仁也到了日本。孙逸仙经宫崎寅藏的介绍，结识了他们和其他革命领袖。他同他们讨论将华兴会、兴中会及其他激进的留日学生组织合并成立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7月30日，在东京举行筹备会议，确定新的组织为“中国同盟会”，以到会的七十人为会员。1905年8月20日在东京召开第一次正式会议，留日学生及其他革命青年三百人加入同盟会，由黄兴提议，举孙逸仙为总理。

同盟会和孙逸仙过去组织的革命团体兴中会有很大的不同。兴中会是由很分散而自行其是、行动很不协调的支部组成的，同盟会则是一个集中而组织严密的团体，它的总部在东京，下分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协调全国各省及香港和东南亚等特殊地区分部的活动。两个组织的会员成份也很不相同，兴中会会员以华南秘密会社的成员和华侨商人、工匠为主，而同盟会则以几乎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青年知识分子为核心，朱执信、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等人起而取代过去兴中会的一些老人而成为孙的亲密助手。最大的区别还在于革命纲领的不同。兴中会的纲领是从孙中山早年以改良方法求得中国富强的建议引申而得的三个信条：“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而同盟会的基本原则则是三民主义。1905年之际，孙逸仙受到亨利·乔治等人思想的影响，已经形成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孙逸仙的这种思想曾在1905年春对留欧的中国学生演讲时第一次提了出来。同盟会建立时，以三民主义为基础作了概略叙述的孙逸仙的革命纲领被写进了同盟会会章，其后几年，这个主义和纲领在1905年11月于东京创刊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作了详细阐述。

同盟会成立后，孙逸仙及其同事们开始了更紧张的革命活动。他们立即开始募款，又在国内和华侨中发展组织，并准备新的反满起义。1905年10月，孙逸仙由日本到东南亚各地，次年他在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和马来亚的其他地方、东印度群岛建立同盟会支部。1906年秋，孙逸仙回日本，在纪念《民报》一周年的群众集会上，他向几千名学生发表一篇热情洋溢的演说。其时，留日学生不断增长的激进倾向，引起日本当局的注意决定应清政府的要求，将孙逸仙驱逐出境。但是，孙在日本政府中的朋友仍然希望和革命领袖保持良好关系，并秘密资助他在别处开展革命活动。

孙逸仙离开日本之前，和黄兴及同盟会其他领袖人物商讨推翻清政府的军事行动计划。日本、香港等地对孙逸仙等人革命活动的限制日益增加，他们得悉印度支那法国当局对他们的事业比较同情并愿意提供秘密活动基地，因此决定在那里设立军事指挥机构，并准备集中在中国西南边界各个地点开展活动。1907年8月初，孙逸仙与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去河内，经一些法国军官的帮助，开始训练一支人数很少的革命部队，同时在日本筹集军械。1907年春夏之

际，广东内部不安，孙逸仙趁机在5、6月于汕头、惠州起义，先后为清军镇压。9月在钦州的起义也失败了。12月在广西边境举行起义，孙逸仙、黄兴、胡汉民由河内前去，一度攻占镇南关，不久又为陆荣廷军击败，于是退回到法属地区。在这几次起义中，革命军采用了一些新的战略，例如在外国邻近的地区联合秘密会社和当地反叛的武装力量，渗入到清朝军队中去争取其中的官兵。但是革命力量还仍是由几百名未经训练的冒险分子、不谙军事的人领导，因而很少有希望击败装备良好数量众多的清朝军队。他们的战略失败，也由于他们未能从日本获得必要的军械运送到国内。

1907年底孙逸仙在镇南关时，清政府说服了法国当局将他驱逐出印度支那。1908年3月，孙逸仙去新加坡筹款购买军械，运送给在河内的胡汉民、黄兴。前者是孙留下以筹划新的军事行动，后者则由日本回国组织新的起义。1908年春，广东钦州、廉州、云南河口起义失败后，胡、黄率部几百人离开印度支那。7月，胡、黄、孙在新加坡会合。当时，革命趋于低潮。华南地区几次起义的失败，不但使聚集在马来亚的领袖人物垂头丧气，而且也影响了东南亚华侨对同盟会的信仰。1908年到1909年之间，当他们在马来亚、暹罗巡回期间，发现当地居民不愿对一个看来已经失败的事业再作贡献。虽然孙在东南亚建立了由胡汉民主持、在暹罗建立了由萧佛成主持的同盟会支部，但是他的运动没有成功。

此外，同盟会内部日渐出现了孙逸仙领导的不满情绪，日本政府又于1908年8月封闭《民报》，镇压革命党的活动。

辛亥革命

1909年春末，孙逸仙几乎在东亚各地都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了，他的活动都受到限制，因此决定去欧洲，以便为革命进行有效活动。1909年5月，孙逸仙去法国之前，下令在香港建立了同盟会华南支部，由胡汉民主持。他又把他离去期间国内的革命活动、同盟会在东南亚的发展等工作的实际责任都交给了胡汉民和黄兴。

孙逸仙在巴黎募款毫无结果，又短期去布鲁塞尔、伦敦，1909年10月去美国。他在《华美新闻报》上公布了他的账目，以驳斥章炳麟和同盟会会员中一

些持异见者说他滥用会款的责难。孙逸仙在美国、加拿大旅行的五个月期间，发现华侨中保皇派的力量大为减弱，华侨已比1904年时远为愿意接受他的推翻清朝统治的观点。因此，孙逸仙能募集到不少捐款，并且在纽约、芝加哥、旧金山建立同盟会支部。1910年3月他去檀香山，两个月后又去日本，与仍在东京的同盟会领袖们重新接触，计划重新建立一个秘密组织，以便与全国各地的革命团体相结合。孙逸仙虽用化名住在犬养毅家中，不久又被清政府发觉，要求日本政府加以驱逐。因此孙逸仙到日本只有十天，便即离去。

孙逸仙到新加坡后又去槟榔屿。11月他邀集黄兴、胡汉民商议，决定由黄兴领导在广州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起义。不久，马来亚英国当局以孙逸仙的一次演讲内容不当为由迫其离境。孙逸仙失去了在远东的最后一个落脚点，再次去北美募款。12月他离开槟榔屿，经欧洲到美国、加拿大，1911年2月中旬到纽约。他在旧金山、温哥华、维多利亚受到华侨的热烈欢迎，短期内募集了八万美元支持他广州起义的计划。广州的黄花岗起义虽然失败，但是引起了华侨的极大注意，华侨的革命热情显然增加。孙逸仙决定暂时留在美国，以便募款继续支援国内的革命活动。

同盟会及其他革命团体的注意力开始集中长江一带，尤其是对武汉、南京两个城市。1911年7月，居正、陈其美、宋教仁筹设了中部同盟会，设总办事处于上海公共租界湖北地区的革命势力已渗入清政府驻武汉的新军之中。孙逸仙对这些情况虽然并非不知道，但他和国内的同事们却很少联系。因此，10月10日武汉起义和革命的消息，他事先并无所知，而是在从丹佛到堪萨斯的旅途中读报时才知道的。接着他从美国报纸中进一步了解到国内革命党人正在计划建立共和政府并由他担任总统的消息。孙逸仙认为正在拟议中的新政府和西方列强的关系很重要，因此，他决定暂不回国，而以中国最大革命政党领袖的身份到欧洲活动，希望能得到各国政治和经济领导人的外交承认并取得大宗借款。10月底，他到伦敦，说服英国政府取消了对他在远东英属地活动的限制，并获得四国银行团口头同意停止贷款给清政府。然后他去巴黎与法国总理克里蒙梭会谈，讨论了法国政府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的问题，但未达成具体协议。1911年11月，孙逸仙由张继、李石曾、吴稚晖陪同由马赛启程回国。

孙逸仙回国时，上海、南京已为革命军攻克，几个省份相继宣告独立。清朝政府在绝望之中，把政府大权交给了袁世凯，十四省代表会集南京，讨论成立临时民国政府，伍廷芳、唐绍仪分别代表南北政府在上海进行和议。1911年12月25日，孙逸仙到上海，受到同盟会会员和其他信从者的凯旋式的欢迎。四天后，各省代表在南京公举孙逸仙为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逸仙去南京就职，正式宣布中华民国的成立。

中华民国和国民党

经过十六年的流亡生活之后，孙逸仙在南京就任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他的革命生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他和他的同志们争取的革命目标，却还远未达到：满清皇帝仍高踞皇座，北京王朝仍是各国承认的政府；上海和议毫无进展，南京政府坚持满清皇帝退位，建立民国，北京政府反对孙逸仙为新的民国的大总统；双方武力也相持不下，但都由于得不到外国大宗借款无法战胜对方。1912年1月22日，孙逸仙为了打开这个僵局，决定以满清皇帝退位、袁世凯公开宣布支持民国政府为条件，辞去临时总统职位由袁世凯继任。袁接受这些条件。2月23日，满清皇帝退位，孙逸仙向1912年1月28日在南京建立的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两日后，国会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3月12日袁在北京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孙逸仙决定辞职时，事先对袁并非毫无疑虑，因此，提出了民国政府首都必须在南京，袁世凯必须受参议院拟议中的临时约法的限制等条件，以便保证袁世凯对民国政府的支持。但是袁世凯决不愿意放弃北京这一个立脚点，因此泡制了一系列狡诈的政治事件，目的在使孙逸仙及其同盟会同人相信不仅他必须留在北京，而且南京的临时政府也必须迁往北京。

此时，同盟会已成为公开的政党，以孙逸仙为总理、黄兴为协理。孙逸仙自辞去大总统之职后，把注意力从政治方面转到民生主义方面，开始考虑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建设。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后，黄兴一直留在南京负责留守处直到1912年6月14日。当同盟会的两个最高领导人各自忙于自己的事务时，同盟会开始发生变化。在北京的一部分会员例如宋教仁，认为革命团体的始初目的已经达到，应该进行改组，以便在国会中有效地起作用，把袁世凯置于国会控制之下。为了在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中取得尽可能多的席位，宋及其支持者和其

他四个小党派：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合并组成一个大的联合政党——国民党。袁世凯感觉到这是对自己的地位的威胁，邀请孙逸仙、黄兴去北京商谈国事。1912年8月24日孙逸仙到北京，第二天出席了国民党的成立大会，他对此并不热心，因为在他看来，新成立的国民党容纳了不少野心家，这些人对民生主义所包含的社会和经济建设不表同情。孙逸仙虽被公举为国民党理事长，但他把实际工作交由宋教仁负责，因为他对这类政治活动很少兴趣。

1912年8月24日到9月18日之间，孙逸仙在北京多次会见袁世凯讨论铁路建设问题。袁世凯的热情接待，解除了孙逸仙对他的疑虑，认为袁世凯是新成立的共和国的最合适的首领。袁世凯听取了孙逸仙的铁路建设计划后，于9月9日任命他为全国铁路督办，虽然当时一些局外人认为袁世凯此举的目的不过在换取孙逸仙在政治上的公开支持。孙逸仙却以极大的热情对待自己的新职责。他的铁路计划的核心是以大笔外债修建三条干线通往缅甸、西藏和新疆。1912年秋，他前后考察了华北、华中已有的铁路线，1913年初，又去日本考察，希望获得日本对中国铁路建设的投资。

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

1912年冬孙逸仙在日本时，袁世凯和国民党之间控制北京政府的斗争十分激烈。1913年2月国会选举的结果，国民党占优势，进而准备组成以国民党为主的内阁，限制袁世凯的权力。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袁世凯所派凶手刺死。听到噩耗后，孙逸仙去上海，和黄兴一起要求彻查凶杀案并严惩凶手。1913年春，国民党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因“善后大借款”事件而加剧。6月，袁世凯镇压国民党的企图也明朗化了，当时他免除了国民党在江西、广东、安徽各地的都督，又派北洋军队向九江、南京进军。江西都督李烈钧去上海征询孙逸仙及其他国民党领袖的意见，取得孙的同意后，7月回江西宣告独立，自任讨袁军总司令，从此开始了所谓的二次革命。孙逸仙发表宣言斥责袁世凯，7月23日袁世凯免除孙逸仙铁道督办职务。庞大的装备精良的北洋军队，很快就击败了国民党军队，9月1日，南京为张勋的北洋军攻占。9月15日，袁世凯下令通缉孙逸仙及其他国民党首领。孙逸仙组织力量和袁世凯对抗，但终于在

11月底去日本避居，在台湾稍事停留后，于1913年初到达东京。

孙逸仙自民国建立以来的乐观情绪，很快在对袁世凯及其外国列强的支持者们的苦斗中消失。孙逸仙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推翻袁世凯。首先，他决定改组缺乏朝气又无效能的国民党。1914年6月23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员要宣誓效忠孙逸仙并在宣誓书上加盖右拇指指印。张继、黄兴等老党员拒不履行忠诚宣誓也未加入新党，但大多数老党员如陈其美、朱执信、廖仲恺、戴季陶都接受新的规定而加入了。不久出版了新的机关报《民国》杂志，又在美国、东南亚华人中发展党员。孙逸仙为取得日本对他的反袁斗争的支持，答应事成后给日方在华利益以重大让步，但此举未获成功。他和同事们草拟了革命方略，提出建立革命军队、成立军政府，以推翻袁世凯的统治，他以新的革命军统帅的身份，指派陈其美、朱执信及其他助手回中国，组织反袁武装斗争。

1915年12月，袁世凯阴谋称帝，蔡锷、唐继尧及云南的其他军事首领起而讨袁，反袁运动很快波及西南各省。孙逸仙在国内的追随者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在广东、安徽、江苏、山东各省举行起义。1916年4月反袁潮流明显得势后，孙由日本回上海。反袁运动因6月16日袁世凯身死而结束，孙逸仙电北京政府的总统黎元洪、国务总理段祺瑞，要求他们恢复1912年的《临时约法》和1914年解散的国会，1916年9月胡汉民代表孙逸仙去北京与黎、段商讨。孙逸仙留在上海一直到1917年夏天，致力于制定在国内实现民权的方案，此时所写的文章中有一篇是反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问题是主张参战的段祺瑞与国会屡次争论的一个问题，1917年5月至7月间双方争执不下，结果是议会解散，黎元洪被迫辞职，冯国璋继任总统，北京政府的实权落在段祺瑞一伙手中。

段祺瑞决定召开由他控制的“临时国会”，孙逸仙反对解散旧国会及段祺瑞的掌权，声称这两件事都违反了1912年约法。孙与几个国会议员发起意在恢复1912年约法和旧国会的“护法”运动。孙逸仙得到由程璧光（1861—1918）指挥的海军和南军首领陆荣廷、唐继尧的支持。1917年7月，孙由军舰护送，从上海到广州，同一大批旧国会议员一起召开非常国会，并于8月31日成立军

政府。非常国会公举孙逸仙为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唐继尧对新政府很少兴趣，而陆荣廷在10月、11月间取得了湖南的地盘之后，对护法运动也颇为冷淡了。

孙逸仙及其支持者决心同北洋军阀斗争，并且认识到为此必须有一个军事基地，因此劝说广东省长朱庆澜将二十营警备部队交给孙的支持者陈炯明统率。广西军人对此竭力反对，但是陈炯明还是组成了一支部队，称为“援闽粤军”。1918年春，唐、陆等南方军事首领对孙逸仙及军政府渐渐不满，他们和非常国会的一些议员联合改组军政府，将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合议制，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以孙逸仙、唐绍仪、伍廷芳、林葆懌、陆荣廷、唐继尧为总裁。孙逸仙再次被排挤，遂于5月21日宣布退出广东军政府。

孙逸仙去日本作短期访问，未能取得日本对他的护法运动的支持。他回到上海，定居在法租界。此后两年半内，他写了一些重要著作，例如《建国方略》的一部分。1919年8月1日，他的两个最亲密同事朱执信、戴季陶创办了《建设》杂志，阐述党的意识形态和孙逸仙的建国方案。孙逸仙也考虑党的实际事务。中华革命党未能吸引公众注意，对中国的政治和思想生活很少影响。此外，革命组织中的许多成员，特别是海外华侨坚持把它当作国民党。为了消除由于名称问题而引起的混乱，和加强党的组织，孙逸仙在1919年10月10日宣布将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

在广州，桂系军阀以武力为要挟加强对军政府的控制。1919年8月，孙逸仙正式辞去军政府的职务以示抗议。军政府内部桂系军阀的追随者和孙逸仙的支持者之间的分歧加剧的结果，是伍廷芳等官员的辞职和离开广州。1920年春，桂系和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人之间的磨擦加深后，情况就变得更加复杂。1920年6月，孙逸仙、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通电，声称军政府此后一切行动均归无效。8月，陈炯明率粤军由福建漳州回广东，经三个月战争，陈炯明在其他支持孙逸仙部队支援下击败桂系军队，1920年8月26日攻占广州，孙逸仙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11月，孙逸仙重回广州，又一次召开非常国会。

广东政府和陈炯明的叛乱

护法运动的失败，广州政府的瓦解，使孙逸仙意识到，与其和北洋军阀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还不如建立一个新的全国政府来与之对抗并最终取代北洋政府。广东应成为开展统一全国运动的军事基地。孙逸仙相信，一旦新政府由各国政府承认为中华民国的合法政府，它就可以取得足够的外国借款和海关收入，以供实施全国建设计划之需。

1921年4月，广州非常国会取消军政府，成立新政府“中华民国政府”，选举孙逸仙为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逸仙就任新职，照会各国：新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它承认过去所订的各项条约，欢迎各国来华投资；并宣布新政府立即着手统一全国的事业。几周后，孙逸仙下令讨伐桂系军阀，命令陈炯明的粤军进击陆荣廷部队。粤军稳步进入广西。9月底陆荣廷军溃败，广西乃归广州政府控制。这个胜利鼓舞了孙逸仙，他把北伐计划推进到湖南和江西。12月他到桂林设立大本营，亲自掌握军事。他计划在1922年占领湖南，然后和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南北夹攻直系曹錕、吴佩孚。当时，直系控制了华北、华中数省，又控制着北京政府。

与此同时，孙逸仙同他的主要军事指挥员陈炯明之间出现了裂缝。陈炯明自1920年击溃桂系军阀之后，作为广东省长和粤军首领，赞同赵恒惕等人倡议的“联省自治”制度，以巩固他个人的地位。因此，他对孙逸仙通过北伐建立中央集权政府统一全国的计划毫不热心。他特别反对孙以广东为北伐军事主要基地的计划。1921年广西之战取胜后，孙逸仙命令他进军湖南，他拒不接受。孙逸仙去广西争取陈同意他的观点未获成功，乃与之商定，亲自督师向湖南进军，陈则回到了广州，但答应为北伐筹集军费，要求在广州的其他方面可以便宜行事。1921年12月，陈炯明回广州后，孙逸仙亲自去桂林督师北伐。不久表明，陈炯明存心阻挠孙的军事计划。当孙得悉陈的作为，孙逸仙的得力部属邓铿又于1922年3月被刺，孙逸仙遂从湖南回师广州，4月，他当陈炯明带领一些亲信部队从广州退回他自己的据点惠州后，孙即解除陈炯明广东省长及粤军总司令的职务。

1922年5月4日，孙逸仙认为陈炯明已经不足为害，下令重新北伐。但是当孙逸仙离开广州近郊北上韶关时，陈炯明的部属叶举进入广州，要求恢复陈炯

明原有职务。6月1日，孙逸仙急返广州解决此事，但是陈炯明的部属在华北直系军阀支持下，于6月16日逼令孙逸仙辞去总统职，并准备进攻广州总统府。孙逸仙及时得悉这个消息，登上珠江的炮艇，下令他的部队由广西回粤攻击陈炯明。但是部队中途为陈炯明支持者所阻。孙逸仙在军舰上由一个名叫蒋介石的年轻军官侍候过几个星期，他认为一时无法消灭陈炯明的势力，乃于8月中旬驶往上海。

孙逸仙被陈炯明逐出广东，北伐计划受挫。孙逸仙认识到，要使革命纲领实现，必须有充实的力量。1922年8月14日他到达上海后，即计划收复广州，作为统一全国的军事基地。他再次联合张作霖、段祺瑞反对直系军阀，同时派人到福建、广西下令闽、桂北伐军余部重新集结准备讨伐陈炯明。在这一期间，孙逸仙开始了彻底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国民党虽然有几次改组，但仍然不是有效的政治组织。中央和各分部特别是海外分部的联系很薄弱。一些老党员对孙逸仙的政治社会主张很少理解，反而常常和反对孙逸仙的政党派系合作。除组织、纪律方面的缺点外，国民党又缺少有效的宣传机构。它虽然控制了几份报章杂志，却不能取得城市群众的注意和坚定支持。为了增强党的活力和革命精神，孙逸仙希望从学生、商人、工人中吸收新党员，特别注重青年学生的作用。9月初，他在上海召集国民党党员开会，说明改组国民党的意义，指定了改组案起草委员会。11月，推定胡汉民、汪精卫起草改组宣言。1923年1月1日改组行动正式开始，发表宣言，重申三民主义为国民党的基本目标。

孙逸仙改组国民党的时候，作出了也许是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联俄和联共。先前他曾多次争取西方强国和日本的支援，但一再被拒而大为失望。俄国革命后，苏俄政府派代表到中国，争取中国军政领袖的合作，并在1921年7月1日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建立。8月，孙逸仙写信给苏俄外交委员齐切林，对苏俄的政治军事组织表示兴趣。同年年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桂林行营访问孙逸仙，就国共合作问题进行了友好讨论，但未作决定。1922年夏，孙逸仙由广州出走，在上海遇到俄国代表，毅然决定国共合作，同意让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1923年1月26日，他和苏俄代表越飞谈判之后，发表联合宣言，宣称苏维埃制度虽然并不适合中国，但是宣布苏联愿意在原则上同国民党合

作，以从事统一中国的斗争。关于国共合作和国民党改组的初步计划，其后由越飞和孙逸仙信托的副手廖仲恺在日本举行的讨论中拟订了出来。

孙逸仙决定和苏俄合作，并非由于他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对此历来很少兴趣。他所希望的是从苏联获得军费、军火和顾问等各方面的军事援助，以便重新取得广东作为革命据点，进而统一全国。《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之前，许崇智的东路讨贼军、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即已把陈炯明赶出了广州。1923年2月中旬，孙逸仙重回广州，组成新的军政府，自任大元帅。为确保在广州的地位，他于1923年春、夏继续对强有力的陈炯明的余部及以前的同盟者、此时已与直系勾结的沈鸿英的势力开展防御性的军事活动。直系军伐的进犯，使孙逸仙十分愤慨，他斥责直系头目曹錕经过贿选当上总统。他公开声称愿意联合张作霖、段祺瑞以推翻曹錕。

国民党的改组

军事问题是当时最主要的问题，因此一直到1923年10月后，孙逸仙才能全神贯注于国民党的改组问题。1923年夏，他邀请共产国际派代表去广州协助改组国民党。10月6日，苏联顾问鲍罗庭到达广州，并很快得到孙逸仙的信任。几星期后，孙任命他为国民党的特别顾问。在其后的几个月里，鲍罗庭及其一行对指导国民党实行政治、军事的改组起了决定性作用。由于鲍罗庭的建议，孙逸仙任命了九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其中包括林森、邓泽如、廖仲恺和共产党人谭平山。10月25日，委员会成立，其任务是：起草新党章、政纲、宣言；审查省和地方新支部的建立；筹备1924年初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委员会在三个月内完成了这几项工作，1924年1月20日，孙逸仙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期十天，出席代表一百九十六人，通过了由孙本人及委员会提出的新党章及其他有关改组问题的决议。

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明显地反映出了苏联政策的影响，尤其是在党的组织和革命策略等问题上。国民党章程由鲍罗庭用英文起草、经廖仲恺译成中文，按照俄国共产党的路线，把国民党改组成了一个有严格纪律的金字塔形的政党，建立起了自上全国代表大会，依次而省、市直至地方党组织的权力结构。全国代表大会两年召开一次，休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

关，下设各部，分别掌管组织、宣传、工、农、青年、妇女、调查、军事各项工作。中央监察委员会与中央执行委员会平行，亦由全国代表大会选出，其职务系审核中央执行委员会经费，审查政策执行状况，审议党的官员的言行。只是在设立由孙逸仙担任的国民党终身总理这一点上，国民党的机构才与苏联的原型大不相同。改组后的国民党受苏联影响的另一个例证是，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对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虽然它对孙逸仙政治哲学的基本信条并无改变，但是把民族主义的主旨规定为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争取自身解放，并强调一个强大、统一的党的政治领导对于进行民族革命的重要性。苏联的影响还表现在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即使没有在文字上，至少在精神上确定了尔后中国共产党人称之为孙逸仙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行动路线。

根据这一精神，1924年1月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末次会议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中包括三名共产党员，第二天又决定谭平山为党的极其重要的组织部的部长，另一个共产党员林伯渠为农民部长。虽然如此，孙逸仙及其亲近的助手对党组织仍然拥有无可争辩的控制权。对孙逸仙在党内领导地位的最大挑战并不来自共产党，而来自他的某些老同事中那样一些保守分子，如张继、谢持、邓泽如，他们据有了五名全权中央监察委员的三个席位，坚决反对接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1924年6月16日，这三个人给中央执行委员会递送了一项弹劾共产党员的决议案，但在7月3日被驳回。7月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一项声明，呼吁党员解除误会，重申三民主义是取得革命成功的唯一方案。声明的目的在于解除这些保守分子的疑虑，防止国民党分裂成为左右两派趋势的发展。为了加强国共合作和约束右派，孙逸仙决定加强中央和他个人的权力，设立了由他直接掌握的十二人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为国民党的最高决策机关。

军事建设

自从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后，孙逸仙和他的顾问奠定了一个强大的政治军事机构的基础，终于在1927—1928年间取得了全国政权。但是，当时国民党在广州的地位还是不稳固的，因为孙逸仙自己还没有足够的武力，而不得不依靠在广东的滇、桂、粤军阀势力不可靠的支持。因此，改组后国民党的迫切

任务是征集、训练一支军队，它必须直接接受党的领导，并为实现党的民族革命的目标而努力。1923年廖仲恺和越飞谈判的结果是计划建立一个党的军事学校，而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在离广州几十里的黄埔建立军校的提案。1924年5月选定第一批学生，孙逸仙任命蒋介石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孙既对军事训练也对民族革命政治方针的灌输很关心，因此他任命廖仲恺为黄埔军校党代表，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等他最亲密的信徒为政治教育。

国民党军队正在计划训练的时候，广州革命政府依然还在危险的境地之中：陈炯明不断从东面进行军事威胁，桂、滇系军阀不仅不把孙逸仙的政府放在眼里，而且对新创立的黄埔军校抱有怀疑和敌意，在广州市内，则有当地商人建立的强有力的民团组织广州商团的不时捣乱。所有这一切困难，都没有能改变孙逸仙北伐的计划，1924年9月，孙逸仙率师进入粤北准备北伐江西、湖南。作出这个决定的部分原因是打算联合张作霖、段祺瑞等人再次努力推翻北方直系军阀的统治。但是，孙逸仙把大本营设在韶关后，广州商团暴乱。孙逸仙即令当时在广州的国民党高级领袖胡汉民，把在广州的所有部队统交蒋介石指挥，10月中旬商团溃败并被解除武装。然而，正当孙逸仙准备就绪即将北伐时，直系军阀被张作霖、冯玉祥的联军击败，曹锟被赶下总统位置。

最后的行程

当张作霖、段祺瑞邀孙逸仙去北京商讨国事时，孙逸仙从这个姿态里看到一个机会，以便他提出召开国民会议，根除军阀主义、帝国主义，达到和平统一全国的目的。因而，1924年11月13日，孙逸仙指定胡汉民主持广州政府，他本人由戴季陶、汪精卫等人伴同去北京。孙逸仙途经上海、日本，12月4日抵天津，年底到达北京。北京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事前已宣布召开“善后会议”，为召开国民会议作准备。孙、段之间几经函电商谈，终因段祺瑞反对工、农、商各界代表参加国民会议而破裂。段祺瑞一意孤行，决定召开没有国民党参加的国民会议。

孙逸仙与段祺瑞进行这些无结果的谈判时，已身患重病。他在离开广州前数月已有病，抵天津后病情急剧恶化，以至需用救护车送往北京医治。1925年1月26日进协和医院，经外科探查肝脏和其他部位均有癌症，无法进行手术治

疗。于是他迁往顾维钧家，由他的亲密同事和亲属奉侍，在临终前他签署政治遗嘱和个人遗嘱。他的政治遗嘱以后称之为“总理遗嘱”，系汪精卫起草。在遗嘱中，他期望国民党同人依据他在主要著作中提出的主张完成国民革命事业。孙逸仙《致苏联遗书》，系陈友仁用英文起草，重国民党在反对西方帝国主义、谋求中国解放的斗争中和苏联合作的政策。他在遗书中说道：“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取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这个文件后来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争论，有一些国民党员认为临终前的孙逸仙不可能仔细研究其内容。孙逸仙的私人遗嘱规定将他的仅有财物书籍和在上海的寓所，归于他的第二个夫人。3月12日，在签署这些文件之后的第二天，孙逸仙与世长辞，终年五十九岁。孙逸仙的遗体由北京协和医院医生刘瑞恒、斯蒂文森作了保存处理，以供后人瞻仰。3月19日，孙逸仙的个人基督教葬礼在协和医院附近的教堂中举行。段祺瑞通令举行国葬，孙逸仙遗体停灵数日后移往西山一个寺庙内。

孙逸仙死后，亲属有前妻、后妻，一女，一子孙科。孙逸仙18岁时与本村商人女儿卢慕贞（1867—1952）结婚，她是孙的三个子女的母亲。长女孙瑛于1913年去世；次女孙婉生于1896年，1921年与受美国教育的外交家戴恩赛（1892—1955）结婚，戴曾任国民党政府驻巴西公使。在1911年之前孙逸仙漂泊外国的大部分时间里，孙逸仙的前妻、子女和孙逸仙的母亲都住在夏威夷孙的长兄处。此后家属中的多数人移居澳门。孙逸仙在1914年10月25日和宋庆龄在东京结婚。宋庆龄直至孙逸仙去世始终是他的经常伴侣，并且在他去世以后，作为遗孀，成了孙逸仙的学说的一个活着的象征。

孙逸仙的著作

孙逸仙是一个先知，但是他的大部分经历并不为国内人士所称誉，一直到1911年革命时才受到高度评价，二次革命时，舆论又转过来抨击他。此后数年中，他多次从事军事活动又卷入军阀纷争的政局。这一切得不到疲于战争的中国人民的热烈响应。他因过分地一再宣布从事军事征伐而被讥讽为“孙大炮”。当然，在孙逸仙的亲信中，他的意愿就是法律，他的领袖地位是无可争辩的。孙逸仙去世后，国民党的首脑们采取措施保持对孙逸仙的崇敬和怀念。1925年

5月16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特别会议，一致同意把他的“政治遗嘱”作为国民党今后决策的法定方针。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出于对已故领袖的尊敬，此后继任的首领都不得充任“总理”这一职位。孙逸仙身后的声誉是与国民党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自从国民党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以后，对孙逸仙的崇拜便由党内推广到全国。他的胸像、画像开始出现在所有的公共建筑物和办公室内，钱币、票据和邮票上印有他的像相。“中山”这个名字，原来只有早年的追随者才知道，现在成了他家乡的县名，以至全国许多公园、街道、学校以及其他机构的名字。1929年，他的灵柩由北京移往南京的陵墓内，这个陵墓是建立在明朝第一个皇帝明孝陵附近紫金山上用大理石砌成的雄伟建筑。为了表达对他的最高敬意，国民政府于1940年4月1日通令全国尊称孙逸仙为“国父”。孙逸仙长期的革命经历，他著作中的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他联俄联共的政策，也使孙逸仙在中国共产党缅怀的民族英雄中占有特别荣耀的地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中国共产党党的史学家誉为“革命先行者”，在许多全国性活动场合，孙逸仙的画像和毛泽东的画像并排悬挂。

在思想方面，国民党所采取的把孙逸仙神圣化的最重要步骤，是把他的遗嘱和其中提到的《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作为党的经典。《三民主义》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著作，在国民党取得政权之前和以后，它都是国民党进行宣传的思想源泉；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又成为学校课程的基本教材。据孙逸仙自述，他形成三民主义的理论，是得之于林肯“民有、民治、民享”思想的启示。这种理论最初见于1905年出版的为《民报》创刊号所写的声明中，那时还是一个笼统的概要。以后则经常见于他的演讲和文章中，但直到1917年他住在上海前都未作详细发挥。据国民党的资料说，孙逸仙在1920年带了这些新的著作到广州准备修订出版，但是由于陈炯明叛乱，他在1922年6月离开广州，这些著作草稿全都留在广州被烧毁了。《三民主义》的最后版本，乃是孙逸仙1924年1月至8月在广州的三部分演讲的记录稿。计有民族主义六讲，前有孙逸仙的序言，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于1924年4月在广州印行；民权主义六讲，于8月印行；民生主义四讲，在他启程去北

京后一个月于12月间出版。以后十六讲合成单行本，重版了多次。

《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从1905年宣布到1924年完成，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民族主义的含义，起先指的是推翻清朝的异族统治，恢复汉族的统治。1912年满清皇帝退位后，孙逸仙就很少提到民族主义了。1922—1924年间，由于国民党改组和孙逸仙对西方列强的失望及对苏联的向往，他对民族主义作了新的解释，认为民族主义是反对帝国主义在华统治的民族革命运动，这个革命的第一步是要废除西方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民权主义内容也多次增订，反映了孙逸仙政治态度的几次变化。孙逸仙关于民权的思想最先见于1905年同盟会的《军政府宣言》中，这种思想和西方的民主思想，特别是与美国的民主思想是极其相似的。但是孙逸仙认为在一个传统的皇权统治的中国，民主政治的实施必须经过三个阶段：第一，军政时期，成立一个由革命党领导的军政府来消灭专制势力；第二，训政时期，军政府在全国各地逐步建立民主自治政府；第三，宪政时期，军政府一开始就要解除权力并将其移交给由全国民众选举产生包括总统和国会在内的国民政府。随着孙逸仙在晚年对西方越来越持批评态度，他修正并扩充了他的民权主义，包括进一些他认为是对西方代议制民主政治的修改意见。他认为人民不仅应该有选举权，而且要有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政府的职能应由五个机构分掌，除按美国制度设立法、行政、司法机构外，还应增设考试、监察机构，而后两者又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历来就有的。虽然孙逸仙强调人民的政治权利，但他同时又不断强调在国民革命和训政时期，必须将领导权集中在革命政党手中。

孙逸仙民生主义的思想，是他多年来从西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撮取的观念的混合物。最早在1905年出现时，他主张把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改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他的“平均地权”的口号，乃是根据亨利·乔治关于“土地价值的增加被私人占有，是近代社会不平等的根源”这一论点而提出的方案。1912年后，孙逸仙又补充了实行铁路和主要工矿企业国有的内容。这个思想在以后几年中被笼统地概括为“节制资本”。孙逸仙宣称他的民生主义学说，既是社会主义，又是共产主义。他断言，马克思主义确是西方社会主义学说中值得研究的一种，但是对中国不合适，而其剩余价值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更

有明显的错误，而他本人的学说，是一种适合中国条件的社会主义的特殊流派，这种学说，可以使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避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弊病和不公平。

关于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孙逸仙为此写了他最长的一本书《建国方略》，这实际上是讨论中国建设各种问题的三种著作的合集。最早的是1917年2月在上海写成的《民权初步》，编入《建国方略》中改名为《社会建设》，此书是袁世凯死后不久着手写的，内容系探讨民国成立后建立民主政府屡遭失败的原因。孙逸仙对此的答案是由于民智未开，民众缺乏民主政治的常识。要纠正这个缺点，首先必须使民众熟悉组织民众集会和举行集会的程序，民众取得这方面经验后，才能在民主共和国里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利。第二种著作叫《孙文学说》，1918年底写成，后来改名为《心理建设》，该书的英文译文包括在孙著《一个中国革命家的回忆录》中。孙逸仙认为他精心制作的革命方案之不能为中国民众所接受，原因在于他们长期以来信奉“知易行难”的古老格言而形成的心理上的阻碍。为了纠正一种由于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学说而产生的谬见，孙逸仙努力说明他的“知难行易”学说的正确性。他用这个观点来说明中国现代化问题，认为群众一旦具有了应该做些什么的知识后，那就很容易把它付诸实施了。为了说明他本人已取得这种困难的知识，他写了他的第三篇也是最长的一篇论著《实业计划》，后来改名为《物质建设》，初稿系英文，后译成中文陆续在1919年的国民党《建设》杂志上发表，1920年又以《中国的国际发展》为题用英文出版。孙逸仙提出了促使中国迅速工业化的巨大计划，其中包括铁路、公路、运河、城市、海港、水力、炼钢、开矿、农业等各种建设项目。这个计划庞大得不切实际，孙逸仙把希望寄托于欧洲各国的巨额借款。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在经济上早就精疲力竭了。

与这本浪漫、遐想的著作形成对照的，是他的第三本主要著作，这就是他在遗嘱中提到的《建国大纲》，它以简明扼要的语言，提出了他对未来中国政府的二十五点设想。《建国大纲》写于1924年4月21日，规定中国革命的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说明革命政党的任务是把全国从军政时期通过训政时期导向宪政时期。他强调训政时期的重要性，要求国民党指导民众在县一级

实施自治的理论和实践，在宪政时期，要根据五权宪法管理人民，中央政府根据民权主义原则设立五院。1928年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就是根据这些政治原则组成的。

孙逸仙还写过许多短篇文字，其中大部分是政治论文，例如，1917年为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而写的《中国存亡问题》，1923年写的《中国革命史》。他的很少几篇自传性的文章也是饶有兴味的。他用英文写的记叙他于1896年在伦敦被清朝驻英使馆扣留经过的文章《伦敦蒙难记》，是1897年在布里斯托尔出版以后被译成中文。另一个短篇，分别以《自传》的名称发表，以后收入《孙文学说》作为该书最后一章，是关于他一生经历的最详尽的记载。

孙逸仙的著作已出版了很多种集子。最早的要算是1926年出版的四卷本《中山全书》，收集了他主要的理论著作和一些政论杂文。较为完备的是1930年出版的、由胡汉民编的五卷本《总理全集》，1960年张其昀主编、在台湾出版了《国父全书》。胡汉民、张其昀所编的集子，除了孙逸仙的三种主要著作外，还有许多政论、宣言、演讲和致同事及民国初年重要政界人物的大批函电。

孙逸仙的主要著作，涉及到自然科学、心理学、历史、哲学等许多方面的问题。但是他的主要精力是放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涉及到国家的管理和人民的福利，这些历来都是著名的儒家学者所注意的问题。但是孙逸仙同中国的这个学派很少接触，他与中国的思想和文化传统的关系也不深。他成年以后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国或中国的邻近国家度过的。他从早年起所受的又全是基督教教会学校和医学校教育。他是一个折衷主义的、不加批判的思想家，接受各种西方思想，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精心制作了宏伟而不切实际的方案。由于缺乏思想上的成熟性和内在的连贯性，他的著作像个混合体，把互不相关的事实、奇离的遐想、模糊的论断、大胆的曲解同激情的雄辩、高尚的理想主义、富有魅力的才华交织在一起。这些著作中的积极性，使孙的主要作品、特别是《三民主义》一书，在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把这些著作神圣化为国民党和全国的法定的教义，却造成了一种思想氛围，使他的追随者们在他死后不能从事真正创造性的思考。

孙逸仙的一生经历

孙逸仙在世时早已确立了作为国民党的无可争辩的领袖的地位，他去世后的二十多年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国内居于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为了取得自己的领袖地位，他表现出自己是一个天生的领袖。他具有个人的吸引力和天赋的打动人心的演讲才能。他能够运用自己不发生差错的勇气 and 理想主义、自信和对事业的献身精神，吸引了众多的信徒，并使他们保持忠诚。但是他作为革命领袖的一生，却充满着几乎是从不间断的流产的军事行动，令人沮丧的失败和仓促的流亡。诚然，这些挫折大部分是由于同他和他的支持者们为敌的政治军事势力的强大所造成，但其中的许多次失败也不能不归咎于孙逸仙本人。孙逸仙虽然具有不可否认的领袖才能，但他缺少知人之明，他待人轻信而近于天真，在采取一些重大的行动时，他总是轻信别人给予支持的保证，而结果却是遭到巨大损失。他一再失策，但始终自信极强，在晚年他认为自己是不会失误的，这种信心使他容易相信吹牛拍马者的奉承讨好而听不进即使是他最信赖和亲密的同事的谏诤之言。刚毅、热情、急躁，他盼望从速取胜而不顾一切实际困难地投身于多次军事行动，结果是大量的精力和金钱在徒劳无功的争战中消耗。孙逸仙对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同外界联盟问题上亦是变化多端，缺少预见，因此在他的信从者之中引起了踌躇、混乱以至于责难。

孙逸仙虽然有这些弱点，但是他被他的国人视为近代中国最伟大的人物。要了解这样一种评价，必须看一看孙一生所处的历史背景。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无所谓原则道义，贪财忘义、唯利是图、相互背叛和使用暴力成了通例。孙逸仙成了真诚、无所畏惧的理想主义、不可腐蚀的尊严的象征，他是无私地把一生献给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形象。时间的流逝和他的党的努力，已把他个人的败绩从这个形象上驱除掉了，这个形象俘获了、保持了他的国人的想象，并使他在人们心目中成了一个卓越人物，这个人物为了使中国变成现代国家而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斗争。

宋哲元 字：明轩

宋哲元（1885.10.30—1940.4.4），冯玉祥部属，1930年任第二十九军军长。他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时卷入了1937年前华北地区的中日冲突。

宋哲元出生在山东乐陵的一个读书人家，自祖父辈起，历代都有功名，但宋哲元却决心从军。他进入冯玉祥舅父陆廷章的左路备补军随营学校，受训毕任冯玉祥部第二营哨长。1913年陆廷章部改编为京卫军，冯玉祥任该军第一团团团长，宋任连长。1914年任冯军第十六混成旅副营长，1915—16年间转战河南、陕西、四川。1916年，宋哲元和张素卿（译音）结婚后升为营长，派往河南募兵。1917年7月，张勋复辟时，宋哲元率部进攻北京击败张勋的部队。

1918—1921年间，宋哲元驻守湖南常德，其间一次混战中，因宋的部属击伤了三名日本海军人而发生了小小的外交纠纷，宋哲元妥善处理此事，冯玉祥在1947年于上海出版的《我的生活》一书中曾加以称赞。1921年第十六混成旅在陕西攻打陈树藩有功改编为第十一师，宋哲元任团长，1922年参加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冯玉祥亲自率军攻打河南省长的军队，宋哲元作战有功，升为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长。第二次直奉战争及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北京兵变后，冯部改编为国民军，宋哲元任第十一师师长。1925年秋，宋哲元卸却战地指挥职务改任热河都统。

1925年冬，冯玉祥的国民军又称为西北军，与张作霖、吴佩孚发生战争。次年4月15日，冯玉祥辞职，撤出北京，宋哲元去张家口和张之江、鹿钟麟经营冀察绥晋边界地区以作据点。西北军在南口坚决阻击得免于溃散。他虽未直接参战，但身任北路军、西路军总指挥，在南口防御战中起了重要作用。经四个月苦战，西北军撤至绥远，宋任绥远都统。

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重集旧部，宣布支持国民党，西北军改称为国民军联军，1927年5月又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支持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而不支持国民党左派的武汉政府，1927年6月，宋哲元任第四方面军

总指挥。11月，他兼任陕西省主席。1929年初冯玉祥同蒋介石关系紧张时，冯去山西，任命宋统率他在西北的部队。10月10日，宋哲元等十名国民军将领通电冯玉祥和阎锡山，谴责国民政府的政策，敦促采取补救行动。第二天，国民政府下令通缉宋哲元和国民军其他军官，并宣布讨伐。宋被任命为国民军总司令，10月中旬与国民党军队在河南遭遇。11月底，宋部被迫入陕西，他卸职给鹿钟麟，改任第三路总指挥。1930年3月，冯阎组成反蒋的北方联盟，5月到9月间，双方作战，张学良使蒋介石取得了胜利，冯部改编为国民政府的军队。1930年11月宋哲元任第二十九军军长。

1931年9月沈阳事变时，宋哲元发出通电，提出与入侵日军作战，虽未能促成国民政府的抗日，但1932年7月他任察哈尔省主席后，却有机会对付日军的威胁。1933年1月20日，二十九军奉命增援热河，2月10日，宋部在要地喜峰口设防。二十九军在喜峰口、罗文峪阻击日军进入热河，但于4月和5月相继放弃喜峰口、古北口。5月31日塘沽协定签订。当时，宋哲元成了“喜峰口英雄”。日军侵占了热河又向察哈尔进军，冯玉祥复出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察哈尔地区清除日军，但南京政府一意避免与日方发生武装冲突。宋哲元未参予冯玉祥和国民政府之间的争执，设法进行调解。8月，冯玉祥解散军队并辞职，宋哲元就任察哈尔省主席。1935年5月调任平津卫戍司令，正好与何梅协定签订同时。尽管群情反对何梅协定和华北自治的活动，国民政府却于11月撤消了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华北的大权转入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的新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并兼任河北省主席、冀察绥晋署主任，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任天津市市长，二十九军副军长、察哈尔省主席秦德纯任北平市长。二十九军牢牢掌握了察哈尔、河北的行政权力，宋哲元乃于1935年12月就任各职。

这个期间日本的计划是要将冀鲁晋察绥变成日伪自治区，二十九军同意此举。国民政府则要求推迟实行，以利用时间使全国做好迎接即将来临的冲突准备，因而不愿承担向日本出让领土和主权的责任。宋哲元的这些活动是与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共同进行的。1936年11月，宋的河北省主席一职由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继任。西安事变前后，日军对宋、韩的压力不断增加。宋哲元既不愿屈

从日本，又不愿根据国民党同意的统一战线政策同共产党合作，他自觉无能为力，于是离开北平去乐陵扫墓。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导致中日战争爆发，芦沟桥冲突直接牵涉到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宋哲元立即离乐陵到天津，7月12日和日军司令谈判，日军要求不必照南京而径直实行华北自治，否则即行诉诸武力。7月25日，日军强大纵队沿平津路采取行动，第二天占领了廊坊。26日，日军要求三十七师于7月27日正午撤出芦沟桥地区，遭宋哲元拒绝。7月28日夜，宋哲元率部离平，北平旋即沦陷。然后日军又占天津并向西南方面挺进。宋哲元对华北失守自任其咎，于7月28日向南京提出辞呈。南京政府不准其请，反而将二十九军及其他部队合编为第一集团军，任命宋哲元为总司令。宋哲元司令部所在地保定于9月24日为日军所占，宋又向南撤。第一集团军调往临沂、徐州，掩护台儿庄战役后中国军队的撤退。宋哲元直属部队在冀鲁豫边界的要地新乡集中。但日军装备优良，宋军虽奋力抵抗，新乡仍为日军轻取。宋哲元原有的一度很强大的二十九军溃散，遂于郑州向蒋介石辞职，蒋接受他的辞呈，宋改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职，不久以病为由而离职。1939年秋，宋哲元到四川绵阳他结婚的旧地。1940年4月4日死在绵阳，国民政府以后追封宋为上将。

宋教仁 字：遁初 号：渔父

宋教仁（1882.4.5—1913.3.22），国民党创始人，后被袁世凯手下刺死。

宋教仁生在湖南桃源，他的家世和早年受教育的情况不详。十二岁时，父亲去世，由他的长兄维持家计。1889年春进漳江书院，1902年冬考入武昌文普通道中学堂，该校系张之洞所创办。不久俄国侵占满洲大片地区，在学生中激起强烈的反俄反满情绪。1904年初他加入由日回国的湖南学生黄兴等人所组织的华兴会。1904年中他和在武昌的同学组织了科学补习所，用以掩护华兴会在学生和新军士兵中进行吸收成员的活动。这些青年革命党人准备乘同年11月为慈禧太后祝寿之际在湖南五个地区举行起义，宋负责组织常德的起义。但是月初

这个密谋活动为政府当局发觉，宋教仁被迫逃往日本。

1904年12月中到1905年6月，宋教仁一度在宏文学校学习法律、物理、师范、政治等课程，以后进了法政大学。他在日本进行反满活动，1905年6月创办革命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7月，孙逸仙到日本，宋教仁、黄兴及其他革命党首领与他相见，讨论将各反满社团合并组成新的革命联盟中国同盟会。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成立，孙逸仙为会长，宋教仁为司法部检事长，以《二十世纪之支那》为同盟会机关刊物，但因该刊有一期曾被日本当局没收，所以改名为《民报》。

1906年2月，宋教仁改名宋璉进了早稻田大学。他隐瞒了自己的身份，得以从驻东京的中国使馆领取官费。不久，他注意研究朝鲜、东北的地理及其现代历史，认为这一带边界地区的马贼可以作为革命党的潜在盟友。他和黄兴商量后，同几名伴侣去辽东，争取马贼的支持并为革命党人在东北多找一个立足点。但是由于该地区清军的警觉，宋教仁的使命受挫，乃又回到东京。

宋教仁注意朝鲜这东北边境的另一个后果是他间接卷入了所谓间岛问题。间岛是图门江向满洲一方的一片不小的地区，住满了朝鲜族居民，朝鲜政府和满清政府对其主权久有争论。日俄战争后，朝鲜政府在日本的支持下重提间岛问题，强迫满清政府与之谈判解决。宋教仁仍用假名宋遁写了一本小册子《间岛问题》，1908年8月在上海出版，还送了一份给外务大臣袁世凯。据说，这本小册子对中国的谈判者有利，宋教仁遂被授以官职。1909年9月4日终于签订了间岛协定，规定朝鲜居民可在该地居留，但重申中国对该地区居民及领地拥有法定主权。

1908年，革命党人在国内起义多次失败，在东京的张继、章炳麟等与《民报》有关的老同盟会成员，要求撤销孙逸仙的领袖职务而以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同意这个建议，但经黄兴的劝阻他们未采取行动。宋教仁继续研究政法问题，进行写作，又翻译日文书籍。1910年夏，他会见在东京的老同盟会首领居正、谭人凤等人，检讨同盟会的军事计划，这个计划把目标集中在中国的华南和西南，业已遭到重大失败。他们认为军事行动目标应转向华中，因此需要在上海设立中部同盟会。他们派谭人凤去香港华南同盟会总部向黄兴报告这个计划，征求他

的同意。黄兴认为，如能筹得经费，可以设立中部同盟会。

1910年末，宋教仁离日本去上海，应于右任之请，担任于右任的《民立报》主编，并负责筹设中部同盟会。4月间又应黄兴之召去香港，他的活动，被迫中断。他协助筹划袭击广州，一度在黄兴的总参谋部负责处理法律事务，拟订各种规章制度。4月，广州起义失败，宋教仁回上海。7月31日，他和居正、陈其美等人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开始组织和协调长江一带的革命起义，尤其注重武昌、汉口两地。

1911年10月10日起义发生后，宋教仁陪同黄兴到革命活动中心的武昌，他和居正及湖北省议会议长汤化龙起草《鄂州临时约法》，筹划在武昌召集各省代表会建立临时政府。当时武昌仍处在战火之中，代表会遂于11月30日在汉口英租界召开，此时宋教仁已返回上海。代表会议转移到上海。孙逸仙回国后，宋教仁作为湖南代表，于12月29日参加选举孙逸仙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宋教仁任法制局长，负责拟订民国法律规章。他认为“责任内阁制”是中国民主政府应该实行的最好制度，内阁对国会负责并服从国会，内阁总理为政府首脑。1911年12月制定的“临时政府组织法”并无总理或内阁的条款，而将大权集中于临时大总统之手。后来，当袁世凯很明显的将继孙逸仙为大总统时，临时约法内容的制订者遂将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规定临时大总统任命内阁员。派遣驻外使节、宣战、议和、订约需得国会通过。临时约法还规定约法公布后十个月内召集国会。

孙逸仙在辞去大总统职务之前，曾得到袁世凯保证维护在南京拟订的临时约法。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任临时大总统，翌日公布临时约法，他遵从约法确定阁员，但指定其老朋友唐绍仪为总理，又以他信赖的部下担任陆军、海军、内政部等关键性职务，以控制内阁，但宋教仁及其三名同盟会会员却负责不甚重要的部门。宋教仁虽然察觉农林总长是一个没有多少权力的位置，但他仍热心于参加新政府。1912年4月4日，临时国会移到北京。不久表明，袁世凯显然无意与总理或内阁分享权力，他在任命官员时的独断专行引起了和唐绍仪的冲突，唐乃于6月中辞职。宋教仁和同盟会的另外三个阁员支持唐绍仪，在唐离京后不久也提出辞职。

宋教仁在唐绍仪内阁中的短短经历，使他深信如要使议会制度在中国取得成功，必须建立一个有力的内阁以约束实行独裁的袁世凯；而要使内阁在政治上有效能而又向议会负责，则必须创立一个强大的政党以取得规定于1912年12月举行的国会选举中的多数。经宋教仁的努力和他的影响，同盟会和临时国会中的另外四个政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党）合并组成的国民党于8月25日成立，孙逸仙为理事长。孙逸仙那时对建设铁道比政治活动更为重视，他于9月中旬离京，委任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成为事实上的国民党首领，他于1912年秋去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开展竞选活动，争取国民党代表选入两院议会，他本人进入内阁。1913年初选举结果表明，国民党将在议会中占优势，在众议院596席中占269席。这次选举也是宋教仁个人的一次胜利，许多人认为他可能出任新内阁的总理。

宋教仁醉心于西方的议会制度，他在1912年底至1913年初的政治活动中努力把欧美的竞选方法引进中国，因此他作了多次竞选演说，攻击北京政府及其施政方案，公开批评政府及政府首领，这在西方是习以为常的政治策略，而在中国却是新奇的，因此引起了袁世凯及其他有权势的保守人的敌视。同时，由于他强烈主张建立政党内阁制的政府，而且看来很有可能领导新的国民党内阁，这将使袁世凯面临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1913年3月20日，当宋教仁在上海车站乘车去北京时，被人刺杀，腹部中子弹两颗。两天后去世，这正好是他三十一岁生日前两周之日。他还有母、妻、子女各一人。

宋教仁的被刺立即引起轰动。他死后即有两人在上海被捕并被控有罪。在他们的住处发现了内阁总理赵秉钧、内阁秘书洪述祖的书信文件，表明袁世凯预知这一密谋。袁世凯虽然能够从这个案子脱身，其他人就不那么幸运了。一名刺客死在上海监狱，另一人越狱逃走后又于1914年1月在京津路火车上被别的不知名姓的刺客杀死。当时任直隶都督的赵秉钧于1914年2月27日突然死去，仅有的嫌疑犯洪述祖逃到青岛外国租界，一直住到1916年6月袁世凯死去。洪述祖于1917年改名到上海，却被宋教仁的儿子宋振吕和宋教仁的秘书刘白所识破。他在上海受审，后被递解到北京，判处死刑，于1919年4月5日处死。

宋教仁的暴卒对中国的民主政治运动是一个沉重打击。谋刺经过调查情况

的披露把袁世凯同国民党之间的政治利益的冲突公诸于众，从而引起了1913年的二次革命。国民党丧失了强有力的政治领袖后，开始分裂成不同派系不再成为实际政治力量，一直到十年后孙逸仙实行改组时，国民党才恢复了如同1913年时所拥有的那种实力。

宋汉章

宋汉章（1872年— ），银行家，在中国银行工作几达五十年之久，多年任该银行总经理。

宋汉章原籍浙江余姚，生在福建建宁，父亲是商人。早年在本地私塾读书，后去上海进英华学院，1889年毕业后，当了中国电报局一名会计，1895年考进上海海关，第二年调往宁波海关工作。

1898年，宋汉章离海关进银行界，进入了盛宣怀前一年在上海创办的国内第一家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该行有两名经理，一名是英国的职业银行家，一名是中国钱庄业中的重要人物。该行将英国的管理经验同中国钱庄经营中的优点结合在一起，因此宋汉章在该行服务的十年间，学到了银行工作的丰富经验。

1908年，清政府的户部银行决定在北京开设储蓄部，要宋汉章主持经办。户部银行改为大清银行后，宋汉章调任上海分行任经理。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大清银行上海分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尔后大清银行北京总行成为中国银行的总行，宋汉章任上海分行协理，1913年升为经理，张嘉璈为协理。

宋汉章竭力设法提高上海中国银行的信誉，虽然中国银行后来实际成为中国银行界的首领，但在初期发展中曾遇到不少困难，既有外商银行，本地钱庄，三家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宁波商业银行、全国商业银行）的竞争，而且中国银行又是官方银行，公众根据过去经验，对它很不信任。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宋汉章依从西方各国的经营方法谨慎从事，例如，他不发放无抵押贷款，即使对政府机关也是这样。他也不准将上海分行的资金转移到其他地区。经此种努力，他逐渐取得了公众信任。1916年提高公众信任的进程加快了，

当时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拒绝执行北京下达的延期支付存款和停止银行券兑现的命令，那时袁世凯为复辟帝制急需经费，乃向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下达上述命令。张嘉璈对此竭力反对，宋汉章也同意张的意见。

当时中国银行各个分行独自发行货纸，纸币上印有该行名称，使人便于确认发行单位，这种办法很快使公众提高了对上海分行纸币的信用。1922年，江苏、浙江、安徽各分行将发行纸币事宜都交由上海分行控制，发行纸币所需的储备金也都转到上海，上海分行发行的纸币通行上述各省，这说明其信用高于这些省的分行。1928年，上海分行组织了有上海商会、上海银行公会、上海钱业公会的代表参加的委员会查核纸币发行情况，当时上海分行发行的纸币约占中国银行纸币总额的百分之六十。1935年实施货币改革采用统一的纸币法币时，中国银行的发行额约占全国各银行发行总额的百分之二十。

宋汉章在银行界处事敏捷表现在他对发行纸币所需储备金的处置上，当货币市场利率上升时，他就把大部分储备金向上海银行界发放短期抵押贷款，当秋收时需用银元采购农产品时，他用银行储备的银元平抑市价。自1915年起，他在储存百分之四十的币值以后，也把中国银行掌握的货币供应其他银行，这使其他银行也从纸币的发行中分享到利益。这个措施大大促进了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和银行界的合作。

1928年，中国银行改组为外汇银行，宋汉章被提升为常设董事会董事。不久，他又以五百万元法币筹办了中国保险公司作为中国银行的辅助机构。他聘请英国保险业专家创办这个新机构并训练中国职员，他自己也很快掌握了保险行业的经营之道和实际业务知识。中国保险公司在国内虽非最大的保险公司，但信誉很高。

1934年—35年，中国银行改组，宋子文任行长，张嘉璈辞去总经理之职就任铁道部长，宋汉章保留常任董事之职，并再次出任总经理，他使中国银行进一步发展成为外汇银行，同时又创办了储蓄部。中国银行通过大量资助生产消费品的工业企业、铁路和发放农业合作信用贷款，对发展中国经济作出了贡献。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银行总行在整个战争期间迁在重庆。宋汉章

协助国民政府实施其财经政策，在中国西部建立新的办事机构，并开办一些工业企业。1948年他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1949年中国共产党人掌管大陆时，他退职去香港，1950年他去美国，1951年去巴西。他在七十九岁时又开始了新的生活。1960年，他回到香港，和他当牙科医生的小儿子住在一起。

宋汉章一生的特点在于他活动时间很长，而且全部都在中国国内，为时达五十年之久，他勤勤恳恳为中国银行工作，使其成为首屈一指的银行。他又从事社会活动，任上海市工部局顾问，支持华洋赈灾会的工作，任该会主席十多年，又在余姚家乡创办了阳明医院。

宋希濂 字：荫国

宋希濂（1906—），黄埔出身的国民党将领，四十年代初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1946—47年任新疆警备司令，后调往华中，1949年被共产党俘虏。

宋希濂湖南湘乡人，出生在书香门第，父亲是个官吏。青年时宋希濂是一个有才能的学生，二十年代初进长群中学，在那里接触了孙逸仙的学说。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后，他去广州进黄埔第一期，是最年轻的学生。他在校时，参加了第一、第二次东征，作战中表现出色。毕业后，参加北伐，任二十一师营长，赣、浙作战时在桐庐受伤退役。伤愈后去日本深造，学习军事。他因反日活动，曾一度入狱，但仍按期在日本步兵学校和参谋学院毕业。

1930年5月回国后，宋希濂任第一教导师参谋，1930年参加反阎冯北方联军之战升任营长，以后一度任第一教导师团长，又调任教一师六团团长。1931年冬升为教一师二旅旅长，教一师改编为八十七师后他续任旅长。1932年1月参加淞沪战役抗击日军，战争结束后，八十七师回防南京，宋希濂任副师长。

1933年，宋希濂任三十六师师长，驻江西抚州，在浒湾打败红军，不久，奉命去福建参加扑灭陈铭枢、蔡廷锴的福建事变，以后又回江西参加围剿共产党，后者不久就离江西开始长征。1935年春，宋希濂调往沪宁地区。西安事变时，他的三十六师北上，准备对张学良的同僚杨虎城，于学忠的叛军采取行动。1937年2月，宋希濂任西安警备司令，他的第三十六师是西安事变后第一

批进入西安的国民党军队。

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后，宋希濂派往上海前线。该地区失守后，有十名军官和三十名军官因贻误军令被分别处死和撤职。宋希濂亦被擢去三十六师师长之职。1938年又任荣誉一师师长，不久在武汉地区抗击日军有功，升为七十一军军长。1939年冬任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那时他三十三岁，是最年轻的集团军司令官。1941年十一月改任第十一集团军司令。1942年5月，日本企图进占滇西，11集团军即调往该地，初战失利，龙陵、腾冲失守，但宋希濂率部在怒江边成功地阻截了日军。

1944年5月，十一集团军在萨尔温江之战中的表现使它的声誉有所减低。宋希濂军的目标是滇缅公路及其两端的日军据点，6月进攻龙陵时，宋军未能集结而被少数日军击退，接着又继续撤退。十一集团军这次在日本一支守备小队手中的失利使卫立煌利用初战胜利的企图归于泡影，结果，宋希濂被免去战地指挥职务，改任中央军校分校主任。1946年，宋希濂却得到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颁发的勋章，同年3月去兰州任张治中的参谋长，协助张治中治理新疆。同年冬任新疆警备司令，支持哈萨克族奎雷部落起义反对伊犁政府，并与支持汉族的哈萨克首领乌斯曼订约。伊犁当局就宋希濂的所作所为提出抗争，宋遂被调往华中，任剿匪副司令。

随着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内战的激化，国民党在华中、华南的地位形将崩溃。1949年初，宋希濂任川湘鄂边区司令。不久，他的军队在刘伯承的部队到达前先行撤退，共产党军队进入西康草原追上了宋希濂和胡宗南。宋希濂被俘，此后情况不详。

戴爱莲

戴爱莲（1916—），著名的舞蹈艺术家，她把传统的舞蹈形式发展成为专业的民族艺术，1955年任新成立的北京舞蹈学校校长。

戴爱莲的父母在她出生前就由广东迁往特立尼达。她在幼年时就显示了舞蹈才能，1931年去英国德文郡达丁顿的裘斯舞蹈学校学习。她也在安东·道

林、玛格丽特·克拉斯克指导下，学得一些电影、舞台技巧。1940年她回国后开始研究中国的传统舞蹈。

她在回中国本土之前，先到香港作了几场专业演出，最后一场是1941年1月22日在皇家剧院演出的。这场募捐演出的“余兴”节目中有一个新的舞蹈剧《东江》，是取材广东民间舞蹈编成的。她从香港到桂林演出两场，又在贵阳，重庆演出。在此期间，她在学生及助手们的帮助下，开始研究中国地方舞蹈。由于她汉语水平不高，上课时还要用英语讲课直至她掌握了足够的汉语为止。

戴爱莲在重庆国立歌剧学校、社会教育学院及陶行知的育才学校教书。她还自己组成剧团“中国芭蕾舞团”，到战时可能到的地方旅行，研究地方舞蹈并在重庆以“中国舞样”的总称予以演出，她最显著的成就之一是从中国土耳其斯坦人那里吸收了几个维吾尔族舞蹈。剧团也到新疆和西藏去过，带回了那里的舞蹈。太平洋战争结束时，她已是著名的舞蹈艺术家了。1946年，她把自已的剧团改名为“中国民间音乐舞蹈研究会舞蹈团”。

1946年夏，她和在重庆结婚的丈夫画家和漫画家叶浅予同去美国，叶浅予系应美国国务院之请去作文化交流活动的。在国外的一年中，她在纽约作有关舞蹈艺术的演讲。1947年8月回国，她和一些学生在上海开办了中国舞蹈学校。1949年她去华北，企求实现她对舞蹈的演出和研究所抱的期望，共产党当局对她这个打算给了很大鼓励。

1949年，新政府把秧歌舞传遍全中国，这是由原来简单的反映种庄稼动作的舞蹈演变成中国革命的流行舞蹈小品。学生和儿童们在城镇的街道上到处排成长队蜿蜒地随着腰鼓的节拍跳着舞。秧歌及由此派生出来的舞蹈盛极一时，超过了别种舞蹈。不久，随着初期革命热情的消退，秧歌开始让位，随之而起的是传统舞蹈。戴爱莲是复兴传统舞蹈的主要人物。1949年夏，她出席第一次全国文艺界联合会代表大会，全国文联是共产党用以控制文学艺术领域的主要机构。以后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任了一系列行政职务，其中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之职。

1953年初，她在两名音乐家陪同下旅游全国，研究和记录各地的舞蹈形

式。1955年，她出任新建立的北京舞蹈学校校长，这是中国第一所舞蹈学校。课程和训练内容由苏联专家协助制订。该校选取十一岁到十四岁的学生，进行为期七年的教学，传统的中国舞蹈是基本训练，也进行一些西方芭蕾舞的初步训练。对国内各少数民族和亚洲各国的舞蹈也很注重。目的在通过以上这些内容，努力创作出全国性的节目。1959年北京舞蹈学校设立了实验芭蕾舞团，由此发展出了一些很有才能的剧团。戴爱莲作为学校的教师，设计了为学生及全国性剧团演出的许多舞蹈节目，她对该校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1954年后，她还担任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副主席。

戴爱莲是舞蹈艺术的创始人。诚然，在她1942年回国前，也曾有一些人在舞蹈方面作过试验，但是由于她的深刻研究，她的艺术才华，她的创造性，才使中国的传统舞蹈发展成为由专业演员上演的真正全国性艺术。

戴季陶 字：传贤 号：天仇

戴季陶（1891.1.6—1949.2.11），新闻记者，孙逸仙的私人秘书。1925年孙逸仙死后，成为对三民主义作反共解释的权威。自考试院1928年成立起，他一直担任该院院长至1948年。晚年虔信佛教，退出政界。

戴季陶的先辈于十八世纪从浙江吴兴老家迁到四川，在成都北面的广汉做陶瓷生意。戴在广汉一所私立学校读古书，1901年未能考上秀才，乃到成都上学准备去日本。他父亲是外科郎中，1903年死时戴才十三岁。1904年，他当了一个日本中学教师的助手和翻译，1906年去日本留学。家里卖了几亩田供他留学。他在东京进了日本大学法科，结识了不少中日朋友，在学的学生团体中很活跃，1908年他发起成立中国留学生会，自任会长。

1909年戴毕业于日本大学后回国，在苏州当了几个月教师。1910年初，任上海《天铎报》主笔。他以“天仇”的笔名所写的社论，严厉批评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他还为于右任编的《民呼报》写文章。他对当地官僚的攻击，促使租界当局下令逮捕，他到槟榔屿加入了同盟会，任当地革命党机关报《光华报》编辑。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戴季陶回到上海参加革命，12月底，会见才回国的孙逸仙，陪同孙及其一行去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然后又回上海经营他和几个同人于1911年底创办的《民权报》。孙逸仙让位给袁世凯后，戴季陶与不少同盟会会员的妥协态度不同，尖锐批评袁世凯及其在北京的支持者。他在《民权报》的社论中谴责袁世凯阴谋破坏民国，他认为与袁世凯妥协的同盟会会员背叛了革命理想而颇加以谴责。

1912年9月，孙逸仙任全国铁路总办，戴季陶担任秘书一直到1925年孙去世。1913年二次革命后，戴和革命党人一起流亡日本。他和孙逸仙、陈其美、朱执信、胡汉民、廖仲恺等人共同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1914年6月宣布成立，他出任新党的机关报《民国杂志》编辑。

1916年4月，国内反袁势力日增，戴与孙逸仙回上海。他除任秘书之外，还经常到北京和日本为孙逸仙探听中日政界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对张勋复辟等所持的态度。1917年8月，黎元洪被北洋军阀赶下台，孙逸仙去广州成立军政府开展所谓护法运动。戴季陶在军政府中任秘书长，法制委员会主席，1918年4月任外交部副部长。1918年5月，孙逸仙离开军政府，戴季陶陪他回到上海。

此后两年半中，孙逸仙在上海制订建国大纲，戴传播和宣传孙逸仙的政治社会哲学。1919年8月，戴与朱执信、胡汉民、廖仲恺共同创办《建国杂志》，又与邵力子等创办《星期评论》。戴在这两种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说明他开始注意马克思主义。他为评介《资本论》而写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一文，连载在1919年11月到1920年4月的《建国杂志》上，该文是根据日语《资本论》而撰写的，是中国评介这本著作的最早论文之一。他又在《从经济上观察中国之乱源》一文中企图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解释中国历史和当代形势。这一期间，他认识了陈独秀周围的青年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团体。据早期的共产党人张国涛说，戴季陶竭力支持陈独秀在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甚至参加了1920年8月召开的成立会议。但因他对孙逸仙负有义务，所以拒不参加该组织，不久又与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分道扬镳。

戴季陶一方面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实践，同时又与孙逸仙手下的一些

人如张人杰、陈果夫、蒋介石在一起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从事股票交易，为孙逸仙在广东的革命事业筹款。1920—21年他们生意兴隆，1922年却因经营失败亏蚀极多。

孙逸仙被陈炯明从广州赶走于1922年8月回到上海，他想收复广州作为统一全国的军事基地。10月，他派戴季陶去四川，调停该省互相敌对的军人，促使他们和解。戴季陶到汉口时，得悉四川内战一触即发，他深感使命失败，投河自杀，却为捕鱼船民救起。11月，他到了成都，探望十八年未见的母亲，他劝说四川军阀停止内战的努力归于失败。他在四川的八个月间，成都曾四次受到攻击。也正是在此期间，戴季陶开始信佛。

1923年秋，戴季陶回上海，当时对革命党未来的前途问题已作出了重大决策。孙逸仙于1923年2月在广州重新站稳脚跟，与苏联实行联合并同意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按照列宁主义路线大规模改组国民党的工作正在进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已定于1924年在广州召开。戴季陶以前虽曾赞同在中国创立共产党，现在却竭力反对孙逸仙允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因而不愿参加这次代表大会，后经廖仲恺劝说，以浙江三代表之一的身份去广州参加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他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政治会议，同时任宣传部长，负责筹建中央通讯社。代表大会结束不久，戴任孙逸仙司令部的法制委员会主任，5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为副主任。但是他对自己在广东政府内所担任的角色愈来愈不满，7月初离开广州去上海。他在上海执行局任职至11月孙逸仙路过上海去北京时为止。他作为孙逸仙的秘书和翻译陪同孙到日本后就回上海。1925年初，得悉孙逸仙病重不起，他又去北京同党的领袖在一起。1925年3月12日孙逸仙逝世前签署政治遗嘱时，戴亦在场。

随着孙逸仙的去世，国民党内左右两派的分歧日益暴露。戴季陶以前曾反对孙逸仙对待共产党的政策，但出于对领袖的尊敬，他克制着不发表与孙相反的意见。孙去世后，他就无所顾忌了。1925年春，他回上海后出版两本重要的书来表明自己的观点。《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一书对三民主义作了阐述，力图说明孙逸仙的思想是以孔子的传统道德观念为基础的伦理哲学，与外来的共

产主义思想完全无关。第二本书《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主要用于攻击共产党员及其加入国民党之举。他争辩说三民主义是国民党的唯一主义而国民党则是为国民革命奋斗的唯一政党。对共产党员那样不能献身于国民党及其主张的人都要取消其国民党党员资格。他进而责难中国共产党实行寄生政策，即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利用国民党的组织发展共产党员和扩大党的影响，并在党内不同集团之间制造不和削弱国民党。简而言之，戴季陶要求中止1923—24年孙逸仙改组国民党时所采取的国共合作的政策。

1925年夏出版的这两本书，引起了共产党领导人的强烈反应，他们担心戴季陶对待共产党的国民党员可能发生影响。10月，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谴责戴季陶为正在出现的国民党“新右派”头目，其理论（以后被称作“戴季陶主义”）是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反革命的活动打先锋。在此之前，戴并未与国民党元老合作，但在1925年年11月却应林森、邹鲁之请去北京参加了后来被称为西山会议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虽然他在会议开始前已离开北京，但同意在会议通电中列名。1926年1月，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对西山会议的多数参加者都作出了纪律处分，戴季陶却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据说是由于蒋介石的支持。但大会要求戴于三年内不再发表其主张。

1926年北伐开始，广州国民政府召戴回广州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1926年底，国民党分裂为武汉的左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在党内分裂的时期，戴季陶觉得广州的政治气氛对他很不合适，乃于12月离开大学的职位到庐山去跟随蒋介石。1927年初，当国民党北伐军东向进军上海南京时，蒋介石等人决定派出友好使团去日本，戴季陶熟悉日本情况又懂日文，遂委任他率领该团。2月，戴季陶去日本，逗留一个多月，与日军军政实业界的首脑人物会见并发表演说寻求日本方面对北伐目标的谅解和同情。3月底，他回到上海，正当清党活动开始之前不久。他虽未积极参加把共产党人清除出国民党，但是他在1925年的著作中强调党的纯洁性和党的主义的正统性，已经从理论上论证了清党的必要性了。

1927年5月，戴季陶去南京，与陈果夫、丁惟汾、叶楚伦创办“中央党务

学校”，该校是训练国民政府文职官员的中心。同时，他再次出任中山大学校长，7月他去广州就职。1927年12月广州公社起义时，中山大学受到重大损失。此时戴季陶常常离开广州，因他感到骚乱的环境对他很不合适。他在校时，多次发表演讲，强调只能以三民主义和传统的中国伦理为基础建立党的强大而正统的意识形态，这些演讲稿于1928年出版，书名为《青年之路》。

1928年2月，戴季陶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当选为常务委员，并与于右任、丁淮汾一起负责主持中执委的秘书处。几个月后，他又出席了另一次全会，和胡汉民、汪精卫一起，奉命依据孙逸仙建立五权制政府的理论负责起草政府组织法。9月底，他和别人一起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草案，该草案作了一些修订后获得通过。10月，组织法公布，政府成立五院，戴季陶任考试院长。他担任这个职务达二十年之久。

设立考试院是国民党领袖们根据孙逸仙五权宪法的理论而作出的规定，对政府官员候选人的资格进行考试，成为国民政府五项互相独立的职能之一，（其他四项为立法、行政、司法、监察）。戴季陶和筹备处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努力，解决了组织上和行政上的种种问题，使考试院得以于1930年1月成立。该院包括考选委员会和铨叙部这两个行政部门。戴兼任考选委员会主席，负责制定考选章程和监督该章程在全国的正确实施。铨叙部的职责是对登录考选合格人员及在职人员的工作进行监督，并负责考查官员的政绩及其任用、递升、撤职等事项。

考试院虽有严密组织和众多人员，但却是一个政治上无能为力的机构，无法执行许多预定任务。戴季陶任职二十多年，经考选录用的人员为数很少，而大多数高级官吏都是通过个人影响或家庭关系任命的。更有甚者，戴本人也愈来愈保守，他力图运用他的职权恢复旧的科举制度的原则和形式。他要象旧王朝他的先辈那样，竭力把教育的目标和仕进之途相联系，强调应考的人必须适应当政者的意识形态。由于这些和其他原因，大专院校许多有才华的毕业生就宁可另找出路了。

戴季陶除任考试院长外，还参与党政各方面的其他活动。1931年，他协助筹备5月召开的国民会议，担任主席团成员，6月1日主持了闭幕式，通过了训

政时期宪法，据说其中包括了戴季陶的许多观点。1921年9月沈阳事变后，他担任外交特别委员会主席，同年11月，他提出一个报告，建议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和日本开战，国民政府应继续进行谈判取得和平解决。他的主张在人民中虽很少受人欢迎，但在1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却通过作为当时的国策。1932年初日军在上海采取军事行动，国民政府暂迁洛阳，戴季陶奉命去西北考察，希望他提出开发该地区的计划。此行结果之一是1934年他在陕西创办了西北农林研究所。

戴季陶在国民党内身居高位又和蒋介石相处很好，但在三十年代他却退居幕后。他身为国民党“元老”，所起的作用多半是礼节性的。他从政治生活中隐退的部分原因出自他个人的选择。那时他对佛教越来越有兴趣，许多在南京熟悉他的人士认为，他对佛典的关注超过了对党务和意识形态的注意。由于他关心佛教及其发源地印度，他遂致力于促进中印文化关系。1935年，他与一些同道在南京发起组织了中印学会，其主要目的之一是收购中国佛典赠送给印度佛教研究中心。他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关注并不限于佛教一端。三十年代中，他促使在全国各地孔庙中恢复尊孔活动。此外，他还关心童子军等青年活动，并于1932年担任中国童子军会副会长。1936年他作为中国官方代表去柏林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趁此机会，他在欧洲几个首都游历了四个月。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他随同国民政府迁到四川。1940年滇缅路通车后，派他作为特使去印度，其目的之一是要缓和印度国大党和英国当局之间的紧张关系。他通过1939年8月在重庆会见过的尼赫鲁会见了甘地，又会见了泰戈尔，他与泰戈尔曾通信讨论中印学会和印度的佛教研究问题。他在印锡等地访问了不少佛教寺庙和其他名胜，1940年12月回国。

戴季陶的身体素质不强壮，战争年间更为衰弱，由于神经兴奋和失眠，他经常服用镇静剂和烈性安眠药。他从印度回国后，又患疟疾和痢疾，1946年4月他从重庆到南京，上下飞机都得抬送，但他仍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中任职，直至1948年7月。其时经他本人要求免去考试院长之职，同年底，他随国民政府迁到广州。他因中国的骚乱情况和中国共产党在北方的胜利而感到灰心丧气，1949年2月11日夜间他服用大量安眠药，凌晨发现他已死去。

戴季陶是一个多产作家，他的短篇文章发表在以他作为特约撰稿人的许多报章杂志上。他的文章同宋教仁的文章汇集一起合成一册于1921年在上海出版。书名《宋渔父戴天仇文集合刊》。1959年在台北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出版了四卷本《戴季陶先生文存》，其中大部分是1926年以后的演讲和通信。这些著述披露了戴季陶作为一名教育家、党和政府官员及虔诚的佛教徒的晚年生活的许多情况。

戴季陶在1911年与钮有恒结婚，有子女各一人。儿子戴安国在德国学机械工程，于五十年代任台湾复兴航空公司董事，后任官办的商业机构中央信托局西德办事处主任。

戴 笠 字：雨农

戴笠（1895—1946.3.17），蒋介石的特工头目，民国时代最有权势和最神秘的人物之一。

戴笠生在浙江江山，是三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其家世情况不详。戴笠上一代或两代时，家业已由无地农民变为商人。戴笠的父亲是一个废物，是他勤俭从业的家庭中被憎厌的人。他的母亲却出身于当地名门劳家。1900年戴笠在父亲死后，由母亲抚养成长。

戴笠青少年时代的情况不详，只知道他曾进过中学，1909年离家，投身浙军模范团，当了一名士官生，此后多年的情况均不详。但就其以后的活动看来，他当时大概并不懈怠，接受过军警训练。1926年加入国民党，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年底毕业后，进了一个骑兵团。

北伐期间，他自认为有做谍报工作的才能，虽然他并非高级军官。他在部队出发前已被派出去了解群众情绪，探测军政情况，探明行军出击途径。他成功地争取到了上海有势力的帮会的援助，替蒋介石1927年4月进入上海打下了基础。

此后几年中，戴笠充当蒋介石的谋工人员。1931年9月18日沈阳事变后，中日关系恶化，戴笠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厅厅长，从事对日的间谍工

作和对日本在华特务的反间谍工作。戴笠招收了一批主要是黄埔的毕业生组成的特工人员，大胆有效地开展工作。由于他的工作性质，所以1931—36年间有关戴笠的活动很少为人所知。一般地说，他除了显然从事反日活动，还从事对付共产党及国内其他敌人的秘密活动。西安事变时他为使蒋介石获释出了力。以后他自称曾以蒋介石本人为榜样，去西安营救。因为蒋介石曾于1922年陈炯明在广州叛乱时营救过孙逸仙。

1937年中日战争开始后，戴笠被派到上海组织和指导反对日本的游击活动，他利用青帮和强大的工会团体组织一支名为忠义救国军的游击队。11月，上海沦陷，戴笠把指挥所迁到安全地带，继续指导反日活动。不久，召回去南京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二局副局长，该局系由二厅发展而成，1938年升为局长，掌握全国十万多名特务。1937年后，长江下游地区的政治形势显得极其复杂：有戴笠手下第二局的人员，上海的地下工作者，工人领袖，共产党新四军的支持者，以及顾祝同手下的国民政府的军事人员。1939年南京伪政府成立，戴笠阴谋活动的环境更为复杂了。戴笠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利用这种复杂情况为自己谋利。他的显著成就就是对南京政府的渗透活动，特别是在警察和保安队里面。在整个战争期间，他对这些机构保持了一定的控制。1940年为了对付由于商品投机和走私引起的问题，戴笠还担任了一些新的职务，如交通运输检查局、缉私局、货运管理局的主任，这些职务同第二局局长之职一起，使戴笠实际上控制了国民政府的全部特工机构。他精力充沛渴望行动，不满足于指挥他直接掌握的复杂机构的活动。他还指挥敌占区的重大行动并到敌后广泛视察。

1941年底，美国参加对日作战，中国战场对盟国的事业具有重大的新的战略意义。美国认为需要实行中美合作，特别是在情报工作方面。1942年5月，戴笠几次陪同梅乐斯上校（后为少将）去中国东南部敌后作长途视察。当时梅乐斯刚到重庆，因战争需要准备在中国设立气象站并与中国谍报机构取得合作。他们一行实际上是在日军炮口下安全来往，戴笠在敌后地区中国人中的名声以及他每天可以行军三十英里的精力，这些都给了梅乐斯很好的印象。1942年10月，梅乐斯除原任驻重庆海军观察员外，兼任驻华战略服务处主任，出于

他的建议，找到了援助敌后游击队和在中国部分地区设立气象站的办法。

梅乐斯的计划之一是建立中美合作所，该所经宋子文和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签订协定，于1943年4月15日成立。戴笠任主任，梅乐斯任副主任。中美合作所进行了多种重要情报活动，如建立气象站进行气象观察，建立游击训练营计划游击战争。戴笠手下的中国人则从美方取得无线电收发报机、武器和情报。中美合作所最多时拥有二千个美方人员，无一人战斗中死亡，只有三人被俘，中方人员的损失则有四千多人。

中美合作所人员伤亡虽然相对来说是少的，其活动却令人生畏。戴笠的游击队，在梅乐斯的美方人员帮助下，破坏了日方的供应和军火，切断了交通线，杀死了数量可观的日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年中，中国战场的一些战区和情报机构表现出了令人迷惑不解的紊乱，因此，在敌后活动的中美合作所就成了人们经常争议的对象。中美合作所最重要的成就也许是美国太平洋舰队设立了十四个气象站，经常报道西太平洋地区的云层和风向，对美国海空军向日本本岛采取的军事行动作出了贡献。

中美合作所积极活动期间，戴笠和梅乐斯密切合作，到中国各地视察气象站和游击队。1945年4月，蒋介石亲自到中美合作所总部。当众称赞中美双方人员的成就。

1945年春，盟军已确定对日本实行两栖进攻，戴笠把注意力转移到日本占领的中国沿海地区及长江一带，特别是上海、南京、汉口、广州等大都市，那些都是敌军集中之地。为了挫败日本方面在盟军于日本登陆时必然会采取的支援动作，他制订了详细的计划，在拟订这些计划时，这一事实给了他帮助，那就是：很久以前，他即已培植或取得南京日伪政府中一些要人的支持。

战争结束后，戴笠担负起缉拿众多的日伪官吏和其他卖国贼的重任，他手下的人员总共要将三千多这样的人捉拿归案。1945年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戴笠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此时，他把注意力转向国民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扑灭共产党。他大概是为处理与此有关的工作于1946年3月16日飞往青岛与那里的美国海军司令官商谈，3月17日中午他乘一架民航机回上海，飞机在南京附近失踪，三天后在板桥附近的山间发现飞机残骸。蒋介石得悉戴的死讯

后为之涕泣，并下令实行国葬。戴笠之死引起了一阵骚乱，虽然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同蒋一样感到悲痛。事实上许多人根本不相信这是事实，认为这不过是戴笠玩弄的一个花招。

戴笠结婚后有两个孩子，妻毛氏死于1939年，子戴藏宜大同大学毕业，戴笠死时，他在家乡的江山县担任本地建国中学校长。戴笠的女儿叫戴淑芝。

太虚 原名：吕沛林 法号：唯心

太虚（1890.1.8—1947.3.17），唯识宗和尚，致力于佛教的改革和现代化。主持武昌佛学院，主编《海潮音》，创办了世界佛教协会等组织。

太虚原籍浙江崇德，生在海宁的一个贫苦家庭。他父亲是一个瓦匠，在太虚一岁时就死了，他母亲于太虚五岁时再嫁。太虚由海宁的外祖父和舅父抚养。舅父是一名塾师，太虚从他受学，又常与外祖母去当地佛寺进香。

太虚十五岁时因经济困难，被迫在一个小商店当伙计，不久弃业为僧，尔后进进了宁波附近的天童寺，1906—1910年间习诵佛典，注重天台宗华严宗教义。约于1908年他结识了几个热心改革的和尚，在他们的敦促下，他开始读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炳麟、邹容、严复的文章及革命党人在日本秘密出版的《民报》。1910年，太虚去南京，随佛学出版社的杨文会受业，杨是一个知名的佛教居士。1911年，他去广州，与革命党人发生联系，同时在读了托尔斯泰、巴枯宁蒲鲁东、马克思等人著作的中译本后，对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发生了兴趣。他一度曾参加过一个讨论社会主义的团体，认为中国需要进行社会革命。

太虚对社会主义学说的兴趣影响到他对佛教教义的理解并促使他打算在国内开展一个新佛教运动。他认为佛教和社会主义是相似的，因为二者都主张社会平等和解教众生。但是，他又认为中国的佛教已因教规松弛而堕落无力实现这个目标。僧徒无知，庙产为少数人占有，古代的佛教教义对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环境已不适合。因此经义需要用新思潮重新阐发。佛教已招致公众敌视，寺院已破落，庙产常有被政府没收的危险。他于是着手从三个方面进行改革：更新

僧侣，重募寺产，重新解释教义。大约在1909年他去宁波协助创办佛教教育会，1910年在广州创办佛教教育改进会。

1912年他参加创立了佛教协进会，在镇江召开的首次会议上，他提出了宗教改革的原则。他认为庙产是信徒的共同财产，应该用于促进社会福利，特别是教育事业。他发表了一个引起激烈争论的声明，在这个声明中他主张宗教团体在用人方面应实行量才采用和按工作成绩给予报酬的原则。此外，他主张重新解释教义，因为他认为佛教是为现实世界服务的宗教。他认为佛教的演变是与政治生活的演变相适应的，宗教与政府应该有一个共同目标：建立大同世界，人们在其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1913年时，他写道：“政治的演进过程是从部族到皇权，从皇权到共和，从共和到无政府。宗教的演进过程是从泛神论到一神论，从一神论到无神论，最后宗教归于消灭。在最后的大同世界里，政治上是无政府，宗教上则是无神论”。

太虚因为他的主张很少为人接受而深感失望，1914年他隐居普陀岛达三年之久。他在雪林寺贪婪地阅读佛教著作，中国经典、西方逻辑、哲学、心理学和自然科学的书籍。在当代作品中，他对章炳麟、严复的著作特别感兴趣，这两人也是对佛学深感兴趣的。在这段隐居期间，他也开始研究佛教中的“唯识宗”，这是将意识分析成为不同阶段的感觉的一种唯心主义。经过几年研究思索，他决定“创立一种以佛学正宗为基础同时吸收古今中外各种学说而使之适合于当今需要的新佛教”。

太虚的思想的综合倾向变得越来越明显了。他宣称“这个世界需要理想化的教义，这就需要综合改造各派哲学”。作为“唯识宗”的信徒，他认为一切可以感知的东西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意识的产物。他又进而认为这个观点已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所证实，即“万物均由与其与他物的联系而得以证实”。他认为人不能单独生活，而且因为他与社会共命运，因此，他必须致力于促进社会福利。公共道德观是与佛教的人生观一致的，这就是关心他人的福利。太虚和他的许多本国人一样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方文明和基督教破产的证明。他认为为了替世界建立新的道德标准，佛教徒不应该借宗教以逃避世界，而应该进入世界去实行一种人道的、科学的、能够加以论证的、普遍的新佛教。

1918年，太虚到台湾巡回宣教，回国前又去日本，这次旅游所得更增强了他认为佛教教规需加改革的信念。他呼吁提高僧侣的知识水准和精神境界，扫除市俗习气和愚昧无知。他认为僧侣应从事生产劳动，佛事必须简化，寺庙必须保存以作潜心修养进行研究之所。应该创建一所全国性寺庙，作为新的寺院生活的模范。他还希望在南京成立一个佛教研究中心，并在全国各地建立起研究机构网，每个城市都有讲经堂备宣讲经义之用。

1918年，太虚、章炳麟、蒋作宾还创办了旨在宣传佛教的“觉社”，它指导佛学研究和修行，并由太虚主编出版《觉社季刊》。不久，太虚又在杭州创办了相似的团体。大约在1920年，他停办了上海的《觉社》，将《觉社季刊》改为《海潮音》周刊。随后他迁居杭州，全力主编《海潮音》，这是中国一本有名的佛教杂志，为国内各派宗教学者所称道。1922年，太虚应聘主持新成立的“武昌佛学会”，这是一个佛教僧侣和居士的教育中心，它以拥有四万余册图书和讲经计划而知名，它和欧阳竟无的“支那内学院”，成为唯识宗的两个旗鼓相当的佛学中心。在二十年代，太虚和欧阳竟无展开辩论，欧阳竟无反对他的综合论而主张严守佛教旧规。1922年，太虚在汉口创办佛教会，它在1933年宣称拥有会员三万人。

1923年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佛教讨论会上，太虚宣布建立世界佛教联合会，1924年夏，该会举行大会时号召于1925年召开东亚佛教会。当时，太虚打算创办一所大学，由它把中国的大乘佛教介绍到西方去。他在牯岭召开了世界佛教年会，派出他的弟子到各地的研究中心，并从国外聘请佛教界首领到武昌佛学会讲经。1925年冬，太虚率领二十五名代表去日本参加东亚佛教大会，作了一系列讲演。翌年，经由熊希龄、章炳麟建议，太虚创办了亚洲佛教教育会。他还创办《心灯》杂志，并应华侨邀请去新加坡讲学。

太虚虽为国内内战的频繁而感到沮丧，但仍致力于创立世界佛教运动。他认为西方比东方更有活力，因此先向西方施加影响，转过来再影响东方这种做法是可取的。于是，1928—29年，他去欧美旅游了解向西方介绍佛教的可能性。他先到德国、法国，想在欧洲创办一所研究佛教的世界性大学。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但是在巴黎成功地设立了世界佛教协会分会。他在英国遇见罗

素，和他讨论了佛教问题。他到美国在哥伦比亚、耶鲁等大学讲演。据太虚自述，他的国外之行使他对西方文化有了新的评价。先前，他曾认为西方仅仅在物质成就方面超过东方，而这时他认识到原来的观点过于简单化了。

1929年太虚成立了一个新的全国性的中国佛教会，目的在于登记全国大小寺庙以便进行改革。1930年他又在北平创办佛教学院，但不久因经费困难而关闭。三十年代初，他在重庆附近的一个寺庙里创办了汉藏佛教研究所。1935年在西安创办三藏经学院。1937年他在厦门任闽南佛学院院长。太虚的教学方法被认为是非正统的，他鼓励学生研究佛教以外的其他科目，以加深对佛教教义的理解，而反对单纯背诵经文。

中日战争爆发后，太虚迁住四川直至1945年，他以重庆附近的汉藏佛教研究所作为活动中心，还在重庆重建武昌佛学院和中国佛教会，在整个战争期间指导了它们的活动。1939—41年间，他一度率领佛教代表团去东南亚，访问了缅甸、马来亚、锡兰、印度等地的佛教中心。太虚除讲课、著述外，还在四川协助组织医疗救济工作和促进社会福利设施。

1945年日本投降后，太虚回到南京任佛教改革委员会主席。从1944年起到太虚去世时，他一直担任罗马天主教主教于斌主办的人生哲学研究所所长之职。1947年，他去宁波讲学后隐居在上海，随后患病于同年3月17日去世。

太虚的主要著作有1926年出版的《佛学概论》，1930年出版的《佛教各宗宗派源流》，1931年出版的《佛教对于中国文化之影响》，1932年出版的《哲学》和1940年出版的《佛正宗要论》。

覃 振 原名：道让 字：理鸣

覃振（1885—1947.4.18），保守的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发起人之一。1932—42年任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1943—46年任国府委员。

覃振生在湖南桃源的一个种田人家，自幼聪颖，家人免去他的农田劳作以便集中精力读书。1900年，他已熟读中国古书。是年，他父母双亡，义和团进占北京，覃振遇见当地一名姓杨的秘密社会的头目。这些事凑在一起使覃

振变成了一个反对当时中国现存社会秩序的叛逆者。1902年，他在本地小学上学，认识了一个同情革命党的同乡人宋教仁。第二年，他进了常德府中学，不久接触了中国留日学生发行的反满刊物。那时，地方官厅办了一所小学和龙江书院藏书楼。开学当天，地方官吏、本地绅士、各府学的学生都来听取典礼讲演。演讲结束后，覃振从人群中走出，跳上讲台，侃侃而谈，声称必须进行根本改革以拯救国家，并且驳斥了一个当地名流发出的效忠皇帝的呼吁。这使听众大吃一惊。武陵知县要当场逮捕他，兼任学监的常德府尹则表示应该把他开除出校。

覃振离校后继续反抗当局，写了一篇煽动性文章《死里求生》，表明自己的革命思想。他的朋友们为之传抄并张贴于通衢大街，因而吸引了不少读者。覃振的名声大振，政府对他的监视也加强了。他听从朋友的劝告，离开湖南去日本进了宏文学校。

1903年底或1904年初，黄兴在湖南成立了一个革命组织华兴会。华兴会准备与哥老会一起趁1904年11月慈禧太后七十寿辰之际在湖南起义，宋教仁负责常德地区的活动，他请覃振给予帮助。覃振遂回国协助起义的准备工作，但因密谋事先被察觉，他不得不逃离常德，躲在乡下的一个朋友家里。他和宋芝超（译音）结婚后，为安全起见又去日本。1905年8月，覃振是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并被选入同盟会的评议部。

1906年10月，由矿工、秘密会社成员、心怀不满的士兵组成的一支革命武装攻进了湘赣边境的萍乡、浏阳、醴陵等地。许多旅日同盟会员闻讯自日本赶回国内参加起义，覃振回到长沙和具有革命思想的学生、新军联络。不到一个月起义被扑灭，覃振却逃脱了当局的追踪。当湖南教育界人士准备为因反对清政府而在日本自杀的陈天华和在上海自杀的姚鸿业（译音）举行公开丧礼时，覃振又同官府发生冲突。这次丧礼虽未得到官方允许，参加者却很多。覃参与了筹备工作。官府为这种公开的藐视行动所激怒，下令逮捕组织者。覃振遂逃往日本，进了早稻田大学。

1908年，黄兴又派覃振去长沙，这次他被捕了，判处无期徒刑。他在狱中向难友宣传，又经亲友帮助与外面的革命党人取得联系。后来覃振被转移到他

家乡桃源的监狱，他在那里名声更大了。他虽遭囚禁，实际上却指导了当地的革命团体。

1911年民国革命发生时，覃振经新任都督焦达峰的要求获得解放。他到长沙时，得悉焦已被为争夺湖南政权的当地士绅的支持者所杀害。覃振发出实行团结的呼吁，他参加湘桂北伐军去湖北支援苦战的革命军。他到武汉后，由黎元洪任命为秘书长，12月，他以黎元洪个人代表的身份去南京商讨成立临时政府的事宜。

1912年春，袁世凯继孙逸仙为临时大总统，向参议会提出阁员名单，覃振致电袁世凯反对他提出的人选。黎元洪为了避免得罪袁世凯，解除了覃振作为黎的个人代表的职务，覃遂去北京协助宋教仁创建国民党。1913年初，覃振被选入国会。宋教仁被袁世凯的手下杀死后，覃振在国会中严厉批评袁世凯的政策，直至国民党在北京受到镇压，以及反袁二次革命爆发。二次革命失败后，覃振又到日本避难。

1914年7月，孙逸仙改组国民党使该党恢复革命精神。当时袁世凯开始准备实现恢复帝制的野心。1915年8月23日，旨在煽动公众支持袁世凯的筹安会在北京成立，人们认为这是袁的御用机构。作为对抗措施，覃振和旅日国民党其他首领组织留日学生举行反袁游行。袁世凯在日本的特务蒋世立（译音）以金钱官位为诱饵，企图削弱国民党在留学生中的影响。留日学生大都贫穷，蒋成功地收买了越来越多的学生，甚至包括国民党员也在内。一个湖南青年吴宪梅（译音）向覃振建议将蒋刺死，覃赞同他的计划。十月，吴刺蒋后逃回上海。覃振因涉嫌被捕，但因证据不足于两周后获得释放。

袁世凯称帝意图暴露后，蔡锷率滇军起事，进入四川。当时，孙逸仙命覃振及一些国民党员自日本回上海，他们与龙璋、周震麟等人密谋推翻湖南都督汤芑铭。1916年2月，不少省份宣布独立，汤芑铭请他的兄弟汤化龙与覃振谈判，答应离开湖南。覃振鉴于汤芑铭过去在湖南迫害过革命党，拒绝谈判。5月29日，汤宣布停止支持袁世凯，7月4日被迫离开湖南。不久，谭延闿任湖南督军。由于一个友善的督军在湖南掌权，大批湖南籍国民党员回到他们的家乡。覃振于是设立正义社，总部在长沙，并在其他城镇设立分社，以掩获国民

党的活动。龙璋当选为社长，覃振为副会长。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在北京掌权，准备以武力统一中国。他解除了谭延闿的湖南督军职务而以傅良佐继任。傅的任命为许多湖南人士所不满。覃振和湖南军人如赵恒惕、林修梅策划推翻傅良佐。当时，孙逸仙等人已在广州成立反对派政府，覃振去广州会见了孙，孙任命覃振为湖南巡阅使。他回湖南后和前来支援的黔军合作，反对北洋军队，1917年11月，傅良佐被迫离开湖南。

1918—1924年间，覃振致力于巩固国民党在华南的政治基地。在1924年1月举行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同年春，他任国民党汉口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委员会掌管辖湘鄂甘陕党务之权。他和林伯渠、包惠僧、彭如民（译音）等商量，委派刘少奇为湖南职工部筹备主任，夏曦为学生部主任。刘、夏二人成功地使共产党在湖南的影响大为增加，覃振对他们的用心产生了怀疑并进而反对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的政策。

1925年3月覃振去北京参加了孙逸仙的葬礼后，留在那里组织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成立了同志支部，11月，他参加了国民党反共分子的西山会议，会后，与会者在上海设立了分裂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此后覃振被公认为是西山会议派成员。

共产党问题使国民党内部更为分裂，1927年武汉、南京分别成立了对立的政府。1927年9月，共产党已被清除出国民党，国民党三大派重新联合的阶段到来了。它们派出代表在上海开会谋求统一的条件，建立了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暂行政府职权，委员会由三大派提出的中央委员三十二名，候补委员九名所组成。覃振成为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任宣传部长。

事实证明这个新近取得的党的统一是极其脆弱的。武汉派的头目汪精卫一发觉他既不能控制党又不能控制政府，就撤回了他的支持。1927年10月，唐生智宣布在武汉成立分裂的国民党政治会议，不受中央特别委员会管辖。11月初，唐生智的部队被南京方面的部队所击溃。11月22日在南京举行庆祝会时发生了暴乱。死学生二人，伤其他方面人士十余人。由于各种原因，中央特别委员会中的西山会议派成员被认为应对这次事件负责并于12月3日被解除职务。覃振

离开南京去上海居住。1928年夏北伐结束，他携同家属迁居北平。1930年，他参加了冯玉祥的扩大会议，1931年参加了抗议胡汉民被捕的广州分裂派运动。日军于1931年9月进攻沈阳，促使广州的运动宣告结束，鉴于外患，在上海召开了一次和平会议，决定改组政府，覃振任立法院副院长，1932年5月9日他辞去此职，改任司法院副院长、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主任。

1934年夏，覃振去欧洲和北美访问，在英、法、德、意和美国考察司法六个月。回国后，协助筹划中国法律协会，该会于1935年9月20日宣告成立。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他随同国民政府迁往重庆。1943年，他辞去司法院副院长之职，改任国府委员。战争结束后，他飞往上海治疗慢性哮喘病，1947年4月18日死在上海。

谭鑫培

谭鑫培（1847—1917.3.20），京戏老生角色的主要代表人物。

谭鑫培籍贯湖北，父亲谭志道是个演老旦的演员，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他带全家到了北京。谭鑫培幼时遵从京剧界惯例从父亲学艺。十一岁时在京桂科班当徒弟，学男角，演武生和昆剧老生角色。演武生需要有良好的武功、舞台技艺和打功，演昆剧角色则需要掌握生动的表情、姿态和唱功。他早年的训练为他日后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当他开始演出男角时，他的武功训练使他能融合身段唱腔而得到和谐的舞台效果，而这一点中国的戏迷是很看重的。

谭离京桂科班后进著名演员程长庚的三庆班（程死于1880年），程的戏班子擅长表演一种新的戏剧形式，这种形式成了京剧的开端，因此人们把程长庚称为“京戏之父”。谭鑫培很快引起了程长庚的注意，程对自己的这个新的信从者极为重视。因此，谭在开始他的戏剧事业时就与自己所从事的技艺的大师——他代表了这种技艺的新的发展——发生了密切关系，这使他获益不浅。

谭鑫培在北京一些主要戏院中上演至1879年，其后他去上海和旦角孙采芝（译音）在全桂茶园剧院同台上演，演出非常成功。谭鑫培虽然仍演武生角色但声誉日高。他回北京后仍演武生，程长庚死后他才改演老生。1884年，他再

去上海，在丹桂馆戏院演出，同年末又在新丹桂戏院演出。1890年他被选进清官演戏，足见他已成为一个有成就的演员了。

谭鑫培经常上演的剧目有《空城计》，《四郎探母》。他常和旦角王瑶卿同台演出《四郎探母》，他们这一对角色是很有名的，他在《汾河湾》中扮演薛仁贵也很有名。这一类戏中老生一角的成功大多得力于唱功，谭鑫培独创了一种唱腔，中国的戏剧评论家把谭的唱腔同他的两个同辈名演员汪桂芬、孙菊生相比较，说：“汪以韵胜，孙以气胜，谭以情胜”。在以后学“谭派”的人中间，有马连良，谭富英、余叔岩等人。

谭鑫培无懈可击的唱腔因得到梅兰芳的伯父琴师梅雨田的伴奏而相得益彰。他们虽然不时因发生齟齬而分手，但又因互相敬重对方的才能而重新相聚。早期的留声机唱片中有他们合作的一些戏如《卖马》、《洪羊洞》。谭鑫培还尝试拍过电影，1908年他拍了电影《定军山》。

谭鑫培虽然主要是北京的演员，他一生中却曾六次去上海。二十世纪初年，寻欢作乐的上海商人们愿意给北京来的演员以优厚的报酬。1901年他第三次到上海在三庆茶园、丹桂茶园上演（他第一次访沪时曾在丹桂上演过）。此后，1910年又到上海再一次在丹桂茶园上演，1912年在新新舞台上演，1915年在他女婿经营的戏院演出十天。1912年那次访沪刚好在春节前几天，依从惯例，名角在最后一个戏剧季节需要作反串演出，当时要求谭鑫培扮演《西游记》中的喜剧角色猪八戒，其中一幕需要从三张桌子的顶上翻筋斗下来。谭临场之际，佯作考虑，嬉皮笑脸而又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大叫着他还想活下去而顺着桌子爬了下来。他这个轻松的表演充其量不过是在戏剧季节开玩笑而已，可是上海观众不同于北京人，却把这事看得很严重，有人甚至写文章在报上批评他违反京剧传统。谭对这种缺乏幽默感的情况大为恼怒，没有演完全部剧目就离开了上海。但在1915年他最后一次去上海演出时，局面却出现了有趣的逆转。这次，他到上海进行私人访问，但应他女婿之请，答应与当地演员同台演出十天。他演出时天天满座，他费了很大的劲才能通过倾慕他的观众的行列走到化粧室。这次凯旋式演出的剧目有着名的《空城计》、《珠帘寨》等。

1914年春，谭鑫培开始经常在夜间演出，这个改革自第一舞台于1914年开

张后变成了惯例。谭又与当时很有前途的青年演员梅兰芳在北京同台作了最后几次演出。1月到3月，他们和中和社戏班一起演出了《四郎探母》、《汾河湾》、《桑园教子》，又为福建赈灾作募捐演出。义演结束后不久，黎元洪上台做总统，谭又在黎宅担任压轴戏的演出。虽然在这次演出中他得了重感冒而且病得不轻，他仍在1917年3月，在一个为欢迎陆荣廷而举行的私人堂会上勉强演出，后来表明这次是他的最后一次演出，当时他在《洪羊洞》剧中扮演垂死的将军杨延昭。这次演出的劳累是他病弱的身体所支持不了的，而他也就在1917年3月20日死去。

谭鑫培有子八人，女四人，其中两女一子幼年夭折，有五个儿子以后也是演戏的。谭家山（译音）演武老生，家青（译音）演武丑以后成为琴师，曾几度为其父伴奏。三子家新（译音）演旦角，四子家云（译音）演武老生，五子家彬（译音），艺名谭小培，与其父一样演老生，他是几个儿子中唯一稍有名声的演员。谭小培的儿子，艺名谭富英，是个极其有名的艺人，出色地表现了他祖父的艺术。1949年后，谭富英留在大陆，195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谭家演老生的传统一直传到第四代，因为谭富英的儿子也从事此业。

谭延闿 字：组菴 号：无畏

谭延闿（1879—1930.9.22），清朝翰林，湖南省咨议局局长，1912—20年间多次任湖南省长。1924年后，在广州担任国民党党政要职，北伐战争第一阶段，主持国民政府事务，1928年10月起至去世时，在南京任行政院长。

谭延闿祖籍湖南茶陵，他本人生在杭州。出生时，他父亲谭鍾麟在浙江做官，母亲是谭鍾麟的一个妾，谭延闿在子女中排行第三。他弟弟谭泽闿擅长书法，境况合宜的话，可能博得书法家的名声。谭鍾麟后来任湖广总督，他身为高官，因此其子女都按书香门弟的要求熟读中国古书。谭延闿于1902年举人，1904年成为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他是得到这个令人羡慕的职务的最后一批中国人之一。1904—1910年间历任学监，湖南中路学堂监督、明德学堂总办。明德学堂是当时反满活动的一个中心。

清廷被迫缓慢地实行宪政，1909年10月设立省咨议局时，谭延闿出任湖南咨议局局长。第二年他作为湖南代表去北京参加新成立的资政院会议。10月开会时，他和汤化龙等人呈文清廷请求召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1910年11月，清廷下诏准予提前实行君主立宪，并定于1913年召开国会，这使谭、汤等人感到失望，他们遂与别省的咨议局领导人共同成立宪友会。

清政府实行的铁路国有化并以铁路作抵押向外国借款的政策，引起四川及有关各省其中包括湖南的强烈反对。同盟会在日本的领导人抓住这个革命机会，派代表到长江中游各省进行活动。当时，谭延闿为了负有省法制局长的额外职责，从北京回到湖南。他拜访湖南巡抚余诚格时，余交给他一份革命党嫌疑分子名单。谭延闿与同盟会并无联系，不认为这些人有什么问题，声称对他们不用担心。这样，他在无意中为国民革命的顺利发展起了作用。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此时和湖北的居正已有联系，铁路风潮兴起后，双方约定两湖共同起义。武昌起义提前发生后，清军从湖南调到武昌，焦达峰和他的同党陈作新攻克长沙，组织了军政府，以焦达峰为都督、陈为副都督。为了平息公众的不安，任命谭延闿为法制院长。几天后，君宪党首领趁革命军调往武昌之际，暗杀了焦、陈，提名谭为都督，君宪党成员占据了省内其他重要职位。他们派出代表团去谭宅请其就任，谭三次表示拒绝（这是惯例），于是被人逼着上轿到了他的新衙门宣布就任。当时决定宣布焦、陈之死系“乱军”所为。谭下令厚葬这两位革命党人并立像以资纪念。

袁世凯继孙逸仙为国民政府临时大总统后，确认了以谭延闿为湖南都督的任命并委他兼任省长。二次革命时，谭延闿是宣布独立的省长之一。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撤除了这些省长，1913年10月21日，汤芑铭继任湖南都督兼省长。谭去北京，居住了大约三个月，1914年3月他全家迁往青岛，8月，日本对德宣战，进攻青岛，谭迁往上海。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去。8月3日，谭延闿回任湖南督军兼省长。他还得到南方实力人物广东陆荣廷的慷慨支持。1917年3月，陆荣廷去北京，同意湖南为缓冲地带，两广军队不再进入，但必须由湖南人当政。陆荣廷被任为两广巡阅使后离开北京。

1917年护法运动，广州成立军政府时，段祺瑞撤换谭延闿并派其北洋旧部傅良佐率军去湖南，以实现其武力统一中国的计划，11月，段祺瑞因冯国璋部下之逼辞职，谭延闿于12月7日又被委任为湖南省长，谭当时已离开湖南，未接受这个任命。1918年春，他奉孙逸仙之命由广州回湖南。当谭到湖南时，段祺瑞再次执政当了内阁总理，任张敬尧为湖南都督，吴佩孚的部队占领了长沙。谭延闿和一支小部队被赶往湖南西南部山区。

1920年3月，吴佩孚、冯玉祥从湖南撤军，谭延闿所部紧随其后打败张敬尧，收复长沙、岳州。6月，谭再任省长，于7月22日宣布“湖南自治”，首创联省自治运动。四个月后，经过一番权力之争，谭延闿宣布军、政分治，他的湘军总司令兼湖南代督军之职由赵恒惕继任，省参议会选举林支宇为省长。谭延闿离长沙去上海直至1923年2月。

1923年2月，孙逸仙在广州成立新的军政府，以谭延闿为内政部长。5月7日，调任建设部长。1923年夏离职率部征讨赵恒惕稍有成就，攻占了长沙等地。但到秋季，吴佩孚前来支援赵恒惕，把谭延闿所部赶到湘粤边境。谭到广州时，刚好赶上参加驱逐陈炯明的战斗。

随着国民党的改组以及1924年1月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谭延闿成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政治会议成员。7月，任军事委员会九人委员之一。9月，随孙逸仙去韶关准备北伐，10月6日任建国军司令。这次北伐之役因发生冯玉祥北京兵变而放弃，孙逸仙也应邀去北京和张作霖、段祺瑞谈判。1925年三月孙逸仙逝世后，谭随同蒋介石、许崇智征讨杨希闵、刘震环的滇桂军的叛乱。

1925年7月1日国民党控制的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谭延闿任国府委员和五人常务委员之一，其他四人是许崇智、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他还是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新的军事委员会委员。8月，成立国民革命军时，他所辖的湘军改编为第二军。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谭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常务委员。1926年7月北伐誓师后，他和张人杰留在广州，分别负责政、党事务，由此可见其地位之重要。国民党内部分裂后，他在武汉国民政府任职，3月在武汉主持了颇有争议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削弱蒋介石的权势。汪精卫回国控制武汉政府，蒋介石在南京

成立对立政府，谭延闿随汪精卫于6月间去郑州与冯玉祥谈判，冯当时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武汉的谈判代表在争夺冯玉祥的交易中输给了蒋介石，他们就追随蒋介石在自己所辖地区坚决反共。8月，蒋介石被桂系军阀所迫以及出于维持国民党统一的需要，宣布辞职。谭延闿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集团的成员，8月20日他们去九江和李宗仁及南京方面其他首领商谈党内的和解问题。双方同意在南京召开四中全会，谭延闿、孙科在回武汉前需先行去南京。他们到南京后，武汉代表致电汪精卫，提出将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即迁往南京。9月5日，汪精卫和其他委员到达南京时，发现谭延闿、孙科已去上海和许崇智及保守的西山会议派其他成员进行谈判。他们回南京后说明此行系李宗仁、白崇禧之请，并且说服汪精卫去上海交换意见。9月9日去上海的代表团包括李宗仁、李烈钧、汪精卫、孙科、谭延闿。9月12日举行的会议上，孙科提议成立有国民党三派代表组成的委员会，代行政府职权，大多数代表同意这一提议，汪精卫却对之感到愤怒，认为他的老部下破坏了他掌权的希望。他中途退会，离开上海去九江。9月15日，谭延闿在南京主持开会，在这个会上成立了中央特别委员会。

1928年蒋介石在南京重新上台，谭延闿成了国民政府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代主席。北伐胜利结束，1928年10月10日新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时，蒋介石出任政府主席，谭延闿任新成立的行政院院长，这是相当于总理的职务。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谭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常务委员。1930年9月21日，他在南京参加军事检阅时，忽得中风，第二天死去。国民政府宣告为这个革命元老举行国葬，谭延闿的遗体葬在中山陵附近的灵谷寺。

谭延闿之妻方氏死于1918年6月24日，遗有子女各二人，长子谭伯羽以后成为国际贷款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主任，女谭祥，1932年1月1日嫁给陈诚。

唐继尧 字：萱庵 号：东大陆主人

唐继尧(1881—1927.5.23)，云南都督，1915年以武力支持蔡锷讨袁。1916年，他名义上支持孙逸仙，实际上企图向外省扩展个人势力。1915年孙逸

仙逝世后谋取国民政府的领导权未遂。唐统治云南直至1927年2月云南的政治权力落入龙云之手。

唐继尧，云南会泽县人，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的地主家庭，受到良好的中国古籍教育。1904年官费去日本留学，进陆军预备学校振武学校，同班同学中有李烈钧。唐、李与其他中国留日学生一样在同盟会创立不久后即行加入。1907年他们进了士官学校第六期，同期同学有孙传芳、阎锡山。

唐继尧回国后，1910年任云南讲武学堂教官兼营长。李烈钧也到了云南，担任了一个陆军小学的校长。1911年2月，蔡锷亦到云南，任滇军旅长。武昌起义时，李烈钧回到家乡江西省，唐和蔡锷等人，接管了昆明，10月31日成立军政府，由蔡锷任都督。唐于是率领一支征讨部队进军贵州讨平利用革命谋利的匪徒，唐被选为贵州都督，并于1912年由北京民国政府正式任命。

1913年二次革命时，唐、蔡企图调动滇、黔、川、桂各军支援李烈钧，但未成功。二次革命失败后，唐调任云南都督。1915年袁世凯称帝阴谋暴露后，唐受蔡锷之命扩充军队。1915年底，革命首领李烈钧、熊克武等到云南商议讨袁，发布了准备滇军起义的命令。蔡锷于12月19日到云南，在此之前他已与梁启超拟定了起义计划。12月23日，他会集云南的首领致电袁世凯，要他发表声明支持共和政体，第二天，又下最后通牒要袁世凯在二十四小时内处决十二名与图谋复辟帝制有关人员并发表声明效忠民国。袁未加理采。唐继尧、李烈钧、蔡锷乃于12月25日联合声明，宣布云南独立，并吁请全国各省军政当局起而共同反袁，拯救民国。

是时，滇军改编为护国军，下隶三个军，分由蔡、李、唐统率，并由唐继尧任云南都督。蔡、李率军分别进入川、桂，唐留守云南总部。5月底，桂、粤、陕、湘、浙、闽各省纷纷独立。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取消帝制，但仍任大总统。4月中旬，唐、李、蔡要求袁辞去大总统，由黎元洪继任，并恢复1913年的国会。袁未予理采。5月8日，经梁启超活动，宣布独立的首领在肇庆成立军务院代行中国政府职权，直至黎元洪就任。唐继尧被选为抚军长，因不能离滇，仍由岑春煊代理。1916年6月袁世凯死去，黎元洪就任总统，反袁活动遂告停止，军务院于7月14日解散，新政府即正式任命唐继尧为云南督军。

1917年夏护法运动开始时，唐继尧宣布支持孙逸仙。8月31日，部分国会议员在广州开会，成立军政府，以孙逸仙为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唐留在云南未能就任。1918年南方政府改组后，唐仍保持名义上的合作关系，但在孙逸仙和广西军人的争执中拒绝支持任何一方。当时，唐继尧显然想以大云南主义为号召扩充其在西南的个人势力范围。北京和广州政府对这个计划都无力加以干涉，只有川军打败了他的部队并将其赶出四川，使他的这种奢望遭到破灭。唐继尧的势力从未越出云南省以及桂黔的一部分地区。

1920年，旧桂系在广州的权势宣告结束。他们在孙逸仙部属的压力下于10月间撤出广州之前，岑春煊、陆荣廷宣布解散广州军政府。此时，唐继尧同孙逸仙、唐绍仪、伍廷芳一起反对解散军政府。以孙逸仙为首的军政府再次成立，唐继尧任交通部长。他虽未就任，但他接受这一任命，可由以下事实证明：1921年1月，他和孙逸仙及其他广州政府首领一起，宣布南方政府愿意和北京政府进行和谈。

1921年2月，唐继尧的部下顾品珍把他赶出云南，这是他一生事业中的第一次严重挫折。唐率残部退往广西柳州，停留了约一年之久才回云南重新掌权。省议会正式选举他为省长，他按照陈炯明、赵恒惕所支持的联省自治的主张，重组云南省政府。矛盾的是，1924年秋，唐又宣布效忠孙逸仙，出任川、滇、黔联军总司令，准备与广州方面联合行动。由于他缺少实力，孙逸仙任命他为副元帅。

1925年3月，孙逸仙逝世后，唐继尧企图掌握国民党广州政府的大权，他提出副元帅应继任元帅的要求，为国民党当局所拒绝。3月2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对他进行申斥，他以任命刘震寰为广西省长作为答复。刘、唐联军为国民党军队镇服，他再没有进行夺取广州政府的活动了。1925年下半年，他支持陆荣廷重新控制广西，又遭失败。同时，他宣布云南实行省宪法。虽有这些改革，但省当局腐败，尤其是他兄弟唐继虞的恶行，引起了二月变乱。当时，唐继尧的四名部下，包括龙云，向他呈文要求改革省政府。他接受了这些要求，于是在3月间，云南省政府改组，唐继尧名义上任省政府总裁。他在短期患病后于1927年5月23日去世，当时他还比较年轻，只有四十六岁。

汤恩伯 原名：克勤

汤恩伯（1899.9.20—1954.6.29），国民革命军参谋军官，中日战争时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1945年负责监督国民党军队收复上海及遣送日本士兵和侨民的工作。四年后，负责监督国民党军队从上海撤退。1949年10月在守卫金门时打败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

汤恩伯生在浙江武义县汤家镇，他父亲唐德彰是一个憨直的农民。汤恩伯在武义上小学后于1916年进金华省立七中，后又转到私立杭州体专，1920年毕业。1920年，他在返家途中得知一个朋友的父亲因与当地一个声名狼藉的恶棍诉讼而受害，他就留下来观看县法院审案情况。他眼看朋友之父将被判入狱时，就当堂投了一块大石头击中法官，县政府下令对他通缉，汤遂投奔援闽浙军，当上了一名排长。

汤的初次军事生涯因浙军被击败而惨淡结束。不久他遇见同乡董某，正出资寻找一个伙伴同去日本留学，汤接受了这个差使并于1921年春伴随董某去了日本。汤到东京后开始学习日语，希望能进士官学校。但是，进入该校需有军阀官僚的介绍。由于拿不到这类证件，他遂于1922年3月进了明治大学法科学政治经济学。董某回国时，馈赠了汤一些钱，汤以此开了一家中国饭馆。他的兴趣并不在法律，1924年5月他退了学，关了饭馆，回到上海。

他在上海、杭州、义乌、日本之间玩了几个月，又于1925年3月回到中国并获得前浙江督军吕公望开给士官学校的介绍信，剩下的问题是要由汤自行筹集赴日受教育的经费了。他向1907年从士官学校毕业的陈仪告贷学费，陈当时在孙传芳手下任浙军第一师师长。陈仪从未见过汤恩伯，但立刻给以足够经费，使汤恩伯得以进入士官学校第十八期接受教育。

1927年夏，汤恩伯受训结束后回国，陈仪当时已与蒋介石联合，汤于是就当国民革命军的一个参谋军官。1928年底，汤恩伯任中央军校第六期学员军训队队长。他编了一本训练步兵连队的步兵操典，因内容有价值而引起蒋介石的注意，不久即调任第一教导师的旅长，1930年参加了对冯玉祥阎锡山北

方联军的战争，改任第四师副师长，1931年任第八十九师师长。此后数年中，他在蒋鼎文手下，参预平定福建政变及剿共战争。中国共产党长征以后，他升为第十三军军长，1935年底调往陕西任剿匪善后办事处主任，1936年11月，他协助傅作义赶走德王，收复百灵庙。

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汤恩伯和傅作义、刘汝明防守绥远、察哈尔。日军为控制西北高原，在满洲国、蒙古联军的协助下，强行挺进，席卷该地。9月初，汤恩伯所部奉命向冀豫边境挺进，重新集结并扩编为第二十军团，汤任军团长，其下有十三军、关麟征的五十二军和王仲廉的八十五军。因日军的进攻，改编工作只得在皖北亳县完成。第二十军团后由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全权统率。1938年3月，汤部参加了著名的台儿庄之战。5月24日，汤被任命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在薛岳指挥下负责第一战区归德地区的作战行动。日军以占领郑州为目标，继续西进。5月28日，归德失守，一周后，开封又失守。为了阻止日军攻势，中国军队炸毁了黄河花园口大堤，洪水淹没这个地区。汤恩伯当时负责指挥张自忠所部及其他部队保卫郑州以南铁路沿线。然而日军改变进攻方向，沿长江趋武汉。

1939—1942年汤任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负责冀豫战区。1941年新四军事件后，汤兼任苏鲁豫皖边区委员会主任，负责发展国民党游击区以与中国共产党在该地区的活动相抗衡。1942年汤受任这个边区的总司令。同年底，在蒋鼎文手下任第一战区副司令。1944年4月日军实行大规模作战的“一号”计划，企图南渡黄河进入河南，将中国割成两个部分，汤恩伯在河南的部队于此时溃败。在河南大败后，汤奉命率残部去贵州。12月，汤任黔、桂、湘边区总司令。1945年2月，他的老朋友何应钦任命他为第三方面军总司令，下辖十四个美械师。同年5月到8月，他和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合作进入广西，7月28日收复桂林。

战争结束后，汤恩伯受命解除沪宁地区日军武装，10月中旬，这一任务结束，他又负责从上海港口遣送日本士兵和侨民。1946年4月，齐集上海的八十五万多日本人约百分之八十已遣送完毕。在遣送行动中他力图实践蒋介石宣布的对日本人“以德报怨”的政策。他在向日军第十三军的二十名高级军官所作

的告别演说中说：“中日两国隔海相处，相互支援，两国人民同种同文，合则共存，分则共亡。八年血战，两国同受重创，回忆过往，我们兄弟应抱头同声痛哭。今天你们放下武器，又将各位遣送回家，他日我们将手持玉帛欢迎你们重来”。

1946年4月，汤恩伯任沪宁警备总司令，第一绥靖区主任，设司令部于无锡。7月，内战重开，汤任中国陆军副总司令兼南京警备区总司令，1948年春任徐州绥靖主任。当共产党胜利在即的时候，蒋介石准备撤往台湾，任汤恩伯为紧急撤往台湾的出口处京沪杭地区的总司令。蒋介石辞职后，汤恩伯乘机将经费、部队和物资运往海岛。当时，他以前的恩人浙江省主席陈仪致书汤恩伯劝他向人民解放军投诚，汤将此事报告给了蒋介石（而不是报告代总统李宗仁），2月，他在上海逮捕了陈仪。陈于年底被送往台湾，1950年6月处死。

4月，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5月占领杭州、上海。汤在厦门任绥靖总司令，9月底厦门战役开始，10月17日汕头失陷，汤恩伯将其所部从厦门撤往沿海岛屿金门，10月24日打退了共产党的进攻。10月29日他离开金门去台湾，同行者有在厦门、金门协助过汤恩伯的日军中将根本。汤恩伯在台北当了蒋介石的战略顾问，未任实职。1953年1月他去日本治胃病，7月回台湾。在日本期间，许多人怀念他于1945年对日本士兵和侨民的宽大待遇，给了他盛大的招待。1954年5月，他再去日本，在庆应大学医院接受手术治疗，因医治无效，于6月29日死在东京。

汤 尔 和 字：六松

汤尔和（1871—1940.11.8），留学日本的医生，反满革命党人，创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并任校长。二十年代中任北京政府内阁阁员，1937年任北京日伪政府官吏。

汤尔和生在杭州一个回族家庭，父亲沙成良（译音）。汤年轻时过继给没有子嗣的舅父汤孝衡（译音），舅父似非回族。汤尔和由其继父抚养，很迟才上学。1900年二十三岁时进杭州养正书院（后为浙江省立高等学堂），学长陈献

宸（1859—1917）是有名学者和出色的教师，在学生中传播反满思想。课外，他给他所关心的学生谈黄宗羲尖锐批评中国政治传统的《明夷待访录》及西方译著孟德斯鸠的《法意》，罗素的《民约论》，赫胥黎的《演化和伦理》等书。汤尔和与好友马叙伦、杜士珍激于革命热忱，立誓结为兄弟，决定去日本学习军事。1902年，他们在毕业前夕，省当局尚未发现他们的革命倾向，给了他们留学的官费。正要毕业时，有几个学生同一个品行不端的教师发生口角，马、杜为这些学生辩护而被校长开除，陈黻宸因此辞职，汤因病未被开除。

毕业后，他们到日本先进振武学堂，这是一所专门为打算考入士官学校的中国学生设立的预备学校。当时，俄国正以义和团为借口，侵占东北。1903年春，留日中国学生组织普遍军事训练会，派汤尔和、钮永建为代表回国向袁世凯要求对俄作战，但袁未予接见。

此行失败后，汤尔和到革命中心地上海，和章炳麟、吴稚晖、蔡元培等反满活动分子在较为安全的公共租界内进行反满活动。中国当局要求加以逮捕，但租界当局不同意引渡。汤不久又回日本。放弃军事训练而进了津津医学专门学校学医，1905年和一个日本女子结婚，他何时回国不详。

1911年夏，汤因筹建杭州医药专校又去日本。他一回国，即参加了在杭州推翻清朝当局的活动。当时，江浙两省因沪杭商办铁路国有化而群情激愤。这条铁路在浙江境内那一段系由私营浙江省铁路公司经营，总经理汤寿潜是翰林，深得人望，因反对铁路国有而被朝廷撤职。朝廷因借款给公司而拥有某些控制权，股东开会讨论此事时，汤尔和、马叙伦、楼守光从某些股东取得了代表权，设法控制了会议，使之通过了反对国有化以及反对将汤寿潜撤职的决定。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杭州，汤尔和、马叙伦、楼守光请咨议局议长陈黻宸在杭州组织民团，陈接受此建议，咨议局也表同意。省咨议局开会时，选举汤寿潜为民团指挥，陈黻宸为副指挥。浙江巡抚却拒不发给枪枝，因此民团未能参予革命党人于1911年11月4日攻克杭州的活动。第二天，汤尔和参予旗营投降的谈判，汤寿潜成了民国的都督。

汤尔和任浙江四代表之一，去武昌讨论成立临时民国政府事宜。因武昌尚有战争，第一次会议是于1911年11月30日在汉口英租界举行。会议进展迅速，

12月3日议定临时政府组织条例十二项，12月5日又议定清政府议和的条件。与此同时，江苏、浙江革命军于12月2日攻克南京，促使会议代表即以南京为临时政府首都。12月29日，在南京召开的会议上，来自十七个省的四十五名代表选举孙逸仙为临时政府的大总统。选举时，汤尔和为会议主席，因此有幸于1912年1月1日将就任证书交给孙逸仙。

民国成立，汤尔和退出政界从事医学事业，1913年创办了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并任校长。1915年，汤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辞职，1916年6月袁死后又复任。汤对政治活动虽不积极，但他和北京的许多政客关系密切。1916年的一天，他的老师国会议员陈黻宸告诉汤尔和和马叙伦，国会中的浙江议员已发电报请在欧洲的蔡元培回国任浙江督军，蔡回电说他愿意回国但不愿当官。马叙伦向汤尔和建议，可请蔡元培继退休的胡仁源为北京大学校长。汤尔和表示同意并即和教育总长范源濂商量，范随即取得黎元洪的同意，蔡接受此职并于1917年回国，他请汤尔和物色一个合适的人充任文学院院长，汤尔和推荐了陈独秀。这样，可以说，对于北京大学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温床，汤尔和是尽了部分责任的。

1919年5月5日，参加五四运动的十三个大专院校的校长在北京开会，他们决定营救被捕学生使之获释后，即行辞职，以示对警察和政府官吏专横行为的抗议。他们向全国各省教育机构通电，要求联合支持学生。有一些校长，如蔡元培、汤尔和于5月9日辞职直到9月才回任。

汤尔和于1922年7月21日任梁士诒内阁的教育次长，9月20日王宠惠出而组阁时，他任命汤尔和为“好人内阁”的教育总长，阁员中有顾维钧、徐谦、罗文幹。11月18日罗文幹遭非法逮捕监禁，导致内阁于11月21日总辞职。1926年底，汤尔和又出现于政治场面，在顾维钧内阁任内政总长，1927年任财政总长。当时，北京在张作霖控制之下。1927年6月，顾维钧内阁解散，汤尔和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参议，但他在东北地方政府中的具体作用不详。显然他很注意东北的情况。后来他翻译了一些有关东北的日文著作。1928年张作霖死后他留在东北，在张学良手下任职。1931年9月日军侵占东北后不久，汤尔和回到北平，被任命为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

1937年7月，北平沦入日军之手，汤尔和仍在北平。日方授命汉奸组织平津维持会，12月19日这个组织变成了所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汤尔和被选中在成立典礼上宣读新政府的宣言，这对他于1912年1月1日所扮演的角色成为一种讽刺性的回声。在这个伪政府里，汤尔和任立法委员会主席、行政委员、教育文化部长、北京大学校长和东亚文化协会主席。1940年3月，在汪精卫的要求下，临时政府解散而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汤尔和成为政务委员和教育厅长。华北政务委员会隶属南京伪政府，但有相当的自治权。6月，汤尔和任宪政实施委员会常务委员。1940年11月8日，汤尔和死在北平，他的儿子幼松写了他的传记《汤尔和先生》，于北平出版。

汤化龙

汤化龙（1874.11.27—1918.9.12）君主立宪运动首领，后支持1911年革命，1913—14年，1916—1917年间任参议院议长、进步党以及尔后的研究系首领，曾任北京政府内阁阁员。

汤化龙生在湖北蕲水，他家在太平天国时破落，祖父汤德藻是一名学者，潜心书法而失明。父亲汤聘莘也是一名学者，因欲维持家财而被迫经商。汤化龙幼时从塾师读中国古书，十九岁时参加县试得第一名。不久，他家再次因诉讼遭害而破产，汤以教书及在官立学校参加月考获奖的收入帮助家庭偿还债务。

汤化龙于二十四岁时进黄州精诂书院，1902年举人后在山西大学任语言和文学教师。中进士后，任刑部主事。他认为要救国需要有新知识以便实行政治改革，因此支持他兄弟汤芑铭去法国学海军，并娶兄弟汤毓龙进湖北省立工专，他自己则要求去日本学习并取得湖北省官费，他到日本进了立教大学法学政，在那里遇到梁启超以后成为好友。

当时，清政府为平息因义和团而引起的不满，采取了实行宪政的最初步骤。1907年准备成立资政院。资政院是由任命和选举产生的成员组成的咨询机构。第二年，中枢政府行政机构进行了改组。汤化龙自日本回国后不久，任民

政部主事。1909年各省设立咨议局，湖北巡抚陈夔龙呈请朝廷将汤化龙调往湖北筹设咨议局，1909年，汤被选入湖北咨议局，1910年任咨议局议长。1909年冬，十六省咨议局代表在上海开会，反对清政府的延宕政策，成立国会请愿同志会，包括汤化龙在内的三十二名代表于1910年2月，5月两次呈文都察院请转朝廷，均遭拒绝。10月第三次呈文新成立的资政院请转朝廷，获得资政院支持。事实上呈文中的许多人，包括汤化龙在内，都是资政院议员。

清政府无力阻止日益高涨的兴论，1910年11月同意于1913年召开国会，在这期间完成行政机构的改组并成立责任内阁。这些让步使提出呈文的有些人感到满意，但汤化龙等人则坚决要求立即召开国会，清政府答以将拒不服从的议员遣送回籍并将其中一人流放新疆。资政院因这问题不久就分裂了，其中较开明的一派于1911年7月1日组成了宪友会，在十个省内都有分会，汤化龙被选为湖北分会会长。

1911年10月11日，武昌起义后的第一天，革命党首领和湖北咨议局首领一起开会，推黎元洪为武昌民国政府的首脑，汤化龙等人说服了顽固的黎接受了这个职位。不管汤化龙对共和体制抱有什么样的保留态度，但他表面上的接受，对民国革命在湖北地区的迅速胜利却起了重要作用。居正、宋教仁、汤化龙等人为建立军政府的机构起草了一批法规，使革命初期各地的混乱局面得以稳定。10月16日法规公布后，汤离开湖北去上海，又恢复了他和立宪派人士的来往。他们系章炳麟召集于1912年4月组成了统一党，从而恢复了清末最后十年间开始的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间的斗争。

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后，汤化龙于1912年5月1日就任国会副议长。当时，同盟会显然将成为袁世凯政府的反对派，因此袁政府组织政党，与将在国会占优势的同盟会抗衡。他的这个愿望同一些小党派的私利相一致，1912年5月5日统一党与其他四个小党派联合成立了共和党，以汤化龙为总理。共和党乃能在国会124个议席中占有四十席。

1912年8月10日临时国会为未来的国会制定了组织法及选举法。为了准备竞选，同盟会联合其他党派组成国民党，希望能实现责任内阁体制。10月，汤化龙等人转入梁启超主持的民主党，共和党的势力为之缩减。国民党在国会选

举中的极大胜利，导致宋教仁于1913年3月20日被刺。4月，国会开会时，汤化龙任议长。5月，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联合组成进步党，名义上以黎元洪为首，实际上系由梁启超、汤化龙主持。

宋教仁被刺触发了二次革命，国民党很快失败，从而加强了袁世凯的军政权力。袁乘机开除国民党议员，强迫国会休会。袁世凯政府对立法机关的高压手段，甚至使进步党和汤化龙等人也公开谴责袁的非法行动。汤化龙于1914年接受教育总长的任命，但在得悉袁世凯准备称帝后即行辞职去上海。他和梁启超一起从事倒袁活动，并劝他兄弟湖南督军汤芑铭脱离阴谋称帝的袁世凯。1916年5月27日，汤芑铭宣布湖南独立。袁世凯在世时，汤化龙不敢离开上海，待袁于6月6日死后，汤化龙回薪水参加已于3月16日去世的母亲之葬礼。

黎元洪任总统并恢复国会后，汤化龙复任参议院议长。进步党一度分裂为两派：一为汤化龙为首的宪政讨论会，一为梁启超为首的宪政研究会。1916年9月13日两派又合并为宪政研究会，此后汤、梁等在国会的势力被称为研究系。即使不同意段祺瑞的办法，但它支持段祺瑞的政策，因而当黎元洪于1917年5月23日撤销段祺瑞总理职务时，研究系的国会议员辞职以示抗议。张勋复辟时，汤梁支持段祺瑞率军由天津进京驱逐张勋。他们建议冯国璋、段祺瑞政府根据新选举法召开新国会，国民党反对这个计划。汤化龙出任内务总长执行上述计划，国民党乃举行护法运动并在广州成立对立政府作为回答。

随着1917年11月30日段祺瑞内閣的下台和汤化龙的辞职，研究系的政治影响衰落了。梁启超退出政界，以其余年专心从事学术活动。1918年3月24日，汤化龙去日本、美国、加拿大游历。1918年9月12日，他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参加了汤姓族人举行的宴会后，为一个名叫王昌（译音）的广东理发匠刺死，王昌也当场自杀。汤有子佩松，女佩林。

唐绍仪 字：少川

唐绍仪（1860—1938.9.30），与袁世凯长期共事，1912年担任过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1912年6月与袁世凯决裂，以后与孙逸仙联合。孙逸仙死后，他多次支持国民党内反对蒋介石揽权的运动，1938年在上海被一个不知名的刺客杀害。

唐绍仪出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他父亲的情况很少为人所知，但他的叔父唐廷枢（1832—1892）却是一个有名的实业家，1861—1873年任怡和洋行买办，后入李鸿章幕府，1873—1884年任招商局总办，1877—1892年筹办开平矿务局任总办。唐廷枢十岁时进了香港莫里森学堂，与同学容闳成为终身知交，唐绍仪被选入由容闳率领的第三批中国学生教育考察团去美留学。这个考察团由容建仪并于1871年经朝廷批准建立的。由这个计划派遣的学生中有詹天佑、蔡廷幹、梁敦彦等人。

1874年秋，唐绍仪等一行（其中还有后来任外交总长的梁如浩、交通总长朱宝奎）到康涅狄格的哈特福先行补习，确定入学准备。唐绍仪后来进了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但因1881年被召回国，未能获得学士学位。当时清政府因听说学生已经非常美国化而且忽视中文的学习，取消了中国教育考察团计划。

唐绍仪同其他留美回国的大多数学生一样，为清朝官吏所蔑视，认为他们已丧失中国人的许多基本特点。他被派在清政府的几个衙门干点小差事。1882年他终于被任命为新任驻朝鲜税务司穆麟德的助手，此举是李鸿章为支持中国对朝鲜王国的宗主权而采取的。汉城1884年发生骚乱时，唐适在该地。他当时的表现得到了营务处袁世凯的赏识。1885年4月，他和袁世凯去天津和李鸿章商议，又经与李鸿章、伊藤博文讨论签订了天津协定，中日双方同意从朝鲜撤退驻军及教官。

1885年8月，唐绍仪以私人随从身份，随同袁世凯回汉城，10月30日，袁就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唐作他的副手，专门负责处理龙山港中国

方面的政治和商务。1894年7月，中日为朝鲜问题发生战争，袁世凯活动辞职，被拒后就称病回国，留下唐绍仪在汉城代其行使职务。

中国在中日战争中的可耻失败，标志着唐绍仪生涯中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他短期担任驻朝鲜总领事后，于1896年回国到天津小站新建陆军司令部任袁世凯秘书，兼任北洋铁路总局总办。1899年12月，袁任代理山东巡抚，唐随往作他的首席政治官员兼省商业事务负责人。他们严厉地镇压了山东的义和团运动。这一危机结束后，袁世凯向清廷推荐唐，说他“才识出众，熟谙外事”。1901年11月李鸿章死后，袁世凯任直隶总督，任命唐为天津海关道。

1904年9月，荣赫鹏率军侵入西藏，引起危机。唐被任命为处理西藏事务的清政府议约全权大臣，奉命进行调查。9月7日，英国强迫西藏噶厦签订协定，西藏事实上沦为英国的保护国。清廷对拉萨条约十分不满，派唐绍仪以公使身份出使英国詹姆士王朝，并命他到加尔各答和英国当局谈判。唐及其工作人员，其中有梁士诒，1905年2月到加尔各答，希望英方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并承认中国政府为印藏之间的居间人。英方态度强硬，唐遂于1905年9月回国。11月，唐任外务部右侍郎，又和英国公使萨道义爵士在北京重开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1906年4月27日中英签订协定，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在此期间，唐已成为清朝海关新建的税务署付总办，同时又是京汉、沪宁铁路督办。1906年11月任邮传部左侍郎。他和在北京的一些大官，倡议订定禁烟条例，经朝廷批准于11月22日公布。他在邮传部任职时，执行朝廷提出的首先借用外债建造铁路的政策，这项政策引起了政治上的批评。此外，他在邮传部优先选用留学生的做法使他与邮传部尚书张百熙发生冲突。1907年3月，他与英国签订了借款建造广九铁路的协定后，弹劾他的活动就开始了。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唐于1907年4月辞去他在北京的所有职务。

1907年4月，东三省改制时，唐绍仪出任奉天巡抚。他在任上再次考虑借外债建设铁路。他转向美国寻求支持抵制英日。经外务部大臣袁世凯的支持，唐和沈阳美国领事司戴德商谈，争取美国支持，进行币制改革，成立东北银行，建造一条铁路以与日本南满铁路竞争。（这违反1905年中日协定，协定规定禁止建造与日本经营的铁路平行线。）唐就此卷入了东北铁路的国际竞争之

中。1908年他还倡议了由东三省移民至外蒙的政策，这个政策不久引起了蒙族的骚乱。

1909年，宣统继位，袁世凯于1909年初被撤职后隐退，他手下的一批人也下台。1908年司戴德为建立东北银行商定了一个初步协定回美国进行最后安排。同年底，唐亦去美国商讨，但因政局变化，计划未能实现。1909年中，唐回国，因其与袁世凯的关系，免去奉天巡抚之职。他隐退到1909年8月，又被召回北京补邮传部侍郎，10月署邮传部尚书。袁世凯仍未复职，唐在北京的地位也不如从前，乃于1911年初辞职。

1911年10月，民国革命爆发，袁世凯复出，唐绍仪取代盛宣怀任邮传部尚书。12月，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授权与革命党人进行交涉，他任命唐为清政府代表团团长，负责进行和议。唐和同事们在上海同以伍廷芳为首的南方代表团进行谈判。孙逸仙任临时大总统后，袁要唐辞去代表职，表面理由是唐在谈判有关拟议中的国会组成问题时有越权行为，实际理由则是袁世凯认为孙逸仙当选临时大总统削弱了袁讨价还价的地位。唐按照袁的要求辞了职，但仍为袁工作。

1912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唐绍仪为内阁总理。此时，唐显然已取得了孙逸仙及一些民国首领的信任。但是1911年革命领导人之一、上海都督陈其美却表示担心，认为唐可能是袁用以破坏民国的工具。为了消除对他的怀疑并表示他愿和革命党人共事，唐参加了同盟会。袁为对付唐的这个行动着手削弱唐的地位。当时政府急需用款，唐以南京临时约法规定的政府负责人身份，匆匆和中比银行签订借款一百万镑的合同，四国银行团以该合同侵犯银行权利为由提出抗议。袁世凯出面声明他对此事毫无所知，要唐设法挽回，袁唐之间由此产生了隔阂。1912年6月直隶省议会任命国民党官员王芝祥为都督，经袁及内阁批准。当王芝祥北上就任时，直隶的军队发表声明加以反对，袁遂改变立场，将王派赴南方视察部队，唐乘机于1912年6月16日辞职，不告而别去了天津。袁派梁士诒去天津劝留无效，袁提出给唐“总统国务特别咨议”的闲职，唐置之不理，去上海从事私人业务，担任了金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长。

唐绍仪继续反对袁世凯的政策，袁世凯称帝图谋暴露时，唐和国民党一起反袁，1916年出任设在广东肇庆的南方军务院驻上海特别代表。6月，袁世凯死后，段祺瑞任命唐为外交总长，因北方人士的强烈反对而未就任。唐自此更加强了他和孙逸仙以及南方政治势力的合作。他同孙一样，于1916年底，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以泛亚洲主义来对抗西方的扩张，认为中国应与日本、印度联合“以求亚洲独立，抵抗一切外来侵略”。他和孙逸仙一样反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反对修订1912年临时约法。

1917年中，孙逸仙发动护法运动，国会解散后留京的一些议员到了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在广州成立军政府，以孙逸仙为首领。唐绍仪、伍廷芳也去广州与孙会合，分别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但两人均未正式就职，而是留在广州为孙逸仙咨询。1918年，桂系控制南方政府，孙逸仙愤而转往上海。唐、伍仍留在由岑春煊为首的七总裁合议制的机构中。1919年初，唐离广州去上海参加和北方代表举行的谈判，1919年10月谈判破裂，唐回家乡香山建立一座名为共乐园的庄园，准备从此退休，他拒绝了1921年5月孙逸仙提出的担任外交部长的要求，和1922年8月北京政府提请他担任内阁总理的要求，也拒绝了1924年11月北京政府请他担任外交总长的要求。

1925年，唐绍仪接见《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时，敦促人们承认“中国的共同心愿”和“中国的内心要求”，认为这是促进“民族的共同利益”和国家政治进步的基础。10月，他发表声明，反对北京的关税谈判，要求全面修订宪法，实行地方自治，恢复“我国优良传统之一”的民政工作，缩减“私人”军队，减少外国对中国内政的影响。

1929年初，蒋介石任命唐为国民政府“高级顾问”，但唐未加理睬。1931年蒋介石逮捕胡汉民，引起华南的分裂活动，唐也投入了汪精卫、孙科、陈济棠等人的广州联盟。1931年9月沈阳事变发生，南京和广州的首领们虽然重新统一，但唐绍仪继续支持半独立的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及西南政务委员会。在此期间，他曾一度在他的故乡担任县长，这个县已改名为中山县以纪念孙逸仙，被国民政府作为模范县直属中央。但他在县长任上未有成就，不久辞职。

1936年，陈济棠准备起事反对国民政府的计划日益明显，唐加以反对。同

年夏，他去南京出席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当时他是中央监察委员。会议期间，他带领广东的一些首领提出一个决议案，呼吁取消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唐还担任了国民政府委员。

中日战争开始后，唐因年迈（七十七岁）未和国民政府一起去中国西部，而是住在上海法租界。1938年谣传日本人请他给予支持，日本人的建议和唐如何反应的详情均不得而知。1938年9月30日，他在上海寓所被四名手持利斧的凶手砍死，这四个人借口给唐送来珍贵瓷器而获准进入他家。凶手的身份和行刺动机始终是个谜，案子也一直未破。唐遗有继室、二妾、四子、几个女儿和众多的孙儿女。子唐榴一度任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后任外交部办事处主任及驻檀香山总领事。长女是顾维钧的妻子。唐的继室所生最小的女儿嫁给新加坡百万富翁李光前的儿子。

唐生智 字：孟潇

唐生智（1890（？）10.31—），湖南军阀，他打败吴佩孚，对北伐的第一阶段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27年间统治了湖北、湖南和豫南，一度是武汉国民政府中权势最大的人。1928年后，他的军事生涯的特点是时而与蒋介石联合，时而又反对蒋介石。1949年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任过各种职务。

唐生智生在湖南东安县，祖父是湘军军官，父亲曾任一个实业部门的主管。唐青年时在家读书，1905年各省办起陆军学校后，他进了湖南陆军学校，后又进武昌军官学校，1912年进保定军官学校步兵科，同学中有陈铭枢、刘文岛等人。刘文岛为首建立一个学生团体要求改革军校，唐是该团体中的陆军科代表，陈是炮兵科代表。

唐毕业后回湖南，任第一混成旅见习排长。1916年6月袁世凯死，湖南都督汤芑铭下台，湖南成了谭延闿、赵恒惕、程潜、鲁涤平、宋鹤庚争夺的场所。谭延闿掌权时，唐在宋鹤庚部下任营长。1918年北洋军阀张敬尧任湖南督军，唐脱离宋部去赵恒惕手下任团长。1920年张敬尧被逐，由赵恒惕代理，唐因助赵有功，升任第二师第二旅旅长，1921年任第四师师长。为在部队灌输纪

律和正确的观点，他任用佛教徒在部队讲学。1922年他为此任用了岳州人信奉密宗的顾祖同（译音）。此后三十年中，顾对他的影响很大并定期向他的部队讲经。

1923年，谭延闿、赵恒惕间发生战争，唐在这次战争中崭露头角，他拒绝了谭的任命而忠于赵恒惕。赵得助于吴佩孚，打败了谭延闿。1926年，唐生智决定向赵在湖南的统治挑战，他确信自己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支持，就发起一个运动，其目的与其说是反对吴佩孚，毋宁说是逼赵恒惕辞职，赵终于在1926年3月11日辞职，任命唐为省政会议议长并代湖南省长，唐于3月25日就任。不久，陈铭枢、白崇禧到长沙，争取唐支援已计划实行的北伐。陈、白的使命和唐生智提供反吴佩孚的军事援助这二者的结合产生了丰硕的成果，1926年6月1日，唐生智宣布接受任命，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

1926年7月5日，唐得到第七军和第四军的支持进攻敌军。7月9日蒋介石就任北伐军总司令，任命唐为前敌总指挥，唐由是指挥何键、李品仙、刘兴、周斓、叶琪、夏斗寅的六个湖南师，并负责统辖李济深的第四军和李宗仁的第七军，他的保定老同学刘文岛被任命为第八军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7月11日，唐部收复长沙，三天后他正式就任省主席。8月12日蒋介石到长沙时，唐已为北伐建立了强大的前进阵地。

八月中旬，唐率四军、七军、八军的一部向北进军，他的第二师于8月22日占领岳州，吴佩孚惊闻北伐军进军迅速，8月25日到汉口，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坚守汀泗桥。这一战略据点的攻守战于8月26日开始，三天后即以国民党军队的胜利而结束。9月1日，张发奎、陈铭枢所率四军各师抵达武昌城边，9月6、7日，唐军攻占汉阳、汉口，10月唐生智、陈可钰、邓演达率军攻占武昌。攻克武昌以及开辟江西战线后，四军、七军向东转移，留下唐部八军控制两湖地区，蒋介石观察这个形势，命邓演达征询唐生智的意见后成立湖北省政府，但他也深知唐的强大地位所孕育的危险。9月底，他给广州谭延闿和张人杰报告说：“武汉政局不易统率，除再派几名政府人员和中央执行委员前去，否则中央大权行将丧失……必须成立以中央重要人物为首的中央会议以代替省政府会议。”10月22日，蒋介石提议把国民党中央党部由广州迁往武汉。

1927年1月，国民政府在武汉行使职权，唐生智同左派的政治主张紧密结合。3月，陈铭枢、刘文岛均被撤职，此后唐减少了与左派的合作。汪精卫从欧洲回国主持武汉政府，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对峙政府，唐成为驻武汉部队总司令。4月底，宁汉分裂加剧，唐仍率军北上河南，并由张发奎第四军支援，向强大的奉军进攻。6月初，唐军虽然获胜但已疲惫，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在豫北相遇。冯玉祥因此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武汉方面准备向他让出河南，争取他支持反蒋，但冯玉祥最后决定支持蒋介石。当时，发生了马日事变，促使唐迁回长沙，当他发觉他在湖南的支持者和部下表示强烈反共时，他也改变了对共产党的态度。7月中旬，武汉的国民党首领得悉共产国际的计划危及其权利时，亦决定反共。此时，唐手下的将领何键、李仙品已率军入武汉，对武汉三镇的工会采取行动。7月17日，何、李对汉口、汉阳实行军事管制，镇压当地共产党组织。反共活动继续进行。8月中旬，汪精卫等人已能集中精力和解国民党内宁沪（西山会议派）问题，确定由中央特别委员会代行政府职权，唐生智、顾孟余因对特别委员会的组成人选不满，遂于武汉成立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并宣布中央特别委员会为非法组织。

唐生智军力的迅速扩展，也引起他的部队内部的团结力量的下降，鲁涤平、贺耀祖等转而反对他，甚至何键也采取依违两可的态度。1927年10月20日，南京当局下令讨伐唐生智，解除其一切职务，几天后，中央特别委员会又将他开除出国民党。唐面对南京的讨伐，许多旧部又不愿再支持他，乃于11月11日辞职去日本。1929年秋，他的那个僧侣顾问顾祖同（译音）认为唐回国时机已到，唐遂于其时回国。他回国不久，就在华北策动了反白崇禧的兵变，夺回了于1927年前指挥的部队。1929年3月29日，他的部队编成讨逆第五路军。6月1日，他出任军事顾问委员会主任，编遣会议组织部主任。10月底唐率第五路军在豫西同冯玉祥军作战，这时，他成了河南国民政府所有部队的代总司令。11月底，冯军失败退出河南。是役结束，唐因作战有功被任命为国府委员。12月5日，他宣布反蒋，接受汪精卫的任命，出任护党救国第四路军总指挥。国民政府下令对他进行讨伐，促使他于1930年1月逃往香港。

1931年春，唐生智重回政治舞台，参加广州的分裂活动，任政府委员。9

月日本侵略东北，唐和汪精卫、张发奎、黄绍竑等一起到上海和国民政府当局谈判，10月19日，恢复了他的国民党党籍，作为重新统一的条件之一。随后进行党政改组，唐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并被任命为军事参议院院长。1934年12月他成为训练总监直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1937年11月，他又经顾祖同（译音）之功，自愿守卫南京，任南京警备司令，表示誓与南京共存亡。12月12日南京沦陷后，唐向西撤退，同国民政府会合。

在中日战争时期，唐生智名义上是军事委员会委员，但在战时的决策工作中未起什么积极作用。事实上，他不久就离开重庆回到湖南家乡。1948年他以湖南代表资格出席国民大会。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后，唐留在国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任了各种职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湖南省副省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湖南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1956年他成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委，1958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汤用彤 字：锡予

汤用彤（1892.6—1964.5），著名的中国佛教史学家，其主要著作是《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汤用彤生在甘肃怀远，旧学根基颇深，曾从佛教学者欧阳竟无学习数年，后进清华学堂，1917年毕业，1918—1922年留学美国，1922年回国任东南大学教授，1922—23年在南开大学教书，1924—30年在中央大学教书，1931年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的荣誉。尽管政局经常动荡不定，中日战争开始后，北大又迁往西南，汤用彤还是成功地写出了一部关于中国早期佛教的经典性的史书并于1938年出版。他的研究领域是早期中国学者很少注意的。他在北大教书直到1947年，然后去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专门讲授中国佛教史及佛教教义。1948年回国任北大文学院院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继续担任此职。1954年冬中风后半身瘫痪，1964年5月在北京去世。

他最初的一篇学术论文是《评近人之文化研究》，发表于最早从事于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杂志之一《学衡》1922年12月号上。他又翻译了华来士的《亚

里士多德哲学大纲》，向东方人介绍西方文化，发表于1923年的《学衡》上。他在《学衡》上发表的第二篇论文是《佛教上座部九心轮略释》，初次表现了他对佛教和比较方法学的研究兴趣。这篇文章发表于1924年，分析了早期小乘佛教的某些教义，并为今后对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作比较研究奠定了基础。

汤用彤把注意力转向历史分析，他对梁朝和尚慧皎（479—554）的《高僧传》作了一些笔记。《高僧传》是有关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及中国信奉这种佛教情况的最重要著作。他的研究成果《读慧皎高僧传札记》，发表于1931年南京史学会编的《史学杂志》上。汤用彤除对慧皎所引用的某些材料作了一些注释外，还探讨了某些传中所涉及的一些专门历史问题，例如：《竺法护卒于何年何地》、《僧伽提婆之毗昙学》、《鸠摩罗什年表》、《释道安马佛国澄》、《道安避难之年》、《道安年表》、《释慧远年表》、《僧肇致刘遗民书》、《支曼谛》、《佛面澄》、《魏太武帝毁法》。由于早期学者只是单纯的引用史料而不加校评，所以汤用彤就着手考订史实（由于佛教是不重视历史记载的，所以这是一件很艰难的工作），从而发现过去记载中的不少错误。他的洞察力使他看清了教义上的倾向性对过去一些记载的影响，从而为以后的学者研究和识别伪书指明了道路。汤用彤对中国佛教形成时期的历史和教义所作的大量研究，在三十年代产生了几部重要著作：《唐太宗与佛教》发表于1931年的《学衡》。他在该文中研究了过去几乎所有中国历史学者所忽视的另一个有关中国佛教史的重要问题，即西方人称为教会和国家关系的研究。1932年在《国学季刊》上发表《竺道生与涅槃学》，他出色地论证了“禅”即“顿悟”这个基本观念，早在公元四世纪时即已进行传授，这比其他学者提出的说法大约要早175年。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在1937年《燕京学报》上发表的《中国佛教零篇》，汤在该文中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公元一百年后中国知识分子对佛教输入的反应有多大？”“中国人对印度佛教理解得怎样，作了些什么样的诠释？”、“佛教对其后各代人发生影响原因何在？”这些问题以及汤所提出的回答是建立在艰苦的研究上的，它们向读者预示了他以后完成的有关自汉至唐中国佛教史的巨著的轮廓。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于1938年在上海出版，这部九百页著作中的几

乎四分之一的篇幅是分析汉代的佛教。在第一章中，他在说明佛教何时如何传入中国时，竭力把事实同虔诚的传说相区别，这些传说充斥于各种旧有的记载之中。然后他用语言分析法分析了这样一个著名的传说：佛教是在汉明帝时正式传入中国的，他指出这个传说中包含某些正确的因素之后，又考察了第一部译成中文的佛经《四十二章经》。他论证了这部书中讲解大乘佛教的段落，梁启超等学者常常引用这些段落来证明该书是伪书，汤用彤指出这些段落是被后来的佛教徒加到原著上去的。他的结论是，这部经书的最初本子完全是宣扬小乘教义的，它确实是一部很古老的书，因为早在公元166年时一个官员在给皇帝的奉章中即已引用这部经书了。

汤用彤这部史书所研究的其他重要问题是佛教和道教的关系，佛教玄学的产生，本国各种佛学理论尤其是道安（312—385）时的般若学的起源，佛教与南北朝的关系。他还研究了这样一些课题如神灵学的复活，南朝的“三论”、“真摄论”，北朝的律宗、禅宗、净土宗等的特点。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是一本多方面的有关这个时期的资料书，对不同的记述作了仔细的注释，对有争论的说法经常在标题和各章的附注中注明资料来源。这部著作也不是没有不足之处的，它没有涉及佛教的经济背景，很少利用国外的学术著作，特别是印度文和梵文的著作，全书也没有索引。但是汤用彤的宏伟的史书乃是任何研究早期中国佛教的人必读的书。汤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所作的贡献毫无疑问使他成了当时这一困难领域里的最大的中国学者。

陶希圣 原名：汇曾 笔名：方峻峰

陶希圣（1899.10.30—），社会经济史专家，汪精卫改组派成员，曾与汪精卫一起从事和平解决中日战争，以后感到幻灭于1940年带着汪精卫和日本签订的密约复本逃往香港。后来当了蒋介石的私人秘书和《中央日报》主编。

陶希圣家原是农民，他父亲一代才上升为绅士。陶的父亲陶炯照是一个秀才，母戚（译音）氏出身于书香门第。陶在湖北黄冈县出生时，他父亲正在北京给旗人的孩子教汉文。1900年义和团暴动开始，他离开北京到西安同家属相

聚，他在当地弘道学堂当教长。

1903年，他随父母到河南开封，1904年始，从塾师接受正式教育。此后数年中，他家搬到夏邑，新野、安阳等地，因其父先后在这些地方担任县丞之职。1912年夏，他曾去武汉新式学堂读书一年，他父亲任黄陂知县时，他又前往该地。他先在黄陂后在黄冈，由父亲督促读书，并且培养了对政治、历史、法律的浓厚兴趣。早在1915年，他随父到北京，考入北京大学预备班，1918年毕业后进了北京大学法科。他专心读书，因而五四运动对他影响不大。当时，他对罗马法及明清两代中国哲学特别感兴趣，同时又学日语，以便阅读日文法律著作。

1922年夏，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就任安徽省立法政学校教员。1923年冬他离安庆回家，经邓绍雄（译音）介绍，于1924年7月进了上海商务印书馆继周经生负责审阅法律和政治经济学稿件，并继续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结构，还挤时间为《学艺杂志》、《妇女杂志》写文章。

1925年五卅事件时，他在《公理报》上发表文章，谴责上海英国巡捕的暴行，表现了他对英国法律的知识，因此上海学生联合会聘他为法律顾问。随着他更多地参加这一运动，他的名声也愈高，并且认识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他加入了学艺社，为《孤军月刊》写文章，主编《独立评论》，又在激进派的上海大学教书，约在此时他开始阅读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书籍。1926年，因患伤寒，中断了上述活动。

1927年1月，可能是应周佛海之请，陶希圣去武汉在中央军校武汉分校任中校政治学教官，接着奉恽代英之命任征伐夏斗寅叛军的独立师军法处长，他改组了一个县政府并负责司法部门。因共产党对他的工作不满，不久就被召回武汉，任军分校政治部秘书。武汉政府清共后，陶一度任国民党武汉总政治部和宣传部秘书。11月，征伐武汉的部队临近，他逃往家乡，又去南昌，任江西党务学校校长一个月后辞职去上海。

1928年2月，陶由南京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周佛海介绍，任该校高级政治教官和政治部训导处长。他又常在周主编的《新生命月刊》写文章。12月，辞职去上海，加入顾孟余等人创立的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这些人后来被称为改组派。1930年，陶的《中国封建社会史》、《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问题

之回顾与展望》出版。这些书反映他阅读过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早在公元前1122年就已开始，在战国（公元前403—221）初期逐渐解体，因此他争辩说，中国社会在此以后就是商业资本主义性质并不是封建社会了。

陶希圣的著作引起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郭沫若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战国初期而极盛于大约公元前221年，中国社会从未脱离过封建时期。陶郭的争论在中国知识界中触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生动争论。

1930年，陶希圣一度任商务印书馆经理部秘书，商务替他出版了《辩士与游侠》和《西汉经济史》。1931年1月他任中央大学教授，同年春他完成了《中国社会现象拾零》一书，夏，到北京任北京大学教授，教中国政治思想史和社会史。1933年创办《食货》双周刊，大大推动了国内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又主持了关于唐代经济史的讨论会，其成果汇编成了八册论文集。

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召集知识界人士到牯岭开会讨论国难，陶亦出席了。以后去南京任汪精卫为首的国防委员会委员，同年底汪精卫将该会迁往武汉。1938年初，“艺文研究会”在汉口成立时，陶在周佛海手下任秘书长，该会从事出版并散发反共书籍。7月，陶任新成立的国民参政会成员，又充当汪精卫的顾问。同年秋，随同国民政府到重庆。当时汪精卫对中国支持长期抗战的能力抱悲观态度，鼓吹同日本进行和谈。12月18日，汪精卫离开重庆到昆明，陶希圣、周佛海、陈公博也到那里同他会合，他们一行于是去了河内。1939年初，陶、周去香港，为支持汪精卫的和平运动而展开宣传活动。5月6日，汪到上海，8月，陶也到了上海。1939年9月1日，汪精卫召开所谓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陶在这次会上被任命为中央党部宣传部长。

此后数月，他代表汪精卫与日方进行谈判时对和平运动日感失望，打算离开汪精卫。1939年12月30日，调整中日新关系的谈判宣告完成，1940年1月4日，陶和高崇武携有秘密协定的复本逃往香港，但陶的家属被拘押，后来当陶妻答应敦促陶返回上海后，准许她带两个孩子去香港，其他三个年长的孩子均扣

留在上海，直到杜月笙设法使他们获释。与此同时，汪精卫同日本达成的协议条款一经发表，激起了全国愤怒。

此后两年中，陶在香港办了一个国际通讯社并出版周刊《国际通讯》。1941年底，陶经杜月笙之功，准备离开香港，因当时香港已受到日本的威胁。1942年2月，陶抵重庆，随从蒋介石，并从事一些研究和写作活动。他还负责审阅一些报纸，尤其是《中央日报》的内容。1942年秋，陶为蒋介石收集材料写《中国之命运》，该书于1943年1月出版，10月，陶任《中央日报》主编，他担任这个职务一直到战争结束。1946年，任国民大会代表，1946—47年任中央宣传部次长。在此期间，他还担任了蒋介石的私人秘书。1948年，共产党接管北平前夕，他安排将一些著名教授撤至国民党区域。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辞职后，陶随同前往奉化，以后又去台北。

陶希圣到台湾后，继续主编《中央日报》。1950年，任中央复兴委员会设计委员会主任，1951年任立法委员，1952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55年辞去《中央日报》主编，改任董事长。

陶希圣有女一人，经雄（译音），子六人：泰来（译音）、复来（译音）、恒生（译音）、金生（译音）、方生（译音）、隆生（译音）。

陶行知 原名：文瀾 笔名：何日平

陶行知（1891—1946.7.25），教育理论家、改革家。他的理论依据杜威和王阳明的思想。他的“生活教育”的理论在二十年代表现为大众教育和乡村教育。三十年代则为半工半读和“国难教育。”

陶行知出身于小康之家，1896—1905年在旧式学堂读书，他智力过人记忆力极强。1905年可能由于取消了科举，他进了一所教会学校，主修英语，数学，三年内就修毕四年课程。以后他进了杭州的一所天主教会办的崇知医校。因为他不愿受洗入教而被取消了奖学金，他对今后从医为业又丧失信心，于是离校去苏州。他和他的堂兄弟一起读书，过着贫困的生活，靠典当衣物度日。最后他于1911年进了金陵大学文学系。

陶行知在南京开始从事教育和政治，这两项是他此后毕生从事的事业。1911年革命前后，他是学生中的活动分子，发起政治辩论会，组织了一系列爱国演说，并主编校内杂志《金陵公学报》。他虽是文学系学生，但对数学仍有兴趣，又发展了对教育和哲学的兴趣，经常和朋友们讨论中国传统思想与现代社会的关系。作为这些研究的成果，陶行知为王阳明非正统的儒家学说尤其是知行合一说所吸引，他也为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提出的教育理论所折服。“顺其性之所至，循循而善诱之”，这个训条成了陶自己的理论基础。为了表明他同王的密切一致，他还取了“知行”作为自己的名字。

1914年，他在三年内完成了四年的课程，毕业时名列前茅，是年夏，他在亲戚资助下去美国留学。他原想在市政机关工作，所以进了依利诺斯大学作研究生，学习政治。他选修了教育行政课，由杜威过去的一个学生授课，正是这个教员使陶行知对杜威提出的哲学和教育体系有了初步了解。这给了陶深刻的印象以致他在1915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深究“杜威体系的源泉”。他在师范学院一直到1917年夏，潜心研究杜威的实用主义，决定毕生从事教育。

1917年秋，陶行知回国，以杜威和王阳明的思想为依据，开始发挥他的“生活教育”的理论。此后二十年中，他努力把这种思想具体化，首先争取人们注意这种理论，然后把它变为一系列的实际方案，以适应中国不同时期的特殊需要。这些方案包括群众识字教育、乡村教育、工读教育、国难教育、战时教育、国民教育，最后是民主教育。陶当时担任南京国立师范学院教师。最初他发现新思想很少有人感兴趣，他准备以杜威的原则改造学院的打算遭到否决，教育系内部的反对使他不得不辞去系主任之职。1919年初发表的他那篇侃侃而谈的文章《教学合一》，很少受人注意。陶毫不气馁，继续宣传杜威哲学的主要内容，例如教师的首要责任是教学生学习，教授方法应与学习方法相联系，学生应该不断求知而不把自己的知识看成是静止的，最终的。陶的事业转折点只是到发生五四运动时才来到，新思潮和活动压倒了学院（那时称为东南大学）的保守势力，陶终于真正能担负起教育系主任的责任，并开始实行彻底改革。

陶行知担任了东南大学有名的教育系主任后，成为杜威学说在中国的主要宣传者。1919—21年，杜威来中国访问，陶担任杜威在南京讲学时的翻译，这次讲学是东南大学和北京大学联合发起的。大学之间的这次接触，也使陶自1919年以后同与蒋梦麟主编的《新教育》月刊有关的人群发生了关系，而蒋梦麟亦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从杜威学习过。陶为此月刊写过一批文章，讨论有关改革中国教育的问题。该刊的撰稿人还有黄炎培、郭秉文、罗家伦、胡适、蔡元培等人。1921年冬，这些人创立了中华教育改进社，蔡元培是首创人。1922年2月，该社在上海首次开会，陶任总干事，他同时又主编《新教育》，这个刊物当时已成为该社的机关刊物。

杜威访华，教育社成立之后的年月中，陶行知开始实行他的第一个大规模计划：民众教育运动。1923年6月在南京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两个月内，这个运动扩展到武汉及其他城市。8月，民众教育会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大会，设立常设机构，以熊希龄的妻子为首席，晏阳初为总干事，10月就开始了大规模活动，到1924年6月，已遍及二十个省和行政区。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的主张在民众教育运动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他从王阳明的学说中认识到真知必然具有实际效果，而知和行则是一致的。从杜威那里他获得了真理进化的学说，以及人类一切形式的活动都是解决问题的工具的观念，他又从杜威那里懂得了民主是伦理价值的始初源泉。陶行知抱着这些观念，着手开展识字运动，认为只有民众识了字，中国的民主才有足够的基础。陶的“工具”就是民众教育运动，其具体计划就是群众识字。他打算在最短期间取得最大成就，因而把工作集中在城市进行。作为“群众读书网”的夜校开办起来了，它简单地由各种社会单位组成的，在家庭、商店、工厂、旅馆、学院，识字的人教文盲识字。此外，他还发起“一教一”运动，要每个新识字的人至少教一个不识字的人，他还创立许多活动中心，使流动工人、人力车夫等人都有求教之处。

民众教育运动不断发展直到1927年。陶行知也继续表现出那种单纯的热情和精力，蒋梦麟把它称作“传教士精神”。为了同普通老百姓打成一片，陶身穿棉布衣裤，头戴圆帽。他的同事常说他是回国留学生中“最彻底的中国人”。

1927年3月，民众教育运动取得极大的成功，但同时也被国民党保守派官吏和军阀看作是危险的运动，尤其是因为陶的朋友中有不少左派作家和知识分子。由于来自这些首领的压力，陶于1927年3月，另作新计划，一个月后，民众教育运动从此一蹶不振。

陶行知看到他的活动在城市里受到阻难，就转而从事乡村教育。1927年3月，他和赵叔愚在南京郊外的一个小村子晓庄创办了一所实验师范学校。开始时只有十三个学生和一些遮避风雨的帐篷。晓庄师范的计划强调训练师资，复兴乡村，它致力于通过实践教育使学生具有主办乡村小学的本领，组织学生深入农村生活，从事体力劳动以改变思想。其教学方法完全是“从做中学习”。晓庄师范除作为培养乡村教师的创造性事业外，还计划以此作为一种学校的样板，其目的是要在全国完成乡村复兴。陶赞同生活教育的全部内容，反对单纯的课本教育，他为中国的教育开辟了新的道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行合起来”、“行动是知识的源泉”等口号。1927年底，这个学校及其办学方针已得到普遍承认并为人所仿照。

乡村教育运动，像民众教育运动一样继续蓬勃发展，直到1930年它也受到了怀疑。这年秋天，晓庄师范被国民政府封闭，陶深感有可能被捕，逃到日本。大约这时，他已把他的名字从“知行”改为“行知”，他的改名可能是为了表明参加当前的实际生活。不管怎样，他此后就是以陶行知之名而闻名于世的。

陶于1931年春回到国内，此后四、五年间他从事各种教育活动，为儿童创作故事歌谣，编辑了一套儿童科学丛书，创办了一所儿童科学通讯学校，翻译了几种西方文学作品，但他的译稿在1932年1月28日日机轰炸商务印书馆时被毁。这场大火也不完全是个灾难，因为它使陶转而从事于他的第二项大计划，陶认为团结中国人民自己保卫自己至关重要，于是创立了生活教育社并主办双周刊宣传这一思想。

陶行知根据在晓庄师范的经验，发挥了他的“工读”学校的思想，希望群众能自食其力，通过学习而了解他们自身以及他们的生活，加强团结以保护自

己。1932年10月1日，他在上海办了第一个工读学校，一年间，学生人数从十一人发展到三百多人。不久，别的工读学校也建立起来，1934年工读运动已发展到二十一个省。工读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陶所创立的“小先生制”，依据这个制度，小学儿童是成年文盲的教师，他说“学校要成为发电厂，每一个儿童是一根电线，将电力输送到群众心里”。与此相适应，他又创办了另一个协会，在1933—34年间，把“小先生制”推广到工人农民中间。

1935年，日本问题变得越加严重，陶行知的事业开始更为明显地转向政治。为了应付国难，他提倡“国难教育”，这是一个同他取得成功的工读计划类似的发动群众的计划，但要求取得比工读计划更快的效果。陶为此又创立了一个协会宣传这个主张，并为此旅游各地。

1936年夏，陶作为代表出席了在伦敦召开的世界新教育会议，他在会上作了有关生活教育和“小先生制”的报告。在欧洲期间，他以成立一年的全国抗日救国联合会代表的身份进行活动，这个组织是为了向世界报道中国的情况而建立的。一年后，他作为代表又出席了在伦敦召开的世界反侵略大会。在这次出访中，他似乎与共产党的代表吴玉章一起旅行，还一起去拜谒了马克思的墓。

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爆发时，陶正在美国，他为团结美国华侨支持祖国而进行活动并吁请美国人民支援中国抗战，拒绝向日本供应军火。据说他还登记了华侨洗衣工人的名字，请他们在洗涤干净的衣服口袋里装进支持中国的宣传品。陶从美国又到了其他二十多个国家，争取他们对中国的支援，1938年秋，他经香港回国。

陶行知回国后，以他惯有的全力以赴的态度从事抗战工作，他到了国民党管辖地区后，立即参加筹设战时教育协会，并制订了活动计划。战时教育也是以生活教育的原理为根据，但是适应战时的特殊需要，特别是保护群众，动员群众的需要。大约与此同时，他在桂林成立了生活教育社临时总部，暂任理事长。1938年他被任命为重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他还着手改善他在奔赴内地途中所遇到的成千上万逃难儿童的生活条件。1939年6月，他在重庆北碚创办了育才学校，收容一些有才华的孤儿，分成八

个班（音乐、戏剧、舞蹈、文学、绘画、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班及非专业班），其课目强调生活教育，他希望以此成为全国的教育模范。陶行知虽然忙于其他工作，学校又经常缺少经费，他还是坚持把学校办下去。

这所学校和国民参政会，是陶行知在战时的主要的工作。但在日本战败后，他的注意力集中到争取和平防止即将来临的内战的斗争上。他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委委员，负责两种出版物。由于各种原因，民盟遇到了阻碍，1946年1月陶被指控使育才学生进行暴力活动而因此出席法庭。案件审理中所揭露的事实，似乎说明育才学生不但没有煽动暴力行动，反而是于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参加一次群众大会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殴打，这次大会是为庆祝政治协商会议刚刚签订了一个很不牢靠的国共停战协定而举行的。此后不久，他离开重庆去上海，忙于处理学校复员工作和新的教育活动，他的主要工作是为青年工人创办社会大学，该校学生甚至可以选举学校管理人员以至校长。陶认为当此时机，生活教育必须有社会的，尤其是政治的倾向性，于是，他的民主教育的理论就在社会大学和其他学校中加以实施了。

1946年中，内战势头再行加强，城市动荡加剧，1946年6月，陶参加了一个上海派出的大型民众代表团赴南京和平请愿。一个月后，中国民盟领袖李公朴、闻一多双双被杀。陶十分激愤的说：“一个人为了民主而牺牲，千万人将起而代之”。当时谣传，陶行知已被列入黑名单之首，陶时时刻刻准备接受“第三枪”。为了在打击来临之前把各项事情处理好，他不顾血压升高而日以继夜地工作着。他因过度紧张，于1946年7月25日中风死在上海，年五十五岁。各地发来许多唁电，其中有来自延安的毛泽东和朱德的，唁电认为他的逝世是中国人民的一大损失。他的遗体安葬在南京附近晓庄师范旧址老山山头上。不下于五十三个团体参加了正式葬礼。1947年由纪念委员会出版了《陶行知先生纪念集》，全书七百多页，收集了一百多人的颂扬文章，其中有司徒雷登、郭沫若、郑振铎、茅盾、马寅初、史良等人的。

陶行知出身于农民家庭，了解群众疾苦，他毕生极其关怀中国普通百姓的命运，穿着同他们一样的衣服，说着同他们一样的语言。他的白话诗确实是用普通群众的语言写成的民歌，他以此建立了和群众的联系。他出版了十册这样的

民歌，旨在进行教育，内容涉及哲学、政治、教育方面的问题。他把一些生日、纪念日、婚礼、表礼等等，他都用来进行教育。就性格来说，陶行知具有独立思考、讲话直率、行动敏捷的特点。他对群众和孩子比对自己家庭还关心，关心朋友比关心自己为重。表面上，他看来很冷静，一旦发言，他的思想和感情就争相表露。他生活非常简朴，仅有的奢望是吃花生米和看戏。

作为一个著述家，陶行知首先是由于翻译杜威及其他西方教育家的作品而出名的。1922年他出版了《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1928年出版了《民本主义与教育》，这是杜威的《民主和教育》的中文本。作为一个创作家他在杂志上发表了非常多有关教育的论文。此外还写了许多书，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24年和朱经农合编的《平民千字课》，1928年的《中国教育改造》，1929年的《知行书信》，1930年的《教育促统一讨论》，1934年的《老少千字课》，1936年的《中国大众教育问题》，1944年的《育才学校手册》。他逝世后出版的有1947年的《行知诗歌集》、《陶行知教育论文选集》，1949年的《陶行知先生遗著》，1950年的《行知歌曲集》、《伪知识阶级》，1951年的《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有关陶行知的著作有：1949年出版麦青的《陶行知》和戴白韬的《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1950年生活教育社编的《陶行知先生四周年祭》和何公超的《鲁迅和陶行知的意识》，1952年潘开沛的《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

陶行知遗有他的续弦妻子吴树琴，四个儿子和不少孙儿女。他在1914年结婚的前妻死于1936年。

邓锡候 字：晋康

邓锡候（1889—1964.3.30），四川军阀，1936年，他成为割地自据的四川军事指挥官中将自己的防地交给国民政府当局的第一人。中日战争时曾任第四军团长，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1949年向中国共产党投诚。

邓锡候是四川营山县人，曾在四川讲武堂、南京陆军中学堂、保定军官学校接受教育。1912年毕业于保定军校后回四川在刘存厚手下任教官，他在川军

中稳步上升，当上了团长。1916年参加反袁斗争，当时四川宣布独立。1917年刘存厚任四川督军，提升邓锡侯为准将清乡督办。熊克武驱走刘存厚任督军后，邓在刘成勋手下任职，1920年任第六师师长兼顺遂镇守使。

1921年，邓任三师师长，翌年，他和刘成勋、但懋辛、赖心辉、田頌尧、刘斌一起驱逐杨森、刘湘出四川。1923年2月，邓又与刘成勋冲突，劝刘湘、杨森回四川。1924年5月，曹锟任邓为四川省长。1925年3月他参加解除杨森善后督办之举，但于1926年2月又与袁祖铭联合支持杨森上台。同年5月，吴佩孚任杨森为四川省长，邓为督军，袁祖铭为川黔边防督办。

1926年底，邓和杨森一样决定效忠国民党。1927年他们与蒋介石一起反对武汉国民政府。邓任国民革命军二十八军军长后，于1927年底成为南京军事委员会委员和第七路军总指挥。

1928年10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邓为以刘文辉为省长的改组后的四川省政府的政务厅长，并在刘湘手下任川康编遣处副主任。他于1929年春就任这些职务。1932年秋，他和刘湘、杨森一起驱逐刘文辉，刘文辉于1933年10月被赶到西康。1934年刘湘任四川省主席。1935年共产党长征部队威胁四川的稳定局面时，刘湘兼任绥靖主任，邓任四十五军军长，四川剿匪军一路军司令。1936年，邓成为半独立的四川军阀中将其防区交给国民党政府当局的第一人，此举使国民政府能加强其在四川的影响，他同时被递升为上将，获得青天白日勋章，并任第六路军总指挥。

1937年7月中日战争开始后，邓任第四军团长，开赴山西前线，后又调往徐海前线，在1938年3月滕县之战中表现出色。是月，邓任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川康绥靖公署主任。他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担任这些职务。1946年代理四川省主席，1947年5月成为省主席，他于6月2日就任，后因被控分配军饷不均，于1948年4月去职，以后被任命为川陕甘绥靖公署主任。

1949年12月，国民党准备将四川这个在中国大陆的最后据点放弃给共产党时，邓和刘文辉宣布起义，向共产党投诚。此后邓成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以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任四川省副省长，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1964年3月30日在成都去世，年七十五岁。

邓 铿 字：仲元

邓铿（1885—1922.3.23）广东革命党首领，他在组织和训练广东军队方面起了关键作用。他于1922年被刺，由此，孙逸仙和陈炯明为争夺广东开始了公开的斗争。

邓铿兄弟六人，他居第二，出生在广东梅县的一个商人家庭。父亲邓立庄（译音）在淡水继承家业，邓就在那里度过童年并上了学。他受到师友的影响，热情支持反满革命活动，1905年二十一岁时，进了广州一所军官学校讲评学堂，1906年毕业后，留校任助理教官，1908年担任清政府用以改革军队的黄埔初级军校校长，他利用职务之便，在学生中宣传革命思想，其中有如张发奎、薛岳、邓演达、叶挺等人，后来都成了著名的军事首领。

1910年，他直接参加了革命党同盟会在广东的秘密活动，这一年初，他秘密到香港帮助赵声准备在广州举行的新军起义，起义未获成功。他还参加了1911年4月27日著名的黄花岗起义，事后他和一些同志逃往香港。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胡汉民等人在香港计划四路向广州进攻，与此相应，邓铿和陈炯明受命在广东东江流域一带招募军队。邓去家乡淡水，陈去家乡海丰。为进攻惠州，他们把招募来的队伍合成一支部队，陈任该军司令，邓任参谋长。邓又改编了在惠州投降的清军四个营为一个团，自任团长。陈邓率领这支部队进入广州，当时广州革命党人已宣布广东脱离清廷而独立，并选出胡汉民为都督。

1911年12月，陈炯明任广东省代都督，邓任省公署军事部长，改组革命军扩充为两个师。1913年他还一度出任琼崖镇守使兼善后督办。1913年夏反袁二次革命爆发时，广东革命军被袁世凯的部将龙济光击败，邓和遭到失败的国民党其他追随者逃往香港，不久他去日本。此后两年中，邓积极支持孙逸仙推翻袁世凯。1914年，邓秘密回广东，和朱执信及孙逸仙的其他助手合作，谋求以武力抵御龙济光，但未获成功。他还和朱执信、许崇智及其他人同去马来亚在华侨中寻求对国民党和反袁活动的支持。

1916年，邓又回广东，以石龙为基地，向龙济光发起几次武装袭击，又被打败，遂避居香港，后去日本，一度学习军事和政治。1917年，邓因父亲去世又回广东。当时孙逸仙取得桂军陆荣廷等人的支持，成立了以自己为首的军政府，举行护法运动，反对北洋军阀及其在南方的势力。但是由于广东及广州军政府操在桂系手中，孙逸仙想组成一支归他自己掌握的独立的武力。1917年冬，省长朱庆澜把二十个营的兵力交给孙逸仙支配，这些部队匆匆组织起来交由陈炯明指挥，组成“援闽粤军”，陈任司令，邓任参谋长。1918年春，该部调往粤东准备开进邻省福建，8月，在厦门西面的漳州设立司令部。

此后两年，邓铿在漳州集中精力训练粤军使之成为富有战斗力的部队。他从中选出最热心革命最有献身精神的青年建立一个独立小队。经过邓本人监督下的严格训练后，这个小队扩大为独立连，独立营。在此期间，邓多次去上海，向孙逸仙报告和请示工作。1920年夏，孙认定粤军驱逐桂军夺回广东的时机已到，虽然陈炯明不愿离开漳州，邓和许崇智说服他遵照孙逸仙的愿望行事。8月，粤军三路向广东进军，陈率中路，许率右路，邓率左路，纪律松弛而又道德败坏的桂军不久被打败，10月，邓的精锐的独立营率先攻入广州。

1920年11月，孙逸仙回广州重新成立军政府，陈炯明成为广东省长，保留粤军总司令职务，邓铿作为陈的参谋长，将粤军一部分部队改编为第一师，自任师长，师内军官有李济深、陈济棠、陈铭枢、蔡廷锴以及他从前的学生张发奎、薛岳、邓演达等人。1921年夏秋之际，粤军北伐征讨粤西和广西的陆荣廷部队时，第一师起了重要作用。是役，邓留守广州保障部队后方，成功地击退了来自粤北的陆荣廷同盟者沈鸿英部队的进攻。

广州政府打了胜仗的部队攻占广西全省后，孙逸仙和陈炯明因孙决定继续北伐进军湖南、江西而意见不一致。结果，实行妥协，决定孙逸仙亲自率领在广西的军队北伐，陈则回广州负责筹措北伐所需经费和保障供应物资。但是陈炯明一回广州，就越来越表现出不愿合作，并且秘密活动阻难孙的北伐。

邓铿因与陈炯明长期共事而又十分忠于孙逸仙，孙遂派邓为首席联络官，在北部前方和广州后方之间进行联系并负责从广州给北伐军输送军需物资。邓既要努力为孙逸仙筹运军需又要劝陈不破坏北伐，他在孙陈日益扩大的纷争中处

于两难地位，邓为支持孙的北伐所作的努力，终于激怒了陈炯明等人，1921—22年冬，两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了。

1922年3月，邓铿和广州政府外交部部长伍朝枢同去香港购买北伐军所需军火，3月21日同回广州，抵达广州火车站时邓遇刺，中弹三枚，凶手在混乱中逃走。1922年3月23日邓因伤去世，年三十八岁。临终之前，据说邓曾向胡汉民叙说因支持孙逸仙最近同陈炯明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吵，并说他对凶手是面熟的。基于这些说法，人们纷纷传说陈炯明是刺杀邓的幕后主使者。但是这些传说没有得到证实，陈炯明事后也狠狠地否认了他与邓铿之死有任何牵连。

邓铿葬在广州北郊，和1920年死去的朱执信的墓地相距不远，朱在生前曾是邓最亲密和最尊敬的同事之一。1922年陈炯明失败后，广州政府在观音山设立了一所图书馆纪念邓铿。

邓泽如

邓泽如(1869.3.19—1934.12.14)，锡矿矿主，孙逸仙的赞助人，为国民党在东南亚一带筹募基金而知名。

邓泽如，广东新会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早年为维持家计而工作，所以很少上学，二十多岁时移居新加坡，在一个商店当伙计。几年后，他离开这个海岛殖民地到大陆上的马来亚投入“锡矿热”，在霹靂州金达谷经营矿业相当成功。

邓在什么时候开始反满活动未能确知，1907年12月，他担任了同盟会马来亚分会会长，此后他表现为一个能干的领导人和基金筹集人。孙逸仙、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因华南起义多次失败，1908年到了新加坡、马来亚，那时邓已把他的企业和家庭迁到森美兰州的芙蓉，同盟会首领先去探访了他，然后去吉隆坡、怡保、檳城筹集基金并由胡、汪发表演讲鼓舞士气。

除了募捐筹款外，又为逃离中国的革命党人提供藏身之处。1909年，东南亚英荷属地的同盟会总会从新加坡迁到檳城，孙逸仙请邓负责主持总会活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时，邓又进行一次新的筹款活动。孙逸仙从欧洲回中

国时途经槟城、新加坡，12月16日，在停泊于新加坡的船上会见了邓泽如。孙逸仙任新建的民国临时大总统后，通知邓募集一笔基金作为购买国家公债之用。此事办得很顺利，有一名吉隆坡的华侨富豪一下就全部认购。1912年2月，邓应孙逸仙之邀，与孙住在槟城的家人同到中国旅游，他到了南京、上海、杭州、又在广东住了几个月，考察开发矿业的可能性。7月24日，他回到马来亚继续经营矿业。

1913年初，广东都督胡汉民召请邓回国，邓到达广州后，胡劝他在广东经营锡矿并任省银行总经理，邓对开发矿业表示有兴趣，并着手访问一些据称有矿藏的地区。6月，邓同意主持一个采矿企业，该企业由国民党广东分部给予资助。正当进行具体安排时，袁世凯任命陈炯明继胡汉民为广东都督。胡汉民在去职之前，设立一个办事处清理国民党对华侨的财务往来并请邓泽如主持这个办事处。该办事处所需活动经费由省金库开支，一些广东的首领对此表示反对。陈炯明最后向他们作了让步，办事处也就此关闭。二次革命时，龙济光把陈炯明驱逐出广东，邓泽如回到马来西亚。1914年9月到1916年11月，邓任改组后的国民党财政部长。1914年—15年，1917年，他先后为反袁运动及护法运动筹集款项。

1918年邓泽如五十岁时，国民党同人为他祝寿，胡汉民起草了祝词，由廖仲恺篆写，汪精卫、陈炯明、居正、林森、徐谦、许崇智、邓铿、戴季陶、朱执信都署了名。孙逸仙送他匾额，上署《仁者多寿》的字样。

1912年，邓泽如去广东，一度任广东盐运使，同时协助开发广西锡矿。1922年6月，陈炯明背叛孙逸仙时，邓逃往香港，立即着手为应付这个事变而筹款。当时在上海的孙逸仙任命邓主持国民党广东分部。在香港成立了一特别办公处，筹划反对陈炯明的活动，名义上由胡汉民负责，下有以古应芬为首的联络组，以林直勉为首的军事组，以邓泽如为首的财政组。10月，孙逸仙任命邓为香港特派经济委员。1923年2月，孙逸仙重新掌权，邓任广州政府建设部长。

1923年秋，孙逸仙着手按照列宁主义路线改组国民党。10月25日，他指定一个九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包括邓泽如、林森、廖仲恺、共产党人谭平山，其任务是改组国民党。使人惊奇的是，邓泽如在此以前完全支持孙逸

仙，从不发表任何政见，这时却发表意见反对与共产党合作，但是改组工作按计划照常进行。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泽如和张继、谢持、李石曾、吴稚晖等人一起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6月16日，邓、张、谢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要求弹劾共产党的决议案，7月3日，提案被拒。四天后，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指示，号召党员解除误会，重申国民党要求所有入党的人必须服从党纪。1925年3月，孙逸仙逝世，国民党决定改组广州政府。邓反对将该项决议提交讨论表决。6月30日，他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提出对中央改组会议的弹劾案并要求延期改组。尽管他加以反对，国民政府仍于1925年7月1日成立。邓泽如虽未参加西山会议派的活动，但据说他对这个保守派给予财政上的支持。

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再次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北伐开始，国民党分裂后，邓支持蒋介石。1927年4月9日，邓和另外几个中央监察委员，共同谴责武汉国民党左派政府，这个声明为4月12日国民党在上海清洗激进分子开辟了道路。当时邓参加了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的与武汉相对峙的政府。5月5日，南京国民党成立清党委员会，邓是七人委员之一。8月，蒋介石为谋求国民党的团结暂行辞职，邓亦辞职，和古应芬一道去日本。他们回国后不久，广州公社成立了。12月16日，南京政府委派邓、古调查汪精卫在此次事件中的作用。他们于1927年12月31日提出的调查报告对汪大加批评。邓由是回到广州，虽仍为中央监察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实际上已过着退休生活。1931年4月，他又重新在政治生活中露面，和肖佛成、古应芬、林森联名发表声明，要求弹劾蒋介石，因为他软禁了胡汉民。5月，孙科、汪精卫、陈友仁等政治领袖在广州成立分裂派政府，1931年9月，日军攻占沈阳，为应付国难，双方言和。此时邓被任命为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常委、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1934年12月19日他死在广州。

邓演达 字：泽生

邓演达（1895—1931.11.29），北伐时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1927年后开始反对蒋介石的领导，1930年组织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人称第三党。1931年以叛国罪被国民党处决。

邓演达，广东惠州人，十二岁时进黄埔陆军小学，后来的一些将领如薛岳、叶挺亦在那里受训。邓是班上最年幼的学生，但是他的勇敢精神不久受到教育长邓铿的注意。

1911年民国革命爆发，他中断了军事教育，投身姚雨平的革命军。1912年民国成立，他又回广州，进了广东短期军校，于1914年毕业。1914—16年进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1916—19年进了保定军官学校，1919年在徐树铮的西北边防军当见习军官。

此时，邓铿已升任陈炯明粤军的参谋长，粤军司令部设在闽南漳州。1920年，邓铿召邓演达来漳州指挥一个小部队。10月，粤军重占广州，邓铿任改组后的粤军第一师师长，以邓演达为师部参谋、步兵营营长。

1921年底，邓演达营担任桂林孙逸仙前线司令部警卫。1922年8月，邓铿在广州被刺，陈炯明力图重新独掌广东大权，孙逸仙逃往上海。邓演达和张发奎、陈济棠协力保持第一师的完整性使之成为支持孙逸仙反对陈炯明的有力部队。1922年冬，第一师和滇、桂军合作驱逐陈炯明出广州，此时，李济深任一师师长，邓演达任该师三团团团长。

1923年初，孙逸仙回广州，决定改组国民党，邓演达坚决支持与共产党合作的政策和设立军校的决定。1924年1月，孙逸仙任命邓为筹备黄埔军校的七人委员之一。5月，军校成立后，李济深任训练部主任，邓为副主任。因此邓在实施军校最初的训练计划，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和政治纪律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对革命事业的干劲和热忱使他在军校学生中享有盛名，但却遭到了教导部主任王柏龄等人的敌视。1924年底或1925年初，邓突然辞职去德国。

邓在柏林认识了朱德、高语罕等共产党人，经常开会学习讨论马克思主义

理论。他经苏联回国，赶上参加了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当选为中共候补执行委员。他应蒋介石之邀回黄埔军校任教育长。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时，邓演达与一些中国共产党代表一起被捕，不久获释，调到韶州，主持军校的分校。

不到几个月，邓又被召回广州，担任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职务：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1926年夏，北伐开始，邓先派出军队宣传队，动员农民支持北伐，并调查农村情况作为实行孙逸仙提出的改革农村平均地权等主张的中行步骤。邓演达很有鼓动群众和进行政治组织的才能，他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起了卓越的作用，这个政治斗争促使北伐军在湖南和湖北迅速取得军事胜利。他得到政治部俄国顾问铁罗尼的帮助，还充任蒋介石的前线指挥官，以及与第八军军长唐生智之间的首席联络官。国民革命军在进攻两湖吴佩孚的军队时，邓实际上成了蒋介石指挥军事作战的副手。在围攻武昌时，他还亲临督战攻城。攻城尚在进行中，蒋介石就已任命邓为湖北政务委员会主席，与陈公博共同负责湖北事宜。10月10日攻占武昌后，蒋介石急电邓，叫他与唐生智磋商迅速成立湖北省政府。

1926年底，湖北的战争结束，蒋介石和邓演达之间的关系仍然密切而诚挚，邓经常向蒋介石反映唐生智的活动情况，唐是国民党中部战线上没有势力的司令官，蒋介石怀疑他有独树一帜的政治野心。1926年底，南昌国民党人和在武汉建立了总部的国民党人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前者以蒋介石为首，后者包括邓演达在内，于是邓和蒋之间的关系也紧张起来了。

两派不和的三个基本点是：与共产党合作、新首都所在地和今后北伐的方针等问题。武昌攻克后，邓演达赶回广州催促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迁到武汉。1926年12月13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机构从广州迁往武汉前，代行政府职权，徐谦主持了这次联席会议，邓演达是会议成员。但是，12月31日，党政官员到南昌后，蒋介石决定以南昌为临时首都，同时，南昌党部首领提出的军事战略也引起冲突，于是分歧加剧了。1927年1月1日，南昌召开军官会议，邓代表武汉方面发言，反对蒋介石将部队由北上直趋北京改为攻打南京和上海。

1927年开头几个月中，南昌武汉之间的争执加深了，邓以武汉国共合作最有影响的领袖的形象出现。1927年3月10日到17日，在汉口召开国民党中执委三次全会后，左派势力超过了蒋介石那一派。邓保留了政治部主任之职，还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委员，并任国民党农民部长和重新组成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3月底，又兼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负责人。

蒋介石和武汉政府之间的分歧发展成为公开的实力较量。4月2日，蒋介石在上海召开中央监察委员会紧急会议，决定“清党”，反对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及其他左派首领。蒋介石指名批评邓演达，在“封闭政治部的布告中”，指控邓将一些企图破坏国民革命的人塞进政治部。5月，蒋介石于4月间建立的南京政府公布文件，指责邓根据俄国顾问鲍罗庭的指示破坏武汉政府，并说邓倡导实行列宁的工农武装暴动的政策。

1927年7月，邓演达在武汉《中央日报》上发表文章，申斥蒋介石、戴季陶，称他们是孙逸仙三民主义的叛徒，号召对蒋及“一切反革命分子”进行讨伐。当时，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不少国民党左派谋求同南京政府和解，理由之一是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冯玉祥已决定支持蒋介石。在武汉的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一次非正式会议上，决定将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开除出党。邓强烈反对这个决议，当即辞去政治部主任及农民部长之职，公开谴责武汉首领和蒋介石妥协并曲解三民主义。

在此期间，邓演达仍然支持孙逸仙联俄联共的政策，和俄国顾问密铁罗尼密切合作，他的同事和部属仍有不少共产党人。看来他接受了共产党有关教育农民，组织农民的办法和政策。此外，1927年中，他发表政治宣言，号召进行反对“剥削者和统治阶级”的社会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这反映他受了马列主义影响。尽管邓和共产党人及其学说关系密切，但他主要还是忠于孙逸仙的国民革命理想和三民主义，他认为蒋介石的政策已背叛了孙逸仙的政治社会思想，但他对武汉一些共产党人的某些活动亦有所不满。他开始怀疑共产党人政治鼓动的政策更多取决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利益，而不是中国的民族利益，这个政策预示着要破坏武汉的经济生活。面对着国共公开决裂、独立的国民党左派行将瓦解的形势，邓开始考虑另谋出路：建立一个第三党，在孙逸仙理论

主张的范围内，将现有的两大党的经济、社会理想融为一体。

1927年初夏，邓离开武汉，乔装成工人，沿京汉路步行到郑州，然后去陕西。他到潼关，遇到鲍罗庭及其他苏联顾问回莫斯科的汽车车队，1927年8月15日他到达莫斯科，受到第三国际代表的欢迎，8月17日应邀作了《中国革命目前危机的根源》的报告，他说中国人民虽然欢迎第三国际的友好支援，中国革命却完全是中国的事，不能为共产国际的目的而效力。他又说，共产主义运动只适用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是一个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如农民问题不得解决，革命将无限期地延长下去，这些见解，斯大林很少同意，因此邓在高加索作了短暂访问后就秘密离开莫斯科去柏林。

邓演达虽和南京有分歧，但他自认为是国民党的正统派。1927年11月1日，他发表正式宣言，敦促国内同人组织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继承孙逸仙的革命遗志，揭露南京“假”国民党的政治异端。1928年夏，他去斯匹兹卑根岛旅行，然后又访问许多国家考察社会和经济情况。1929—1930年，他访问了斯塔的那维亚、英国、法国、奥地利、意大利、波兰、立陶宛、匈牙利。1930年2月他访问保加利亚，以后他在报告中说，在保加利亚度过的日子是欧洲之行中最愉快的，他认为保加利亚是谋求未来发展的中国最值得学习的榜样，中国学生应该到那里去学习。以后，他又访问了土耳其、伊拉克、印度，于1930年5月回到上海。

邓演达当即开始同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一起工作，这是他的一些手下人在1928年于上海成立的，这个组织的事务虽由在上海的季方等人办理，但邓演达从一开始就被当作领袖。当谭平山等前共产党人计划把这个团体改建成为政党时，邓的某些追随者就致电邓演达，请他由德国回国亲自指导这个活动。1930年邓回国后，重新组织了她的力量，起草了新的政纲，9月1日召开成立大会，通过政纲，选出由二十五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宣言，宣布新党成立，定名为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两周后，邓发表公开声明，谴责南京国民党背叛中国人民，成了军阀、官僚、地主和银行家的工具。宣言又批评共产党屈从共产国际，并举1927年12月的广州公社、1930年7月攻打长沙为例，说明共产党为了苏联利益而牺牲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他还在新党的机关报《革

命行动》的发刊词中重申了这些指责。

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被人们通称为第三党。邓演达作为该党领袖，用很多时间撰写政治论文，他说该党的目的是继承孙逸仙开创的革命，使之成为真正的国民革命，它需要经历一个得到所有中国“平民”，包括被压迫被剥削的中下层阶级支持的彻底的社会大变动。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和土地国有政策解决农村问题。邓的这些主张虽与共产党有某些共同之处，但他坚决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

由于邓公开批评蒋介石以及邓自己所从事的政治活动，他引起南京国民党当局的极端仇视，1931年他又因支持广州的分裂活动而更加激怒了他们。8月17日他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随即引渡到南京。监禁几个月后，被军事法庭以叛国罪进行审判，1931年11月29日在南京附近被处决。

邓演达遗有许多政治论文和宣言，由他的信从者编印出版，题为《邓译生先生纪念集》。章伯钧继他任第三党领袖，1947年改为中国工农民主党。1949年秋，它是参加在北京筹建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小党之一。1961年11月28日夜，北京举行了邓演达“殉难三十周年纪念会”，周恩来、宋庆龄这样一些著名人士都出席了。北京官方在对邓演达所作的评价中说道，他“支持孙中山先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

本辑编者 姜克夫



附 录

敬 爱 的 读 者 ：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
译稿，自出版内部发行以来，承蒙读者热心关怀，多有指出文中误植、错译及其他差漏之处，经查对核定，均已一一登录。本应及时排印“正误表”加以勘改，因原书篇幅较多，内部发行译稿分别出版，将不下十五个分册。为便于检阅，准备在全书出齐之后，广集群智，专力修订。在此先行向读者致谢，并盼不断赐教指正，力求译稿减少差错。

民国史资料丛稿编辑组
一九八一年四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稿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
(第十分册)

作者=

页数=96

出版社=

出版日期=

SS号=11004763

DX号=000002205516

URL=[http://book2.duxiu.com/bookDetail.jsp?](http://book2.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2205516&d=699B23A7FF698D057DAC0CA28E003620)

[dxNumber=000002205516&d=699B23A7FF698D057DAC0CA
28E003620](http://book2.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2205516&d=699B23A7FF698D057DAC0CA28E003620)